

马克思主义 文化研究



RESEARCH ON MARXIST CULTURE

2021 年第 2 期

总第 8 期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程恩富 吴文新◎主编

本电子文件之权利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享有，仅供作者个人学习、研究、备份或申报个人成果等非商业性或非盈利性用途使用，未经社科文献许可不得将全部或部分内容用于复制、销售、传播等商业性或盈利性行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目 录

访 谈

以坚定信仰之基铸牢百年党史丰碑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李慎明教授 韩巧霞 / 3

笔 谈

“树立正确党史观”笔谈 逢先知 刘润为 王庭大 邵维正 刘祖禹 / 17

论 文

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的基本问题论要 牛思琦 / 33

推动西方革命的文化批判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逻辑 卢文忠 / 44

变与不变：中国共产党奋斗目标百年演进与规律探赜 李慧敏 / 56

浅析百年大党之“七无”真谛 刘泽刚 / 66

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界定与新时代中国的文化自信 余 斌 / 75

从孔夫子到马克思：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精神契合性 田辰山 / 85

中医药独特优势何以彰显中华文化软实力 吴文新 / 101

先秦儒家乐教与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吴 宁 李文学 / 116

以中医人学优秀资源拓展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文化

内涵探析 岑孝清 黄 刚 / 127

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逻辑内涵 江 凌 / 139

论抗疫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德育意义 迟成勇 / 154

动 态

第三届世界文化论坛暨第二届中国文化分论坛发言摘录 王伟光 等 / 171

追溯文化百年足迹，共求世界文化繁荣

——第三届世界文化论坛暨第二届中国文化分论坛综述 武晓玮 / 182

《电影的智慧》简介 / 197

论点摘编

199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以坚定信仰之基铸牢百年党史丰碑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李慎明教授

韩巧霞*

【李慎明简介】男，河南温县人。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高级编辑、博士生导师、少将军衔，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首席专家。兼任中国政治学会会长，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评审委员会国际问题组组长。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曾任党的十六大、十七大代表，第十届、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主持多项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主要著作有《忧患百姓忧患党——毛泽东关于党不变质思想探寻》《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国际战略》《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大党建》《中国和平发展与国际战略》《战争和平与社会主义》等；担任8集电视教育片《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和6集电视教育片《苏联亡党亡国20年祭——俄罗斯人在诉说》总撰稿；主编《世界社会主义跟踪研究报告——且听低谷新潮声》（系列）、《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黄皮书系列）等20多部学术著作；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求是》等报纸杂志上发表论文200余篇。数部作品获国家有关奖项。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之上，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之上。历史和实践反复证明，一个政党有了远大理想和崇高追求，就会坚强有力，无坚不摧，无往不胜，就能经受一次次挫折而又一次次奋起；一名干部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站位就高了，心胸就开阔了，就能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做到‘风雨不动安如山’。”^① 2021年是建党100周年，百年

* 韩巧霞，法学博士，山东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政治经济学。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第519页。

来,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投身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团结汇聚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用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和伟大梦想精神为信仰信念注入新的内涵,铸就了崇高精神。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之义。围绕这一主题,访问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李慎明教授。

访问者: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在庆祝我党百年华诞的重大时刻,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理想信念作为我们的精神之“钙”,更显其深远意义,能谈谈您对理想信念的理解吗?

李慎明:什么是正确的理想信念?正确的理想信念绝不是一种空洞的说教和理论。它是被一种理论所征服,并且不管遇到任何艰难险阻,依然自觉自愿、斗志昂扬、一往无前、义无反顾地去为之奋斗的精神,这才叫理想信念。千万不要认为理想、信念、主义、道路虚无缥缈,与我们离得很远或没有一点关系。2003年我在伏尔加格勒大学与一个30多岁的年轻女教师交谈时,问她苏联解体的教训在哪里,她低下头半天不语。我很纳闷,等她再抬起头时,我发现她的眼眶里充满泪水。她说:“你问的这个问题平时我们都回避,不想回答、不想思考,这样心里还好过一点。这个问题是我们心灵上的疮疤,你这一句话,把我们心上的疮疤又揭开了。我们的心都在流血。30多岁的俄罗斯人对苏联解体前后的社会发展状况都有一个直观的感受和对比。苏联解体后,我们现在的实际生活水平突降了一半,伏尔加格勒州男性人均预期寿命整整降低了10岁,女性降低了5岁。过去我总认为,理想、信念、主义、道路虚无缥缈,与我们这些普通人毫无关系,现在看来,绝非如此。”在西方世界的诱导下,苏联和东欧国家纷纷走上了私有化改革道路,但并没有实现预期的经济繁荣。根据统计数据,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下降52%,远远高出残酷的卫国战争时下降的22%。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私有化所发挥的只是一种独特的“反面教员”的作用。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远东所所长季塔连科也坦承:“实际上连我在内的很多人都是一样,对苏联解体有着负疚、负债、负罪之感。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亲手把苏联给葬送了,起初我们心满意足地觉得这是件好事,现在我们感到深深的痛苦,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竟然变成了这个样子。”俄罗斯近十几年的社会发展实践告诉我们,那些似乎虚无缥缈,和我们每个人没有直接关系的“理想、信念、主义、道路”,实际上同国家民族的命运乃至我们每个人和家庭的命运都是息息相关的。实践证明,当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思潮、理论、运动和制度处于高潮时,人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长期性、复杂性、曲折性往往估计不足,急于求成;反之,则容易信心不足,悲观失望,甚至导致各种机会主义盛行。信仰正确和坚定,就是“真金”,真金不怕火炼。

访问者:在经济全球化和改革开放新时代,我们的理想信念是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有机统一,我们该怎样理解这一点呢?

李慎明：在经济全球化和改革开放新时代，什么是我们的理想信念？这就是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所说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我认为，这完全体现了我们党的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的有机统一。把远大理想置于不同社会阶段的现实基础之上加以切实推进，才能使宏伟的共产主义事业在其各个发展阶段上都始终显示出无比的优越性和旺盛的生命力。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共产主义绝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价值判断。如果我们不要最高纲领，不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只讲最低纲领，只讲现阶段的任务，这将至少带来两个问题。一是会使我们的最低纲领失去灵魂，失去前进的方向，失去不竭的动力，最低纲领所规定的现阶段的具体任务也不能很好地完成。二是会把现阶段的具体任务和最低纲领误认为是党的全部任务和最终目标，也会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①因此，在为实现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纲领而奋斗时，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也是十分重要的。

因此，我们要扎扎实实做好现阶段的每一项工作，为实现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纲领而奋斗。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曾指出：“一切中国共产党人，一切中国共产主义的同情者，必须为着现阶段的目标而奋斗……如果不为这个目标奋斗……对它稍许放松，稍许怠工，稍许表现不忠诚、不热情，不准备付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而空谈什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那就是有意无意地、或多或少地背叛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②毛泽东的这一论述，现在仍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其实，共产主义一是作为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二是作为包括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在内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制度形态，三是作为共产党人为崇高理想而奋不顾身、牺牲一切的精神道德形态，四是作为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存在和运动的物质形态，这四种形态早已在世界和我国现实生活中不同程度地存在并发展着。我们在为党的最低纲领而奋斗的同时，又要胸怀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不要迷失前进的方向。

访问者：您能具体谈谈对共产党人信仰追求的理解吗？

李慎明：从根本上说，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就是人民，即全心全意相信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③在建党百年的历程中，我们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从人民群众中汲取了无穷无尽的力量，这使我们的信仰无比坚定。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29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059页。

^③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第1页。

信仰人民,这一信仰高尚而光荣,是社会的现实和历史的真实,而不是社会和历史的虚幻。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年代,无数中国共产党人用自己的汗水、热血甚至生命,为着民族的独立解放、国家和人民的繁荣富强,默默实现着这一信仰。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生命所系、力量所在。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人民的一部分,除了人民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从根本上说,我们党是凭借为了人民、相信人民、依靠人民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色来巩固执政地位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然要遇到各种风险挑战甚至惊涛骇浪,但只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紧紧依靠人民,就没有迈不过去的坎。人民的力量是我们坚定信仰的坚实基础。在新征程上,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像鱼儿离不开水一样依靠人民,时刻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始终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充分激发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伟力。

访问者:请您再谈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李慎明: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2016年12月召开的民主生活会上明确指出:“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人民是历史进步的真正动力,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人民利益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①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就是要始终不渝地坚持人民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我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全心全意为人民。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根本问题、原则问题。这是检验任何个人、任何集团、任何政党和任何国家先进与落后、进步与反动的根本分水岭与试金石。共产党人把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作为自己的唯一宗旨,以此作为自己最高和最为光荣的历史使命,并与其他任何剥削阶级及其政党根本区别开来。

二是全心全意依靠人民。我们之所以说人心向背是最大的政治,相信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为着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这是因为,在阶级或有阶级的社会里,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始终占社会的绝大多数,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意愿、意志和力量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并最终决定历史的发展方向。共产党人把依靠人民作为发挥人民群众历史能动性的根本动力源泉。

中国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其本身就是人民的一部分,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绝无其他任何私利。从根本上说,我们是靠相信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这一本色执政。在贯彻“五大发展理念”的每一个发展理念中,在贯彻“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过程中,我们都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做出更有利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以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总之,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既是我们的根本立场和根本目的,又是达到目的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第189页。

的根本路径和根本办法；既是全党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又是各项工作的落脚点；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真谛，又是共产党人的本色；既是对党的优良传统的总结和继承，又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建设理论的新认识和新发展，是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在新的发展实践中的生动体现。

访问者：请您谈谈党性和人民性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呢？

李慎明：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伟事业中，我们为什么反复强调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呢？一是坚持党的领导是我国历史发展的必然和人民的选择。二是坚持党的领导在于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三是由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根本制度性质所决定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已经证明，坚持党的领导不仅是无产阶级夺取和掌握国家政权的首要条件与普遍规律，同时也是社会主义事业和改革的首要条件与普遍规律。从一定意义上讲，没有中国共产党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坚强正确的领导，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我们的对手，每每利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民在探索解放全人类、实现美好社会的道路上所犯过的错误，甚至是他们钻到我们的内部所蓄意制造的罪孽，把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歪曲、攻击为“独裁”和“暴政”，其本质是为了维持或恢复资本对劳动的永久的独裁与暴政。

随着我们党领导人民不断取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新胜利，有的人不断提出了党性和人民性的大小和高低问题，对我们党进行诘难，也有不少人对此有模糊的认识。其实，早在1944年7月14日，毛泽东在延安与英国访问者斯坦因谈话中就明确地回答了这一问题。一是党性和人民性是高度有机的统一。二是在党的各项具体工作中，由于对实际情况掌握得不够和情况的不断变化，我们党也会有这样那样的失误甚至错误。党的一些具体政策必须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和人民利益的需求而及时进行必要的调整与改变。我们党历来主张，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党的失误甚至错误特别是个别领导和党员所犯的错误，并不属于共产党党性的范畴，而恰恰属于共产党党性所要反对和纠正之列。三是自发的群众运动往往会被眼前局部的经济利益所阻碍，人民群众的彻底解放，必须在有先进理论武装的共产党领导下才能实现。四是认为人民性高于党性的人，绝大多数是模糊认识，而极少数用所谓的人民性来否定我们鲜明的党性的人，则是别有它途，其目的是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妄图让中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走资本主义道路，由资本家当家作主。

访问者：正如您所说，党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绝没有自己任何的特殊利益。这也是党为深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根基所坚守的政治立场与价值准则。在今天，经济全球化正在深入发展，民主、自由、人权一直是理论界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问题，对此您怎么看？

李慎明：当前，国内外意识形态领域在民主问题上的争论，本质上都是在民主作为国家形式和国家形态的层面和内涵上展开的。马克思、恩格斯对国家和民主的阶级性作了十分准确而重要的论述。马克思说：“‘民主的’这个词在德语里意思

是‘人民当权的’^①；“国家是抽象的东西。只有人民才是具体的东西”。^② 恩格斯说：民主“这个概念每次都随着人民的变化而变化”；“资产阶级统治的彻底的形式正是民主共和国”。^③ 民主的本意是多数人的统治，即“少数服从多数的国家”，也就是说民主与国家在本质上是一致的，“民主”中的“民”字，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人民或公民。世界上从来没有抽象的、纯粹的民主，而只有具体的、历史的民主。不同的社会形态，有着发展着的不同社会类型和程度不同的民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民具有不同的规定性。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民主的多数人的统治才能真正变为现实，民主的形式与内容、名与实才能高度有机统一。

民主是国家形式，是国家形态的一种，其实质就是阶级的民主和阶级的统治，是社会上层建筑的核心部分。而所谓的自由、人权都是在一定国家形式形态下公民权利的特定表现。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在民主、自由、人权的关系中，民主是前提、是核心。有了民主，才可能有自由和人权。这就如同民主是棵大树的树干，自由与人权是这棵树干上的枝杈，枝杈是附属于树干的，自由与人权是附属于民主的。有了一定的国家形式或形态，其阶级或个人的自由和人权才有可靠的保障。马克思主义绝不排斥抽象思维中的认识论意义上的民主及自由、人权的一般。但是，必须准确把握和揭示民主及自由、人权的内涵与实质，以利广大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争取自己的民主及自由。

访问者：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重要论述也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政治信仰层面进一步增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信心和决心的重要遵循和行动指南，您认为新时代我们应该如何贯彻落实这一重要论述？

李慎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主要任务是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逐步确立并巩固”“保证亿万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型国家制度”，“逐步确立并巩固了我们国家的国体、政体、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和各方面的重要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也不断健全”。^④ 而要完成这一主要任务的途径是什么呢？习近平总书记又明确指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关键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⑤ 具体来说，我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重要论述具体可以从三个方面贯彻落实。

第一，坚持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的根本政治保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证明，党的领导不仅是无产阶级夺取和掌握国家政权的首要条件和普遍规律，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首要条件和普遍规律。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44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第3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14页。

④ 习近平：《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与法律制度》，《求是》2019年第23期。

⑤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第4页。

义中国的领导地位，不仅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同时也有着充分的法律依据。其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序言明确记载，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取得的。宪法序言还明确指出，中国各族人民将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二是宪法正文总纲中的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明确规定，开宗明义地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家事务中的领导地位。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在总纲第一条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①这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波澜壮阔实践经验的深刻总结，同时又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与政治学理论的本质升华。

第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的宗旨和灵魂。《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第17篇《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强调：“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是我们共和国的坚实根基，是我们强党兴国的根本所在。”^②为了人民，相信人民，依靠人民，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人民当家作主既是目的，又是手段。只有不断巩固与增强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地位，人民群众才会更加自觉地把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和社会主义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更加自觉地发挥自己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进行更加丰富生动的历史活动，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也就会有最为先进的阶级基础和最为深厚的群众基础，就有了最为深厚的实质上的执政合法性。因此，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必须始终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始终为着人民群众。这是唯物史观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对我们的要求。

第三，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依法治国是实现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途径和法治保证，无论是党的领导还是人民当家作主，都必须得到法治的保障并在法治范围内实施，严格依法办事，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允许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只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才能正确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我们党提出了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依法治国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手段。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三者是有机统一的，但三者并非并列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③依法治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行使职能的具体反映和体现，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治国理政的重大方略，是实现人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人民出版社，2018，第8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第137页。

^③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第54页。

民当家作主不可或缺的手段,所以,依法治国所依据的法 and 所要实施的法治,必须是“良法”“良治”即真正体现人民意志、维护人民利益的法律和治理,即确保人民当家作主的法和治。

访问者:您在前面提到,我们当前面临着世所罕见的挑战,请谈谈该如何居安思危,坚定信心。

李慎明: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次专门学习历史唯物主义,一次专门学习辩证唯物主义,意味深长。当今的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着世所罕见的挑战,我们一定要居安思危。2019年1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复杂敏感的周边环境、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必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①2020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突袭而至,对世界格局、中美关系乃至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经贸、外交、军事、教育、科技等造成极大的震荡与冲击。新冠肺炎疫情极大冲击了世界格局,其产生以下新变化、新特点。

第一,世界已经进入大动荡、大变革、大发展的新时期。马克思曾指出:“在这种伟大的发展中,二十年比一天长,殊不知以后可能又会有有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期。”^②列宁曾指出:“这个阶级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日子到来时有能力实际完成各项伟大的任务。”^③如果说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暴发是全球大动荡、大变革、大发展的历史时期到来的序幕,那么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突袭而至则是这一历史时期正式降临的显著标识。从一定意义上讲,这场灾难仍在进一步撕裂世界,加剧世界范围内的贫富两极分化,加速世界各国人民的觉醒和世界历史进程,加速检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制度的长短优劣,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现在已经步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历史时期。

第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全面展示了我国的软、硬两种实力。在习近平总书记指挥、部署下,党坚定领导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动员全国人力物力财力,广大人民群众全力配合,打响了一场新时代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进一步得到极大发挥,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形成的和平时期的临战动员体制机制得到坚持和发展。

第三,坏事在一定条件下能变成好事。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我们当然是件坏事,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一场规模空前、不得不打、没有硝烟的广义战争。我国对新冠肺炎疫情一开始是被动应对,但很快转为自觉抗击,这是中国人民显著觉醒的重要标识。疫情让我国人民经受了生动深刻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思想教育。经过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测试与锻造,全党的思想、理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第21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203页。

③ 《列宁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7,第78页。

论、组织、作风、纪律、制度建设必将登上新的更高台阶，党和政府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也必将达到新的更高水平。

访问者：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3月在福建考察时曾指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青年一代责任在肩。”^①在2021年全国两会期间，《人民日报》推出建党百年主题MV《少年》，火遍全网，令人激情澎湃，信心盎然。您对于青年如何树立科学的信仰、坚定理想信念有哪些建议呢？

李慎明：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饱含深情地鼓励广大青年：“中国青年是有远大理想抱负的青年！中国青年是有深厚家国情怀的青年！中国青年是有伟大创造力的青年！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中国青年始终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②青年如何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我认为应包含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毛泽东从小就想探讨世界的大本大源，这也是他毕生之努力。1917年8月23日，他在致黎锦熙的长信中提出，“以大本大源为号召”，^③通过改造和普及哲学、伦理学来变换全国的思想，这就是救国救民的根本道路。^④1920年11月，毛泽东又说：“我不赞成没有主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解决”，“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⑤毛泽东曾对斯诺说，1920年夏天他自己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后，就从来没有动摇过。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就是毛泽东以及所有共产党人认识世界的大本大源。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他又特别强调指出：“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增强学习紧迫感，如饥似渴、孜孜不倦学习，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⑥理论异常重要，绝不可忽视，理论正确，党、国家、民族和人民便有无比辉煌的明天。文化可以多样性，社会思潮可以多元化，但真理不能也绝不会多极化、多样性、多元化。正确的理论（真理）即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只能有一个，这就是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想最一般规律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主义。我们的信仰信念信心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首先来自科学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

第二，认真刻苦读书。正确的理想信念的确立，首先来自对马克思主义以及各种科学知识的学习和掌握。1916年2月29日，毛泽东致信萧子升，列出七十七种

① 《在服务 and 融入新发展格局上展现更大作为 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福建篇章》，《人民日报》2021年3月26日。

② 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9，第5页。

③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第27页。

④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第27页。

⑤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第70页。

⑥ 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9，第10页。

书目。^①毛泽东不仅熟读我国的史书,而且把目光伸向浩瀚的宇宙,投向整个世界。他曾广泛涉猎十八、十九世纪欧洲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书籍。毛泽东在自述中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②《共产党宣言》毛泽东自己说看了不下一百遍。毛泽东还曾把《资本论》通读了3遍,《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各读了6遍,《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读了10遍。学习马克思主义和人类全部知识,是有正确理想信念的人一辈子的事。

第三,到实践中读无字书。书本的知识必须与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深深懂得了这一点。1917年7月中旬至8月16日,毛泽东和萧子升步行漫游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县,历时一个月,行程九百余里。这次长途旅行,未带一文钱,用游学的方法或写些对联送人以解决食宿,沿途接触城乡社会各阶层的人,了解一些风土民情,获得许多新鲜知识。^③1918年春,毛泽东与蔡和森沿洞庭湖南岸和东岸,经湘阴、岳阳、平江、浏阳几县,游历半个多月,了解社会情况,读“无字书”。^④1927年1月4日,毛泽东从长沙启程到湖南农村考察农民运动。4日至9日,先后在湘潭县的县城,银田,韶山一带考察。^⑤2月5日,历时32天的湖南五县考察结束,以此为基础写出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⑥理论是实践的结晶;只有结合实践,才能真正懂其理论的真谛。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当时中国之实际紧密结合,完成了自己世界观的转变。这才诞生了1925年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7年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1928年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等成熟著作,这也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诞生。当今的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如果我们静下心来,用今天的见识,再来重读和审视毛泽东当年这三篇著作,依然会觉得其剖析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没有过时,并且有着强烈的针对性。中国有幸诞生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否则,中华民族不知还要在黑暗中徘徊多少年。2016年12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社会是个大课堂。青年要成长为国家栋梁之材,既要读万卷书,又要行万里路。社会实践、社会活动以及校内各类学生社团活动是学生的第二课堂”;“当年,我在梁家河插队,实际上就是在上

① 《毛泽东年谱: (1893 - 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第22页。

② [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董乐山译,东方出版社,2005,第147页。

③ 参见《毛泽东年谱: (1893 - 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第27页。

④ 参见《毛泽东年谱: (1893 - 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第33页。

⑤ 参见《毛泽东年谱: (1893 - 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第175页。

⑥ 参见《毛泽东年谱: (1893 - 1949)》(修订本)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第179页。

社会大学，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那段经历让我受益匪浅”。^①

第四，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人为什么而活着是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本质上是人应该有什么信仰。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这一思想，是在新形势、新时代下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的坚持和创新。从一定意义上讲，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仍然是对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它明确指明了科学发展观的根本灵魂和目的所在。但马克思主义绝不仅仅是一个发展观所能囊括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讲话中所归纳的，马克思主义除了发展观外，还有实践观、群众观、阶级观、矛盾观等，而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这一归纳和提炼，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内容和目的指向来说，则更具本质性与深刻性。为着人民和依靠人民，相互依存，互为前提，高度统一于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唯一宗旨和人民立场，同时也贯穿于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治国理政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中。只有为着人民，才能最大限度和最充分地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只有依靠人民，才能达到为着人民这一唯一目的。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学习和掌握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紧紧依靠人民推进改革。要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推进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唯有如此，改革才能大有作为。但是，强调为人民服务绝不排斥合理合法的 personal 利益。1959年底1960年初，毛泽东就明确指出：“公是对私来说的，私是对公来说的。公和私是对立的统一，不能有公无私，也不能有私无公。我们历来讲公私兼顾，早就说过没有什么大公无私，又说过先公后私。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集体利益增加了，个人利益也随着改善了。”^②

青年们要自觉地听党的话，坚定地跟党走。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就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专门举行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讲清楚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够担负起领导人民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历史重任”；“要阐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青年运动的关系，加强对广大青年的政治引领，引导广大青年自觉坚持党的领导，听党话、跟党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听党话、跟党走，胸怀忧国忧民之心、爱国爱民之情，不断奉献祖国、奉献人民。”^③有了坚定正确的世界观，青年们就会有正确的方向、远大的志向、广阔的胸襟，就能勇于解放思想，敢于担当历史的责任，激发改造社会和创造世界的激情，为着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勇于接受各种困难的磨砺和挑战，浑身从内到外散发出真正的阳刚之气，谱就大写

① 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12月7日。

②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134页。

③ 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9，第8页。

的人生，不会囿于小我而精心构建自己的小人生和小家庭；就会真正能够做到自尊、自爱、自信、自强、自立，苦学多思，深入实践，扎实苦干，坚韧不拔，顽强拼搏，勇于创造，而不是一曝十寒，知难而退，得过且过；就会有着应有的社会正义与良知，而不会成为社会不良现象的漠视者、旁观者或简单的批评者；就会有着更加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把理想主义、现实主义和英雄主义完满地结合起来，容易聆听和接受别人的意见，不断调整和改进自己的实践方向，而不是怨天尤人，自我怜悯，悲观消极，无所事事；就会增强互助合作精神和集体意识，与同学互帮互学、相互交流、共同探讨，不断激发起心中新的求知欲望，并走近普通工农群众，触摸时代的脉搏，倾听人民的呼唤，而不是封闭温室、沉默寡言、孤陋寡闻或孤芳自赏；就可能经受住各种风浪的考验，使自己成长为党、国家和民族的有用之材直至栋梁之材。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笔谈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树立正确党史观”笔谈

逢先知 刘润为 王庭大 邵维正 刘祖禹

【编者的话】在 2021 年 2 月 20 日召开的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正确党史观”。这一重要命题一经提出，便立即得到全党同志的高度认同和热烈拥护。为了加深对这一命题的理解，增强学习党史的自觉性，更好地用党的创新理论最新成果武装头脑，本刊邀请多位相关领域的专家进行笔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党史观的概念以及对正确党史观的科学阐述，既有显著的理论创新意义，又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是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重要发展，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我们进行党史学习、研究、教育的根本遵循。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深刻领会，使之转化成我们学习党史、研究党史、把握党史自觉采取的思维方式。

一 树立正确党史观的几个问题

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 逢先知

在党史学习教育活动中，习近平同志提出要树立正确的党史观。什么是正确的党史观？

第一，党史是一门党性和科学性相统一的学科。对待党史，首先要解决一个立足点的问题，也就是要站在人民立场上，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理论。在阶级社会中，在还有帝国主义存在的国际环境里，不同的人群总是站在不同的立场，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对待中共党史也必然会有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看法。毛泽东同志在 70 多年前曾经提出，衡量一个政党是先进的还是落后的甚至是反动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生产力标准。他说：“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

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①另一个是人民利益标准。他说:“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②两个标准是一致的、统一的。回首100年,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中国共产党经受住了两个标准的检验,圆满地达到了两个标准的要求。

第二,分清主流和非主流。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中,有正确的时候,也有犯错误的时候;有胜利,也有失败。问题在于分清哪个方面占主导地位,哪个方面处于次要地位。显然,正确和胜利方面占主导地位,不然怎么会有今天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我们党是用彻底的唯物主义武装起来的,从来不讳避错误和失败,总是公开地、坦诚地进行严肃的自我批评。但是如果专门挑剔党的错误和失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以偏概全,把支流当成主流,就会误导人们把局部问题看作全局问题,否定党和人民的百年奋斗历史及其胜利成果。为了弄清党史上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从中总结经验教训,可以而且应当对党在某个时期或某个问题上所犯错误进行研究和讨论。但是,这种研究和讨论必须从全局出发,掌握全面材料,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

第三,用科学的、辩证的方法看待党的错误。犯错误当然是坏事,但是在一定条件下,错误也可以变成“财富”,即所谓坏事变好事。毛泽东同志说:“错误有两重性。错误一方面损害党,损害人民;另一方面是好教员,很好地教育了党,教育了人民,对革命有好处。失败是成功之母。”^③我们党正是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逐步加深对革命、建设和改革规律性的认识。

所谓坏事变好事,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采取毛泽东同志的方针:“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④纠正和总结党的错误,是为了总结经验教训,使全党弄清错误的实质及其根源、犯错误的主客观条件,使自己变得更聪明一些,避免重犯错误,并在弄清思想、坚持原则的基础上达到全党的团结和统一。值得注意的是,多年来,国内外敌对势力利用各种舆论工具,极力抹黑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特别是新中国的历史。他们制造谣言,歪曲事实,无中生有,造成恶劣影响。他们的目的是十分险恶的。“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清代学者龚自珍这句名言,值得我们深思。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是我们党在思想战线上的一项长期任务。

第四,党过去采取的方针政策应被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国际环境中来评价,不能用今天的政策去要求前人。拿社会主义建设来说,在一穷二白的中国搞社会主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07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096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136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938页。

义，我们党开始是毫无经验的。根据社会主义的传统理论，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实行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和计划经济体制，对外处于半封闭状态，没有能够更好更充分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尽管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曾经以苏联为鉴，对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做过有益探索。这种情况，是由当时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水平以及外部帝国主义对我国实行全面封锁的国际环境造成的，有着时代的局限性。

后来，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以美国为首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先后与我国建交，出现了一个对我国发展经济有利的国际环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实行改革开放的新政策，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保持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前提下推动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生产力得到进一步解放和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更大的成就，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又到了强起来，为全世界所瞩目。历史是不能割断的，应当看到，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是建立在此前近三十年那段历史所打下的基础之上的。就经济、科学技术方面来说，我国已经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以“两弹一星”试验成功为标志的科学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并且开辟了许多新的领域，农业生产、乡村建设也取得了长足进步，等等。这一切，都为改革开放时期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更重要的是已经建立起来的适合中国情况的国家根本制度，为后来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政治保证。

回顾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今日之中国，正迎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的路还很长。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还要做出巨大而艰苦的努力。我们已经取得了极其伟大的成就，但不能躺在光荣簿上安于现状。对于可以预料的和不可预料的困难，要做充分的、思想的、物质的准备。要准备伟大的斗争，要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那样，“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① 记住“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告子下》）的古训。我们党经过百年风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培育了优良的作风，形成了一整套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信赖和拥护。我们的前途无限光明。只要把我们党自身建设好，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我们的目标一定能够达到。

二 没有历史自信就没有光明未来

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 刘润为

所谓正确党史观，就是要在党史学习教育中把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第225页。

法贯彻到底,它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认识论与价值论的统一、科学性与党性的统一。一方面,我们进行党史学习教育具有崇高的目的性,它是为了“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①具体地说,就是为了牢记初心使命,推进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伟业;为了坚定理想信念,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了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永葆党的生机活力。另一方面,我们进行党史学习教育,又具有严谨的科学性,即必须贯彻实事求是原则,必须忠实于党史的本来面貌,必须探求党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我们的奋斗目标与历史进步的方向相一致;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心一意谋求以工人阶级为代表的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没有自己的任何私利,因而中国共产党人光明磊落、无所畏惧,有直面一切历史和现实的胸怀和勇气。在对待自己历史的问题上,我们的目的性越强烈、越自觉,就越能引导我们发现历史的真实;历史的事实搞得越扎实、越清楚,越是符合我们的目的性。

树立正确党史观,要求我们分清主流和支流。没有不犯错误的人,同样也没有不犯错误的党。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中,有正确也有失误,有胜利也有失败。我们从不因为正确和胜利而回避失误和失败,也从不允许因为错误和失败而否定正确和胜利。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主流本质。事实清楚地表明: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实现民族伟大复兴,是我们党百年奋斗史的主题主线;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是我们党百年奋斗史的主流本质。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一切,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一百年来,共产党人用奋斗牺牲证明,他们是中国人民最为优秀的儿女、中华民族最为坚实的脊梁。没有这样的党史自信,就谈不到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当然也就不会有更加光明的未来。

树立正确党史观,要求我们辩证地看待历史上的失误。犯错误当然是坏事,但是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变成好事,正所谓失败是成功之母。在这里,“一定的条件”是关键。从主观上说,这个条件就是要有彻底为人民服务的初心、辩证思维的方法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所谓彻底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就是“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②“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③所谓辩证思维的方法,就是要在失误和困难的时候,看到成绩、看到光明、看到失败阴影覆盖下的积极因素。所谓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就是不讳疾忌医、不搞一团和气,从团结的愿望出发,从解决问题的愿望出发,分清是非、分清责任,剖析出现错误的主客观原因,找到改正的办法。这种强大的纠错机制,是我们党无与伦比的思想优势

① 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1,第1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004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004~1005页。

和政治优势。正是凭借这种优势，我们党一次次从失败中奋起，一次次化险为夷，一次次把坏事变成好事。例如，没有对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清算，就没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科学结论；没有对于“左”倾教条主义的清算，就没有长征的胜利；没有对于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清算，也许我们到今天也不大懂得“两个维护”的极端重要性。

树立正确党史观，要求我们在评价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时，“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①既不能用前人的尺度衡量今人，也不能用今天的尺度衡量前人。例如，对于前后两个30年的评价，我们不能采取割断历史的态度。前30年不是我们不愿开放、偏好保守，而是因为帝国主义对我们实行封锁挤压的国际环境不允许我们开放；不是我们不去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是进行了执着且有成效的探索，只是因为条件和时间的限制未能将这种探索推进到比较完备的程度。后30年的改革开放，并非另起炉灶，它建立在前30年努力改善国际环境的基础上（如用小球推动大球，先后与欧美发达国家建交等）；建立在前30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艰难探索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建立在前30年奠定的物质技术文化基础上；尤其建立在前30年建立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上。没有前30年的探索奋斗，就没有后30年的改革开放；没有后30年的改革开放，前30年的探索奋斗就不能再续辉煌。有人说，不否定前30年，就无从证明后30年的正确，这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形而上学的观点。

树立正确党史观，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当下的历史虚无主义，是一种具有极强政治反动性的历史唯心主义。它是国际资本扩张的产物。境内外敌对势力相互勾结、狼狈为奸，是它的基本阵容；“学术创新”“反思历史”“寻找真相”，是它掩盖祸心的遮羞布；移花接木、颠倒黑白、凭空捏造，是它惯用的伎俩；剥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依据，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为国际资本扩张扫清障碍，是它的终极目的。恩格斯说：“资产阶级把一切都变成商品，对历史学也是如此。资产阶级的本性，它生存的条件，就是要伪造一切商品，因而也要伪造历史。伪造得最符合于资产阶级利益的历史著作，所获得的报酬也最多。”^②一个不学无术、专门解构抗美援朝历史的商人，被热捧成国内外著名的历史学家；一个浪得虚名、恶意抹黑土改的作家，在西方世界频频获奖，如此等等，其源盖出于此。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斗争取得了显著成效，意识形态领域出现激浊扬清、扶正祛邪的向好态势。但是，历史虚无主义仍有不小的招摇空间，一些深层次、根本性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正本清源、固本培元仍然任重道远。

^① 《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17，第23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第573页。

树立正确党史观的前提,是要具备战士的品格。怕当战士,不敢斗争,树立正确党史观就是一句纯粹的空话。数十年间,历史虚无主义之所以会泛滥成灾,对我们党的执政地位构成现实的威胁,就是因为我们的相当一批党员干部没有起来斗争。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习近平同志语重心长地说:“我反复强调要发扬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精神,强调要发扬老一辈革命家‘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革命精神,发扬共产党人‘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奋斗精神,这是有很深考虑的。”^①总书记的这一“很深考虑”,难道不值得我们深长体味、深刻领悟吗?

三 学史可以增信

中纪委驻中国科学院纪检组原组长、中国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王庭大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党的历史包括党的奋斗史、党的理论创新史、党的建设史等。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我们党的历史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最为可歌可泣的篇章,历史在人民探索和奋斗中造就了中国共产党,党又团结带领人民造就了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新的历史辉煌。在庆祝我们党百年华诞的重大时刻,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我们党集中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十分必要。

我们党的一百年,是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是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一百年,是创造辉煌开辟未来的一百年。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把党的历史学习好、总结好意义重大。

党史的学习教育首先要树立正确党史观。我先就这个内容讲几点认识。一是坚持党史姓党。要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学习、研究、宣传党史,在党爱党,在党护党,在党为党。二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坚决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四个伟大”中的伟大斗争包括坚决与否定党的历史、抹黑领袖、污蔑英雄的历史虚无主义进行斗争。三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实事求是地看待党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既不能因为成就而回避失误和曲折,也不能因为探索中的失误和曲折而否定成就。四是以两个决议和党中央精神为依据,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

(一) 学习党史,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为什么在那个“觉醒年代”的中国,只有我们这个50多人的小党——中国共产党能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最后取得了政权,领导人民使我国从一穷二白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又带领人民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就是因为

^① 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1,第20页。

党从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那一刻起，就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不渝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学史明理，就是明马克思主义的理，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特别是 21 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一百年来，不管形势和任务如何变化，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惊涛骇浪，我们党都始终把握历史主动、锚定奋斗目标，沿着正确方向坚定前行。无论怎么向前走，走得有多远，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路，不能忘记从哪里出发、为什么出发。古人说：“慎终如始，则无败事。”（《老子·道德经·第六十四章》）“今天，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撼动我们伟大祖国的地位，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进步伐。”^①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越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越是要终日乾乾、夕惕若厉，因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也越发显得迫切而重要。

（二）学习党史，始终坚持人民至上

我们党来自人民，党的根基和血脉在人民。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是我们党立党兴党强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党的百年历史，既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又是一部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大革命失败后，30 多万牺牲的革命者中大部分是跟随我们党闹革命的人民群众；红军时期，人民群众就是党和人民军队的铜墙铁壁；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广泛发动群众，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淮海战役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车推出来的，渡江战役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船划出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是人民群众干出来的；改革开放的历史伟剧是亿万人民群众主演的。没有人民也就没有我们党，不能为人民我们党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世界共运史是我们的一面镜子。执政达 74 年之久的苏共，在一夜之间垮台，原因很多，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不能代表人民利益，丧失人民群众的信任。1990 年苏联《西伯利亚报》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在“你认为苏共的政策代表谁的利益”的问题下，回答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为 7%，回答代表苏共党员利益的为 11%，回答代表党的机关人员利益的高达 85%。^②一个执政党只能代表党的机关人员利益，这个党迟早是要丧失执政地位的。

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我们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为了挽救人民的生命不惜一切代价。在“闭卷”考试中考出好成绩，彰显了党的伟大。在精

^① 《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系列活动时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9，第 10 页。

^② 王长江、姜跃：《现代政党执政方式比较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 288、274 页。

准扶贫中,我国消除了绝对贫困,全部达到“两不愁、三保障”,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当前我国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向前迈出一大步,而且必将取得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我们党就能克服任何困难,就能无往而不胜。

(三) 学习党史,始终做到“两个维护”

党的民主集中制基本原则中的“四个服从”,核心是全党服从中央;“四个意识”,最根本的是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不仅革命权威、政治权威具有重要作用,个人权威、领袖权威同样对无产阶级政党具有重要作用。^①列宁指出,领袖、政党、阶级、群众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领袖是政党的领袖,政党是领袖集团主持下的政党,政党没有自己的领袖核心,就不能形成统一的意志,就不会有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②毛泽东同志强调,要“建立领导核心,反对‘一国三公’”。^③邓小平同志指出,“国家的命运、党的命运、人民的命运需要有这样一个领导集体”;“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要注意树立和维护这个集体和这个集体中的核心”。^④

回顾我们党的历史也可以看出,建党初期就缺少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逐渐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新时代,要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并将其落到实处。

(四) 学习党史,始终坚定“四个自信”

我们党之所以历经百年而风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因为我们党坚定理想信念,坚守为绝大多数人服务的根本宗旨,形成了艰苦奋斗、牺牲奉献、开拓进取的伟大品格,并且深深融入我们党、国家、民族、人民的血脉之中。这是我们党在政治上、精神上的巨大优势。正是凭借这种优势,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335~338页。

② 参见《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2017,第19~26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第69页。

④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310页。

新中国成立时，中国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毛泽东同志曾感慨地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①正是凭借这种认识，我们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披荆斩棘、风雨兼程，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

——从火柴、煤油都要进口，到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目录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制造业第一大国，具有“两弹一星”、载人航天、高速铁路、北斗组网、“蛟龙”入海、“天眼”巡空、港珠澳大桥和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等超级工程；

——从百业萧条，到活跃着上亿的市场主体，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外资流入第二大国、外汇储备第一大国；

——从民不聊生，到7亿多农村人口脱贫，千百年来困扰中华民族的绝对贫困历史性地画上句号，建成覆盖十几亿人的世界最大社会保障体系；

——从一穷二白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从饱受欺凌，到携手各国共建“一带一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

历史已经表明，中国共产党是民族复兴使命的合格担当者。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就有了主心骨，中国人民就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重塑民族自信、走向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

学史可以增信。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是我们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自信最为坚实的基础。

四 正确党史观是锐利的思想武器

解放军后勤指挥学院教授、少将 邵维正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要树立正确党史观。唯物史观是我们共产党人认识把握历史的根本方法。如果历史观错误，不仅达不到学习教育的目的，反倒会南辕北辙、走入误区。”“要坚持以我们党关于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和党中央有关精神为依据，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②这些精辟论述为全党学习研究中共党史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中共党史的独特价值是确立党史观的前提

中共党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

^①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329页。

^② 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1，第24页。

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的历史,是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也是加强自身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提高执政能力的历史,从而形成了具有许多特点的学科,即中共党史学。

任何政党都有自己的党史,通常是在党内总结、学习和传播。中国共产党是世界第一大党,具有百年历史、70多年执政史的政党。这一独特地位决定了中共党史已经突破了本党的范围,不仅成为全党全国学习的重点内容和共同的精神财富,而且引起许多国家的广泛关注。俄罗斯、美国、日本、法国等国家都有专门机构研究中国问题,有的专家认为只有读懂中国共产党历史,才能深刻了解近现代中国。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使中共党史成为国际性的显学,这还是绝无仅有的。

中共中央和中央领导人历来重视党史的总结和学习,从党史中吸取历史经验,传承红色基因,积蓄前进动力。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亲自主持制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还专门著文《如何研究中共党史》,并通过全党的整风运动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亲自主持制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党史国史“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①他还围绕中国共产党历史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近期已汇编为《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一书。这些论述立意高远、思想深刻,尤其是首次公开提出要树立正确的党史观,对我们学好党史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 辩证唯物论是党史观的理论基础

坚持正确党史观就要以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党的发展历程中,总结经验教训,传承红色基因,把握历史规律。首先要以唯物主义的态度,对党的发展历史给予准确定位和科学评价。我们党历经百年的征程,团结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中国确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展开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实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人民生活大为改善,综合国力显著提高;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历史性成就,决战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百年的拼搏奋斗,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使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些宏伟业绩已经得到实践的检验并载入史册,国内外任何人妄图否定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都是徒劳的。

^①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人民出版社,2014,第179页。

任何事物都是辩证的统一，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本质。学习和研究党史要正确处理历史与现实、宏观与微观、全局与局部、现象与本质、主流与支流、成功与失误等方面的关系。要以上述两个历史《决议》为依据，把这些关系统一于党的实践和发展之中。

（三）准确把握主题主线是党史观的基本内涵

坚持正确党史观就要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科学认识评价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贯穿于党史中的主题主线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两大历史任务而进行的不懈奋斗。无论是学习还是研究，都必须围绕而不能脱离这一主题和主线。

由于中国革命发生在内忧外患、饱经屈辱的东方大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中国革命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作为担当领导重任的中国共产党必然要作出更艰难的探索、更激烈的斗争，也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在这样漫长、曲折的发展进程中，挫折和失误是难以避免的。对历史的评价切忌片面性，比如改革开放前后的历史，既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30年否定改革开放后的30年，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30年否定改革开放前的30年。这就要求我们在学习党史时，把握党史的主旋律，客观分析、准确评价人物和事件，使学习教育活动不受干扰，得以健康发展。

（四）清除历史虚无主义是坚持正确党史观的重要任务

坚持正确党史观就要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是一种背离客观事实、贬低革命历史、抹黑英雄人物的唯心主义思潮。他们鼓吹“告别革命”，打着“反省中国近代史”“重新评价”的幌子，否定革命的正义性，恶意炒作扩大阴暗面，攻击共产党的领导，诋毁革命领袖，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历史虚无主义者与国际上反华逆流相配合，其性质和危害更加严重。我们必须以正确党史观为指导，理直气壮地抵制和批判这股错误思潮，绝不允许他们动摇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根基。要进一步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剖析，更好地正本清源、固本培元，增强我们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捍卫党的形象和权威。

（五）汲取智慧和力量是学习党史的主要目的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斗争实践中不仅建立了丰功伟绩，而且通过长期探索、拼搏形成了优良的作风，培育了党的红色基因。这是我们党特有的政治优势，也是战胜任何敌人、克服艰难险阻的革命法宝。百年实践证明，优良传统不能丢，丢了就会失去灵魂；红色基因不能变，变了就会改变本色。

学习党史要永葆初心、牢记使命。知史爱党，知史爱国。深刻了解党是怎么创建的，为什么要在中国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走得再远也不要忘记来时的路。要永远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与群众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艰苦奋斗，一心为民，廉洁奉公，取信于民，初心如磐，使命在肩，始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学习党史是为了以史鉴今，资政育人。作为在中国长期执政的党，“资政”需要吸取历史经验，更好地履行治党治国治军的使命；“育人”是要传承红色基因，更好地培养党的优秀接班人。中央领导同志历来十分重视总结、运用和发展历史经验，毛泽东曾形象地说，我们党是靠总结历史经验“吃饭的”。他不仅有许多重要论述，而且亲力亲为。他所总结概括的中国革命“三大法宝”“十大军事原则”等，至今仍在广泛传诵。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多次强调：“必须把党的历史学习好、总结好，把党的成功经验传承好、发扬好。”^①而且每到重要历史节点，如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改革开放40周年等，习近平总书记都发表重要讲话，对系统总结历史经验起到了启迪示范作用。

我们党百年奋斗的历史是取之不尽的源泉，要善于从革命前辈的成功实践中感悟真谛，提高自己的思想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增强本领，增长才干，努力担当起新时代的新使命。我们党的红色基因和优良传统，蕴含着无穷的力量，要善于从党的斗争精神、英雄模范的感人事迹中获取前进动力，鼓起新时代的精气神，努力拼搏、敢于创新，在新征程中不断攀登新高峰、开创新局面。

五 入党誓言字字千钧

中宣部研究室原主任 刘祖禹

习近平同志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发表的讲话，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作为一个有70年党龄的老党员，读到这篇马克思主义的讲话，感到十分欣慰。下面，我谈一谈学习这个讲话的一些粗浅体会。

百年党史是一部伟大的教科书。它教诲全党同志要不断提高觉悟，增强党性，砥砺初心，敢于担当。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指出：“我们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②什么是初心？就是为人民的幸福生活而奋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奋斗。实现这个初心，是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不容推卸的义务和神圣职责。我们的每一个共产党员在入党时都曾庄严宣誓：“为共产主义奋

① 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1，第5页。

② 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1，第15页。

斗终身!”宣誓就是立了初心,终身都要担当好使命。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民是至高无上的,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共产党员的根本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的生命有限,但只要一息尚存,就要为人民服务不止,有一分热就要发一分光。这是共产党人的根本价值观。

要学好百年党史,就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是社会上的一一个毒瘤。它敌视党的诞生和发展,竭力诋毁百年来党领导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它处心积虑地要在中国推行资本主义制度。“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历史虚无主义妄图把“改革”换成“改制”。“革”和“制”,一字之改,彻底暴露了历史虚无主义的险恶图谋。

党史承载着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一切光荣和伟大,闪烁着灿烂的革命精神之光。诸如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大庆精神、大寨精神、红旗渠精神、焦裕禄精神、抗洪救灾精神、抗震救灾精神,如此等等,构成了完整的革命精神谱系。我们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它,每时每刻去践行它,用新的创造去接续发展它。习近平同志说:“要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教育引导全党同志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①“以昂扬姿态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一百周年”。^②这一重要论述,是我们学习党史、进行党史教育的根本遵循。扎扎实实地把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到实处,就是我们对于党的光辉历史的最大敬重,就是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应当承担的重要使命,就是在为中华民族开辟更加光明的未来。

① 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1,第11页。

② 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1,第27页。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的基本问题论要

牛思琦*

【摘 要】马克思恩格斯从文明、文艺、知识水平和受教育程度、意识形态等几个不同维度定义文化，将其本质表示为人类的精神活动及其产品，是对人类客观物质性活动的反映，即“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文化的演进规律体现为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的辩证关系、意识形态对精神生产的异化和文化的多样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观在性质特征上具有现实性与实践性的根本属性、批判性与论辩性的精神实质、继承性与发展性的鲜明标识。文化的地位作用体现在，它是具有批判性质的物质力量，是解放人和发展人的强大精神武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观紧紧围绕实现人的自由解放与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认为人是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人自身的进步是衡量文化发展的根本尺度。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唯物史观；意识形态；人的解放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文化建设提到了十分重要的高度，多次强调文化对国家和民族发展的整体意义。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 2035 年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并对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作出细致谋划和清晰部署。这是党中央首次明确建成文化强国的具体时间表，标志着我们党对文化建设重要地位以及文化发展规律的认识逐渐深化。同时进一步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性，这有助于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更好地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在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文化多元化面临新的变化与挑战，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化交锋与碰撞日趋激烈。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文化领域也出现许多新的情况，正需要我们以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为指导，坚定文化自信，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因此，重温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观，关注其当代阐释与建构的基本问题，

* 牛思琦，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便具有不容忽视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 文化的意涵和本质

文化问题是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从文本的角度看,“文化”一词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出现的频率不高,但马克思恩格斯在事实层面实际关注了这一论题。马克思恩格斯在多重意义上使用文化概念,将其文化观蕴含于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般规律的研究中。在多维解读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的基础上,深刻把握其本质,是不容规避的理论前提。总体而言,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化概念的论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维度。

第一,将文化基本等同于文明。文化与文明是既有差异又相互联系的一对范畴,广义的文化和文明概念“都是多层次多维度的总体性存在”,^①用以指代人类创造的全部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早期粗陋的共产主义提出的绝对平均主义以及公妻制的主张进行了批判,认为这个主张是“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向贫穷的、需求不高的人——他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的非自然的简单状态的倒退”,^②这里马克思将文化与文明并列使用。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③这里马克思恩格斯用“文明”来指代一种宏观和社会历史意义上的文化。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了资本家以社会名义占为己有的剩余劳动,“这种剩余劳动一方面是社会的自由时间的基础,从而另一方面是整个社会发展和全部文化的物质基础。正是因为资本强迫社会的相当一部分人从事这种超过他们的直接的必不可少的需要的劳动,所以资本创造文化,执行一定的历史的社会的职能”,^④这里同样将文化与文明在相近的意义上使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多次提到“文化初期”,^⑤用于表述一种文明程度较低的社会状态。恩格斯在《反杜林

① 衣俊卿:《文化哲学》,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第1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第29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404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98,第220~221页。

⑤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剩余价值的生产时,指出“在文化初期,已经取得的劳动生产力很低,但是需要也很低,需要是同满足需要的手段一同发展的,并且是依靠这些手段发展的。其次,在这个文化初期,社会上依靠他人劳动来生活的那部分人的数量,同直接生产者的数量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详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239页。

论》中说：“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① 此处的“文化进步”即指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像以上这样，将“文化”与“文明”二者等同看待和使用的情况，贯穿于马克思恩格斯从早年到晚年的著作当中。

第二，将文化概念限定在文艺领域。在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本中，经常用“文学”“文艺”“艺术”等词来直接表述现在的文化概念。例如，《共产党宣言》中那段著名的论述：“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② 根据译者的注释，“文学”一词在这里泛指科学、艺术、哲学、政治等方面的著作，^③ 实际上也暗指“文化”。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说：“在所有的人实行明智分工的条件下，不仅生产的东西可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丰裕的消费和造成充足的储备，而且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去获得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社交方式等等——中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④ 恩格斯这里所提的文艺概念已经超出了单纯的艺术领域，作为一种文化形式，成为现代文化概念的题中应有之义。

第三，用文化表示知识水平和受教育程度。将“文化”与“水平”“程度”“素养”“修养”等词连用，表示一种程度和状况，在马克思恩格斯原著中多次出现。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指出：“从这种关系就可以判断人的整个文化教养程度”。^⑤ 马克思在1844年8月11日致费尔巴哈的信中指出：“英国的无产者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他们的文化素质不及法国人。”^⑥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道：“因为进行这些革命的个人都由于自身的文化水平和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而对他们自己的活动本身抱有种种幻想。”^⑦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同样有过类似的表述：“但是这并不妨碍爱尔兰人去和英格兰人竞争，也不妨碍把英格兰工人的工资及其文化程度逐渐降低到爱尔兰工人的水平。做某些工作，几乎包括工业中的一切工作在内，都需要有相当的文化程度。”^⑧

第四，用文化表述与意识形态相似的概念。在抽象的、非物质的精神意义上使用“文化”一词，表示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化斗争”，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的革命性、斗争性品格。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及这场“文化斗争”时指出，“‘信仰自由’！如果现在，在进行文化斗争的时候，要想提醒自由主义者记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2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404页。

③ 详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404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258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84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4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196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第361页。

住他们的旧口号,那么只有采用下面这样的形式才行”,^①将文化和精神的斗争相联系,赋予文化一定的意识形态含义。恩格斯的《流亡者文献》亦多次使用“文化斗争”的概念,如“有一点是毫无疑义的:在我们的时代唯一能替神帮点忙的事情,就是把无神论宣布为强制性的信条,并以禁止一切宗教来超越俾斯麦的文化斗争中的反教会法令”,^②此处的“文化斗争”指俾斯麦政府与天主教教权主义势力斗争时所采取的有意识形态性质的文化措施。

通过梳理不难发现,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观既有宏观的社会历史层面的意涵,指文明;又具有相对于个人而言的微观含义,指思想观念、理论知识、精神意识等。当然,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化概念的界定不能简单划分,在很多情况下马克思恩格斯是在以上两个层面同时使用“文化”一词的。换言之,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的含义虽有差异,但在更深广的维度上所体现的文化的本质要义却是相通的。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文化是人类的精神活动及其产品,是对人类客观物质性活动的反映。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种人化,即“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人的出现促进了原始自然的分裂,形成“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两种倾向,前者是推动文化发展的根本力量。人来源于自然,又创造自然,人类实践的深入使得人类社会逐渐形成。人要生存,获得发展,“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③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逐渐产生出属人的自然,即以自然为基础的人类社会,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言的宏观意义上的文化概念。而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深入,文化得以生成发展,又对人的实践活动产生规制与引导作用,不断影响着人类实践的扩展。总之,文化以内含于实践的形式,推动了自身发展进步。

二 文化的演进规律

马克思恩格斯的精神生产理论是阐释文化演进规律的重要参照。在《神圣家族》中他们第一次使用了这一概念:“甚至精神生产也是如此。如果我想合理地行动,在确定某种精神作品的规模、结构和计划时,难道我不必考虑生产该作品所必需的时间吗?”^④在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的理论体系中,精神生产指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表现为宗教、法律、道德、科学、艺术等上层建筑的存在形态。精神生产来源于物质生产,物质生产的发展决定精神生产的发展,是推动精神生产发展的动力;同时精神生产对物质生产有能动的反作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都是对人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体认,二者统一于实践。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初期,物质生产和精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37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297~29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31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270页。

神生产并未明确分离。随着分工的出现,精神生产开始逐渐挣脱物质生产的束缚,作为一个独立的形式得到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二者的彻底分离。首先,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是相互交织、互相交融的关系,精神生产的发展本身就表明了一定意义上物质生产的发展。其次,精神生产渗透于物质生产的活动之中,内在地推动着物质生产的发展。马克思说:“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①精神生产是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活动,集中体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精神生产为物质生产提供精神动力、思想保障、智力支持等。

意识形态是精神生产的异化形式,成为文化演进的构成方式之一。在文化的发展演进中,意识形态具有某种程度的虚假性,但作为一种观念上层建筑的意识,它又是现实存在的,因而推动文化向前发展。一方面,意识形态具有虚假性。作为虚假意识,意识形态“是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②它是统治阶级维护阶级统治的手段和工具,统摄着整个社会的主流思想,而成为被异化的精神生产的存在方式。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又具有某种现实的真实性。“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③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特定时代占统治地位的物质生产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意识形态虽代表了统治阶级的意志,却是对物质资料生产方式,以及经济基础和一定社会生产关系的反映。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昭示:生产不是思想的外化,而是本来就内在于世界中的现实个人的生存,现实个人的生存不是由自在的自然界所设定的生物行为,而是他们以自身的感性存在作用于对象的创造活动。也就是说,意识形态的精神生产具有客观的真实性,它以现实的生产关系为依据,是人对物质生活世界的感性对象化活动。

文化的多样性发展是其演进规律的体现。精神生产具有多样性,从资本主义发展的角度看,资本扩张使得不同国家和民族主动或被动地卷入世界历史的发展之中,这种世界性是多样性的精神生产以及文化发展的前提。资本主义在找寻世界市场、谋求全球统治霸权的过程中,推动了作为精神生产的文化的全球性。“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④其中的“世界文学”是一种全球性的精神生产。但是精神生产不是独立地进行全球化的,它以物质生产的全球化为基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169~17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16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178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404页。

础。“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①世界性的精神生产虽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可是在文化的多样发展中，并不意味着经济落后的国家会丧失其独立性。“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因此，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18世纪的法国对英国来说是如此（法国人是以英国哲学为依据的），后来的德国对英法两国来说也是如此。”^②因此，无论是从历时还是共时的维度而言，多元融合是当今世界文化发展的主要样态。

三 文化的性质特征

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观立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上，在揭示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的思维发展客观规律的同时，坚持以唯物史观为哲学基石，对文化产生与发展的特征属性做出探索。

现实性与实践性是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的根本属性。马克思恩格斯真正实现了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反映在文化问题上，便是彻底扬弃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唯心主义文化观，将现实的个人活动及其所创造的物质生活条件，作为出发点和立论依据，而不再是“绝对精神”“自我意识”“唯一者”等精神层面的东西，也不再是抽象的人。文化由现实的人及其实践所创造，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指出：“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臆想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③人类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其根本也必然具有实践性。“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④包括单个人、社会团体以及国家之间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是人们物质活动的直接产物，正是人类自身生产了这些精神文化层面的社会上层建筑，表现为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语言之中的形式。

批判性与论辩性是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的精神实质。马克思恩格斯的一生都处在致力于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控诉种种社会不公的伟大斗争之中，其批判的矛头集中指向资产阶级文化中的腐朽因素，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的革命品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16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61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16~519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24页。

格。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指出了资本剥削的秘密,认为资本主义文化是以金钱确定人的价值,以文化为“面具”掩盖资本吞噬人性的丑恶。因此,建立在资本剥削之上的资本主义文化价值观,是一种迷惑人民、欺骗群众的“虚假观念”,它为之的是榨取剩余价值、实现利润最大化,并且最终维护自身的阶级统治。不容否认,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文化的批判应是理性批判,“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①这是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的批判性时必须把握的一个方面。

继承性与发展性是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的鲜明标识。关于精神生产的继承性,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正是建立在以往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基础之上。“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②同物质领域的生产一样,非物质领域的精神文化生产也具有连续的继承性,因而呈现出一种线性的历史发展状态。以往的精神积淀可以推动进行新的精神生产,对于文化的创造和进一步发展来讲是必不可少的条件,“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③与此同时,“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④从中可以看出,历史遗产或文化传统既是推动文化继承性发展的积极因素,又可能受到继承性的限制,成为文化发展的某种桎梏。其实,人类文化的演进是继承性发展中动力和阻力的统一,在这种合理的张力中文化不断突破创新。

四 文化的地位作用

文化的地位及作用突出体现在它与经济和政治的关系中。一方面,经济和政治是文化的基础,二者决定着文化的性质、特征和发展状况,构成文化发展的直接动力。“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⑤人们作为自己思想观念的生产者,受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交

①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29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16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612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669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24页。

往关系的制约,而后者构成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它能决定某一时代整体的文化样貌,影响着一定社会精神文化的发展状况。另一方面,文化虽受到经济和政治因素的制约,是对一定社会中经济和政治的反映,但文化对二者却有能动的反作用。长期以来,受苏联教科书体系的影响,人们过分强调经济基础对文化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文化渗透于经济基础之中,能够对经济基础起到巨大的反作用。“文化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绝不是一种消极的惰性因素,它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不是外在的机械反应,而是一个统一体的内在互动作用。”^①这集中反映为经济、政治与文化的相互关系,即在经济基础中渗透着政治和文化的因素,文化通过对具有决定性作用的社会经济基础产生能动作用,进而使这种自觉的能动反作用转化为对经济基础有决定力量的作用,引起经济基础在更高层面的反作用,构成新一轮经济基础与文化上层建筑的辩证作用过程。换句话说,经济、政治、文化之间并不是相互孤立的存在关系,它们植根于人类实践活动之中,相互交融、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形成良好的发展循环。从全部社会结构的完整构成上看,文化非但没有外在于经济和政治而存在,反而与之构成一种相互交织的多向互动关系,文化的生成状态和存在样貌,本身就表明了一定意义上经济和政治的现实。

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观,蕴含着世界观天才萌芽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是考察文化与经济、政治关系的哲学基础。以之为参照,在与经济和政治的辩证关系中,文化的地位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上。

第一,文化是具有批判性质的物质力量。文化作为物质力量,可以“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②当无产阶级的文化被人民大众所掌握,其批判性和革命斗争精神,能够整合并凝聚一切文化的力量,通过对其他社会文化形态的扬弃,不断实现文化的进步。只有使“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③才能始终促进人的发展,最终为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创造有利的文化条件。

第二,文化是解放人和发展人的强大精神武器。文化作为改造和变革社会的物质力量,同时具有塑造人和完善人的功能。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观中,十分重视先进文化的引领作用,认为文化尤其是先进的文化,不仅可以涵养人的精神境界,更是使人获得独立和解放的强大精神武器。马克思恩格斯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自由个性受到资本普遍奴役的现象,指出只有到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里,那时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才能为所有人的自由发展奠定前提条件,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才能得以实现和得到保障。而共产主义并不仅是一种纯粹的社会制度或社会形态,从实

① 衣俊卿、胡长栓等:《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第7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1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492页。

质上来说更是一种不断改造世界的现实运动,是渗透于人类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思想文化、精神观念的普遍体系。“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产出来。”^①在这一现实运动中,“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②

五 文化的目标取向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的学说,其一切思想和理论的核心,都紧紧围绕实现人的自由解放与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现实的人及其社会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精神实质。首先,人是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人要生存、获得发展,需要从自然界获得满足自身存在的生产资料,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使原始自然打上人的烙印;反之,人也会被打上自然的烙印,使人按照自然存在的方式改造自身,形成内化于人的思想观念、精神意识等。以上两个方面即通常所言的广义文化和狭义文化的概念。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的主体性的强调,突出了人的实践活动的自由自觉的能动性,在人与自然、主观与客观的双向互动中,人成为推动文化不断发展与创新的源泉。其次,人自身的进步是衡量文化发展的根本尺度。在实践活动中,现实的人是衡量一切事物的尺度和标准,人的实践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桥梁,具有主客临界点的特殊属性。这就意味着,实践不仅会以感性的价值尺度,同时还会以理性的事实尺度,衡量包括文化在内的人类社会的发展演进。总之,马克思恩格斯所追求的人的自由个性和全面发展的文化观,是以人的发展为中心,客观尺度、主观尺度、超越尺度的统一。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将人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③在前两个社会阶段,人没有获得真正的独立性和个性,人只是在极其有限的范围内发展着。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物的依赖关系”展开了理性而又深刻的批判,在经济发展和政治解放中寻求文化解放,将其作为实现人类最终解放的途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71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2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2页。

文化解放的目标是人全面解放和发展目标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共产主义总目标的体现。在具体路径上,马克思恩格斯以文化解放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目标取向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在以“物”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里,金钱成为衡量一切事物的普遍价值,其本质是使人的劳动和人的存在同人自身相异化,金钱控制人的内心世界,使人对金钱顶礼膜拜。这说明,在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攫取了统治社会的最高权力,掌控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秩序。当资本取代人成为社会的“主体”,人的解放只是一种奢望。人们忍受着资本的奴役,资本和金钱关系成为人的“异己本质”,制约着人自由个性的发展,资产阶级所谓的文化育人仅仅是资本增殖的外在口号而已。从发展历程上看,资本对人性的奴役,只有到了“自由人的联合体”阶段才能消除。因此,用无产阶级文化解放无产阶级自身及全人类,人的发展才能逐渐摆脱对物的依赖,从而进入全面发展的“自由个性”阶段。

六 结语

综观马克思恩格斯的主要著作和他们的整个思想体系,并没有一个现成完整的、系统的理论文本对文化进行单独的说明和论证,而文化问题却渗透到他们整个思想体系,以当下的视角来看,他们确实在深刻地讨论着文化的问题。从宏观或社会层面来说,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中提到更多的是“文明”这一概念,并且在很多语境中是把它们当作同一个意义来使用的,即从整个人类社会角度来使用文明、文化的概念。所以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观中,从文化的宏观层面或者社会层面来说,它就是文明、文明形态,这是与人类社会发展、社会结构层面相联系的。从微观层面或个人层面来说,马克思恩格斯又把文化看作一种思想观念、理论知识、精神意识等,而且在某些时候,这种微观层面的、个人层面的文化还蕴含着丰富的科学、艺术等具体形式。事实上,无论是从宏观的人类社会层面,还是从微观的个人层面,文化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体系中都占有重要的位置。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前期,他们多从微观个人的层面去使用文化的概念,主要体现在马克思的博士论文、《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之中;而在他们思想的后期,他们却更多地从宏观的社会层面上去使用文化的概念,主要体现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人类学笔记》和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著作之中。这是由马克思恩格斯从理论走向现实的实践路径决定的,马克思恩格斯从事现实的革命活动,开始系统研究政治经济学问题,这也就使他们大多从宏观的社会层面使用文化概念。当然,这只是马克思恩格斯使用文化概念时呈现的一个大致走向,这样区分并非那么严格,很多时候他们也在两个层面同时使用。但是从根本上来说文化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它体现的是现实的人的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

在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发展演进中，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到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思想，他们的理论观念存在很多共通之处。比如，都强调人是文化发展的动力，关注文化尤其是意识形态的领导权问题，重视对历史上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的继承和创新，注重文化发展的物质与制度保障等。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对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自马克思主义诞生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再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多世纪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普遍原理是适应中国国情的，是唯一科学的中国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回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化的原理阐释，坚定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既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也彰显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题中应有之义。新时代的文化建设必将正本清源、守正创新，缔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

On the Basic Issues of Marx and Engels' Cultural Perspective

NIU Sigi

Abstract: Marx and Engels defined culture in several different dimensions including civilization, literature and art, as well as level of knowledge, education and ideology. They expressed its essence as human spiritual activities and products, which reflect human objective material activities meaning “human objectification of essential power”. The evolution laws of culture are embodied in th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spiritual production and material production, the alienation of spiritual production by ideology, and the diverse development of culture. Marx and Engels' cultural perspective has the fundamental attribute of reality and practice, the spiritual essence of criticism and argumentation, and the distinctive sign of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in terms of qualitative characteristics. The status and function of culture is reflected in the fact that it is a material force with critical quality and a powerful spiritual weapon to liberate and develop people. The cultural perspective of Marx and Engels closely revolves around the value of realizing people's free liberation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in which human beings are the fundamental driving force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human progress is the fundamental measure of cultural development.

Keywords: Marx and Engels; Cultural Perspectiv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deology; Human Liberation

推动西方革命的文化批判^{*}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逻辑

卢文忠^{**}

【摘要】为了推动西方无产阶级革命，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的基本思想和批判精神为基础，特别突出了解决精神层面上的思想文化问题对于改变世界的现实意义。卢卡奇以阶级意识为核心的物化批判、柯尔施以恢复哲学为核心的哲学批判、葛兰西以文化霸权为核心的文化批判、布洛赫以希望思维为核心的理想批判，共同展现了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逻辑。

【关键词】西方革命；文化批判；无产阶级；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开始于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对第二国际和以苏联为主导的第三国际教条化马克思主义的批判。”^①在这一批判中，以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以及布洛赫为主要代表的西方无产阶级的理论家、革命家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重构了一种独特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面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初的特殊革命形势，深入地分析和批判西方社会的文化问题，探求改变资本主义现存社会的根本出路。在这一问题上，对于马克思而言，“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②人们要实际地改变世界就必须运用物质现实意义上的“武器的批判”而不是精神文化意义上的“批判的武器”。然而，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既来自马克思思想，又偏离马克思思想，运用了一种与马克思相反的批判方式——用“批判的武器”代替“武器的批判”，在改变世界的问题上呈现出一

*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及其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当代价值研究”（16YJC710029）的阶段性成果。

** 卢文忠，广东警官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

① 程恩富、吴文新主编《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2019年第2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9页。

种脱离物质现实意义上的变革而注重精神文化意义上的变革的文化转向。“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一个‘文化转向’，……仿佛与马克思这位历史唯物主义的创始人背道而驰”。^①这种文化转向实质上是一种基于革命立场、从意识和精神层面上实现社会变革的文化批判，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意识形态对人的意识、精神、思想乃至整个生活过程造成的异化。阶级意识、哲学精神、文化霸权、希望思维成为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社会进行文化批判的核心范畴和理论武器，这种文化批判力求通过人的主体性力量来恢复主客体相统一的总体性原则，着重于从解决精神层面上的思想文化问题来达到改变世界和实现人的解放的根本目的。这种基于西方革命立场的文化批判构成了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逻辑。

一 物化批判：以阶级意识为核心的批判逻辑

在推动西方革命的文化批判中，卢卡奇以阶级意识为核心的物化批判展现了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逻辑。“卢卡奇的文化批判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批判，其独特性并不只是在于对社会精神现象的理论理性批判或意识形态领域的纯粹思想斗争，而且在于试图以阶级意识为根本基础和决定力量来促发阶级革命的实践生成。”^②

（一）批判资本主义的物化现象

对于马克思而言，“唯物主义者的文化批判从历史发展的维度把具体的现实归结为资本主义的异化现实并寻求资本主义条件下异化劳动中导致这种异化的根源”。^③犹如马克思对异化的批判，卢卡奇揭示了人在发达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实践活动和生存方式的物化状态，特别是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批判了无产阶级所遭受的物化困境——劳动异化和生活异化。“人自己的活动，人自己的劳动，作为某种客观的东西，某种不依赖于人的东西，某种通过异于人的自律性来控制人的东西，同人相对立。”^④在卢卡奇看来，人的劳动异化实际上是工人阶级的商品化和孤立化。商品化意味着工人沦为被消费的商品，工人以商品的形式进入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过程，从而造成人的主体性被物化为物的客体性，主体性的活动物化为客体性的过程。与此同时，商品化也意味着人处于孤立化的物化状态，人在被切断的“有机”生产劳动过程中以及在被加到“异己的系统”中变成“孤立的分子”，资

① 陆扬：《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史》，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8，第125页。

② 卢文忠：《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文化批判的逻辑进路及当代启示》，《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③ Teresa L. Ebert. *The Task of Cultural Critiqu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9, p. 45.

④ [匈]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2017，第134页。

本主义合理化、机械化的劳动分工由此割裂和物化了工人阶级的意识。而且,工人阶级的物化状态还蔓延为整个社会的物化困境,人的劳动异化“合理地”衍生出人的生活异化。

在卢卡奇看来,人的物化状态的严重危害在于人的心理人格的物化。“随着对劳动过程的现代‘心理’分析(泰罗制),这种合理的机械化一直推行到工人的‘灵魂’里;甚至他的心理特性也同他的整个人格相分离,同这种人格相对立地被客体化。”^①资本主义的物化现象不仅是对人的物质劳动过程的外在控制,更是对人的精神生活过程的深层破坏。这样一来,物化必然消弭和阻滞了无产阶级发挥自身“最优秀的力量”——阶级意识,使人丧失了否定和超越现存社会的批判精神。

(二) 彰显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

资本主义物化现象造成的危害在于以劳动异化和生活异化的方式破坏了无产阶级以主体性为实质力量的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总体性。对此,卢卡奇把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作为批判物化现象、变革现存社会的“目标和武器本身”,即用精神文化层面上的“批判的武器”来发挥马克思所指的“武器的批判”的作用。“因为它的阶级意识,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后的阶级意识,一方面必须要和揭示社会本质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必须实现理论和实践的越来越内在的统一。”^②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展现人的主体性力量的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总体性原则。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本质上就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否定和超越,是否定和超越人的物化状态的“最优秀的力量”。

卢卡奇进一步指出,经济危机的暴发是无产阶级变革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契机,而这种变革取决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阶级意识是无产阶级实现社会革命的决定性力量。这种革命立场实际上已经偏离了马克思坚持以“武器的批判”来改变世界的革命立场,展现出一种意识革命意义上的批判方式:运用“批判的武器”也能够达到“武器的批判”的效果。

(三) 推动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

卢卡奇指出:“因为连无产阶级本身也只有当它采取真正实践的态度时,它才能克服物化。”^③这意味着,阶级意识作为一种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总体性原则,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中才能真正地否定和批判物化现象,只有这样才能克服

①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2017,第135页。

②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2017,第117~118页。

③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2017,第269~270页。

人的劳动异化、生活异化以及由此造成的心理人格的异化。卢卡奇以阶级意识为核心的物化批判，实质上是以革命实践为核心的文化批判，把对物化现象的文化批判落脚于对整个物化世界的革命实践。

尽管以阶级意识为核心的物化批判夸大了主体性的阶级意识的革命意义，把意识革命视为社会革命的决定性因素，企图以意识层面上的批判方式作为改变世界的“武器的批判”，但是卢卡奇从“最优秀的力量”的意义上把阶级意识视为决定社会变革的基础，恰恰是为了从思想文化上推动无产阶级克服异化的革命实践，坚持通过革命实践的方式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对物化现象以及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否定和批判。在这一问题上，卢卡奇以及柯尔施、葛兰西、布洛赫的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逻辑与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可谓殊途同归，把批判的方向最终指向无产阶级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实践。

二 哲学批判：以恢复哲学为核心的批判逻辑

在推动西方革命的文化批判中，柯尔施以恢复哲学为核心的哲学批判展现了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逻辑。恢复哲学就是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的决定性地位，批判各种否定马克思主义具有哲学本性的错误立场，凸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批判精神和革命向度。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理论上以辩证的方式、在实践上以革命的方式”理解现存社会，具有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革命精神，“是一种把社会革命作为活的整体来把握和实践的理论”。^①按照马克思的话来说，这种哲学是一种能够掌握群众而变成物质力量的即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革命的理论。柯尔施以哲学批判的方式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一种反对整个现存社会的“武器的批判”。

（一）回应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危机

在柯尔施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本性就是改变世界、改造社会、批判现实，对现存社会持以辩证的理解，即坚持从革命的立场对现存社会进行否定和超越。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0世纪初资本主义的演变中出现了日益增长的危机迹象——资产阶级哲学教授们以虚无主义的方式，以及无产阶级第二国际以修正主义的方式一同否定马克思主义具有的哲学本性，从虚无化、实证化的立场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这就必然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丧失了反对现存社会的革命向度。这种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性的危机造成的严重危害就是破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革命向度。

那么，柯尔施的哲学批判首先是分析和揭露这种哲学危机。否定马克思主义的

^① [德] 卡尔·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王南湜、荣新海译，重庆出版社，1989，第22～23页。

哲学本性实质上是扭曲了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以辩证的方式”理解现存社会的理论品质,尤其是无产阶级第二国际从修正主义的立场上将马克思主义扭曲为所谓的“经济决定论”,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条件的不足决定了无产阶级不具备社会革命的条件。由此可见,对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以辩证的方式”理解世界的哲学本性的否定必然会推向对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上以革命的方式”改变世界的哲学本性的否定。那么,这样一来就会从思想文化上消弭和阻滞无产阶级反对现存社会的批判精神,从而妨碍和破坏无产阶级反对现存社会的革命实践。

(二) 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本性

对于柯尔施而言,要从根本上推动无产阶级革命,就必须恢复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旨在改变世界的哲学本性。“它是一种革命的哲学,它的任务是以一个特殊的领域——哲学——里的战斗来参加在社会的一切领域里进行的反对整个现存秩序的革命斗争。”^①这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性的恢复,就是从观念上形成一个消灭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现实的构成部分,通过这种恢复,无产阶级在思想意识上形成一种否定和超越现存社会的哲学本性。

更深入地看,恢复马克思主义否定和超越现存社会的哲学本性,实际上就是恢复被破坏了的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革命向度,从总体性意义上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那么,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本性,就必须批判各种否定和歪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错误思想。柯尔施的哲学批判,不仅要分析和揭露哲学危机,更要分析和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不仅要与资产阶级哲学、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进行斗争,还要对其他歪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观点进行斗争。柯尔施批判了反总体性即割裂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关系的庸俗马克思主义,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固有的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革命向度,只有通过这种恢复才能推动无产阶级反对现存社会的革命实践。

(三) 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哲学革命

柯尔施以恢复哲学为核心的哲学批判,其根本目的在于从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总体性意义上推动西方无产阶级反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理论上的批判和实践上的推翻在这里是不可分离的活动,这不是在任何抽象的意义上说的,而是具体地和现实地改变资产阶级社会的具体和现实的世界。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唯物主义原则的最精确的表达。”^②在这一意义上,柯尔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性的恢复,实质上是以唯物史观为基础、以社会革命为导向的一种哲学革命,即哲学上的批判(并通过哲学掌握无产阶级的方式达到)与实践上的推翻

① [德] 卡尔·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王南湜、荣新海译,重庆出版社,1989,第37~38页。

② [德] 卡尔·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王南湜、荣新海译,重庆出版社,1989,第52~53页。

相统一的革命向度，通过哲学层面上的批判促成现实层面上的革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精神转化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柯尔施的哲学批判是一种基于革命立场的哲学批判，是以革命性的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哲学批判，充分展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改变世界的革命精神。

正是以唯物史观作为理论基础，柯尔施必然把实现人的解放作为哲学批判的价值追求。“在柯尔施看来，无产阶级不仅在物质经济上受资产阶级统治，而且在精神文化上也受其支配。那么，无产阶级要实现革命，并使自身从旧社会的精神支配中解放出来，就必须成为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① 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本性有助于无产阶级把哲学用作改变世界的“武器的批判”，促成无产阶级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专政中实现思想解放，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代替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摆脱资产阶级所谓的民主和思想自由对无产阶级的精神支配。也就是说，只有坚持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哲学批判，以及由这种哲学批判所推动的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实践，才能彻底实现无产阶级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上的自由和解放。

三 文化批判：以文化霸权为核心的批判逻辑

在推动西方革命的文化批判中，葛兰西以文化霸权为核心的文化批判展现了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逻辑。葛兰西从西方市民社会和文化的实际出发，揭示出市民社会以“强大的堡垒和工事”的方式为资产阶级维系阶级统治提供了一种文化霸权。葛兰西文化批判的任务就在于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霸权，揭露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无产阶级造成的精神统治，把夺取文化领导权视为推动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关键因素。

（一）把握西方市民社会的特征

葛兰西从东西方市民社会的比较中找到了推动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根源。相比之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具有东方国家未开化的市民社会，从而能够把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维系阶级统治、抵制革命形势的一种社会屏障。

据此，葛兰西把马克思提出的经济活动意义上的市民社会重新解释为文化活动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共同构成了在整个社会中行使不同职能的上层建筑。“这两个阶层一方面相当于统治集团通过社会行使的‘霸权’职能，另一方面相当于通过国家和‘司法’政府所行使的‘直接统治’或管辖职能。”^② 按照葛兰西的理解，市民社会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属于思想文化意义上的上层建筑，是资产

① 卢文忠：《论柯尔施的哲学批判及其当代价值——纪念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柯尔施诞辰 130 周年》，《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4 期。

② 〔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第 7 页。

阶级建立文化霸权并通过文化霸权对政治国家发挥强大的稳定作用的“堡垒和工事”。这也就意味着,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通过市民社会的文化霸权以及政治国家的直接统治对无产阶级实行双重支配,从文化职能上消弭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从政治职能上压制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

(二) 争夺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性

葛兰西以文化霸权为核心的文化批判,就是要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霸权,在市民社会中与资产阶级进行思想文化斗争,通过争夺文化领导权来推动西方无产阶级革命。换句话说,为了稳定自身的统治秩序,资产阶级要建立一种与自身利益相适应的文化霸权;同样,为了推翻现存的统治秩序,无产阶级也要建立一种与革命实践相适应的文化霸权。那是因为,文化霸权具有组织人民群众的意识形态功能,“霸权主要指的是一个阶级团结和凝聚广大群众的能力”。^①这意味着,资产阶级建立文化霸权的意义在于组织人民群众并使之从思想文化上认同现存社会的统治秩序。相对而言,无产阶级争夺文化领导权的意义则在于组织人民群众,并使之从思想文化上批判现存社会的统治秩序。争夺文化领导权决定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进程。

葛兰西深入地剖析了资产阶级建立文化霸权的主体条件——知识分子。所谓文化霸权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国家“代理人”的形式建立和行使霸权职能,是知识分子从思想文化层面对人民群众进行“组织”,从思想文化上消弭无产阶级反对现存社会的革命精神。面对这种文化霸权的影响,葛兰西提出为了取得革命的胜利,无产阶级必须针锋相对地建立自己的文化阵营,通过知识分子的思想文化批判与资产阶级争夺文化领导权。更重要的是,争夺文化领导权需要“有机知识分子”,发挥其“有机性质”。“只有在知识分子和普通人之间存在着与应当存在于理论和实践之间的统一同样的统一的时候,人们才能获得文化上的稳定性和思想上的有机性质。”^②也就是说,有机知识分子是能够与人民群众有机结合、对现存社会进行文化批判的革命主体,教育和启发民众形成反对资产阶级统治秩序的批判意识和革命精神,从思想文化上促进人民群众支持和投入无产阶级革命。按照马克思的话来说,有机知识分子的知识一旦被群众掌握,也能变成改变现存社会的物质力量。

(三) 阐发实践哲学的双重任务

对文化霸权的批判,对文化领导权的争夺,实际上是面向革命的文化实践,归根结底是为了彰显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精神,推动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在葛兰西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上就是反映了人与现实密切相关的实践性的理论,具有实

① [英] 乔治·拉雷恩:《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研究》,张秀琴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第86页。

② [意] 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第239页。

践哲学的独特内涵。实践哲学“对已经存在的活动加以革新，并且使之成为‘批判的’这样的问题”。^①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实践哲学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哲学，展现出否定和超越现存社会的革命向度。

葛兰西从西方市民社会的特征出发提出了实践哲学的双重任务：“战胜形式精致的现代意识形态，以便组成自己独立的知识分子集团；教育在文化上还处于中世纪的人民大众。”^②换句话说，实践哲学的双重任务实际上是文化批判和思想启蒙。就前者而言，文化批判实质上就是对资产阶级文化霸权及其各种文化职能、文化形式的否定和批判。在实践哲学的批判视域下，葛兰西还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必须与群众相结合，并以此使自身成为对现存世界的自觉的批判力量。就后者而言，哲学必须与群众相结合，从而使实践哲学在与群众的结合中转变为群众的思想，实践哲学由此转变为掌握群众并进行文化批判、意识形态斗争的实践性的哲学。可见，葛兰西不乏马克思“批判的武器”的哲学立场，也不乏马克思关于“武器的批判”的革命精神，力求通过文化上的战斗来达到对旧世界的批判。

四 理想批判：以希望思维为核心的批判逻辑

在推动西方革命的文化批判中，布洛赫以希望思维为核心的理想批判展现了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逻辑。布洛赫从希望的维度上充分建构和展现了一种否定和超越现存社会的理想哲学，以理想批判的方式彰显了马克思旨在改变资本主义，以及实现人的真正自由的革命精神。布洛赫的理想批判是对空想意义上的传统乌托邦的批判，并坚持建立一种为人们带来改变世界的希望、尚未实现的具体的乌托邦。布洛赫以希望思维为核心的理想批判成为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诉诸文化革命和意识革命的批判进路上的重要内容，强烈地展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独特的文化批判精神。

（一）基于希望的超越性的哲学

对于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而言，西方革命的胜利以及人的自由的实现，取决于人的主体性的生成以及无产阶级对于意识革命的文化自觉。在布洛赫的文化批判视域中，希望是人的主体性以及无产阶级的意识革命的根本理论支点，是人们超越现存世界的文化批判精神。布洛赫以此展现了基于希望的超越性的哲学理论。

对于布洛赫而言，希望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期盼和向往，而是人们批判现存世界和发现未来世界的积极活动，其文化意义所象征的是人们对当下持以超越性理解的思维。“思维就意味着超越。”^③希望就是超越性的思维，并以超越性的思维方式

① [意] 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第240页。

② [意] 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第303页。

③ [德] 恩斯特·布洛赫：《希望的原理》，梦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第2页。

来看待和理解现存世界,实质上正是对现存世界的否定和批判。而且,布洛赫进一步指出思维所具有的超越性,不仅展现出批判旧事物的维度,更展现出指向新事物的维度。“这种超越包含着一种新东西,这东西正是在动荡的现存东西中被中介的东西,尽管为了显露自身,现实的超越最极端地要求指向新事物的意志”。^① 希望已不仅仅是一种主观性的思维方式,更是一种内在于并支撑着人的生存方式的文化结构,甚至是人所特有的存在方式。这意味着,人有了希望,才能形成一种超越现存状态的思维、重建自己的生存方式、改变困境和持续生存乃至变革整个现存社会的根本动力,才能获得构建全新精神生活过程的根本条件。在布洛赫看来,真正意义上的希望思维必须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基础之上。“这种思维乃是腐朽的代替物,亦步亦趋的代理人,即反动地、图示化地反映时代精神的废物,这种思维势必排挤新发现的东西。与此相对照,在具体的超越的意识化中,马克思却表明了转变。”^② 从这一意义上说,布洛赫基于希望的超越性的哲学,实质上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希望哲学,以超越性的希望思维展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和表达了改变现存社会的革命立场。对于无产阶级而言,要有希望,有“白日梦”,只有这样才能形成超越现存社会的批判意识和革命精神,才能在批判现实中走向未来。

(二) 批判现实的具体的乌托邦

在布洛赫看来,具有超越性维度的希望,就是在超越现存的旧事物中指向未来的新事物。这种新事物,是尚未存在的未来向度,从根本上说就是超越异化的资本主义的具体的乌托邦,以具体的乌托邦的方式,从思想意识上超越资产阶级统治的现存社会。

布洛赫将面向尚未存在的希望喻为“光”：“在光的假象中,努力塑造和推进类似过程的和未完结的总体,这里,所谓‘光’就是已知的希望,辩证地和唯物主义地理解的希望。”^③ 希望作为人的内在文化结构以及人之存在方式,从哲学的文化精神上看,必定是面向未来、走向未来的理想哲学,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希望哲学,其批判精神彰显出指向新世界的未来意义。布洛赫把对希望哲学的理论建构定位于马克思主义的未来哲学及其标志性意义——“尚未”：人及其所处世界是一个有待实现的发展过程。正是由于尚未存在,人及其所处世界在当下并不是处于既定的、注定的状态,而是处于开放的、创造的过程。希望所象征的根本意义,正是人及其所处世界不断走向和创造尚未存在的新世界、新事物。这一理论范畴无疑是对宿命论以及经济决定论等错误思想的有力批判。布洛赫进一步指出未来哲学

① [德] 恩斯特·布洛赫：《希望的原理》，梦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第2~3页。

② [德] 恩斯特·布洛赫：《希望的原理》，梦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第5页。

③ [德] 恩斯特·布洛赫：《希望的原理》，梦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第10页。

的根本特点在于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活在这种集合的前线意识中，从而它是信任历史事件的、献身于新东西的、已知趋势的理论—实践。”^①在这一点上，布洛赫同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一样，都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总体性原则，并以此作为变革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条件。

在布洛赫的希望思维中，未来哲学中的未来，同时也是批判和超越现存世界的新世界——具体的乌托邦。希望哲学意义上的乌托邦，绝非传统意义上的空想主义，实质上是在批判现实中所指向的尚未实现的未来理想，是希望的根本内涵在未来意义上的具体体现。对此，布洛赫明确指出：“这恰恰表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威力和真理，即马克思主义驱散乌云，向前推进人的梦想，但是它并不熄灭人的梦中腾起的熊熊火柱，而是通过具体的乌托邦使它变得无比炽烈。”^②这种乌托邦是非抽象的、具体的未来，是对抽象的、毫无根据的理想的否定，又是对具体的、尚未实现的理想的肯定。这种乌托邦建构了希望思维的超越性维度，是人们在当下改变既存状态的“唯一值得保持的超越的东西”。在布洛赫的希望思维中，乌托邦绝不是对未来的幻想和设计，首先是对当下的批判和超越，具体的乌托邦不是设想社会形态的理论范畴，而是批判社会现实的文化精神。这种乌托邦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和哲学内涵，因而决定了布洛赫的理想批判不仅蕴含了批判现实的文化精神，更富有实现人的自由的革命旨趣。

（三）实现人的自由的革命旨趣

按照布洛赫的理解，希望是人的内在文化结构以及人之存在方式，希望为人们改变困境、持续生存乃至变革整个现存社会提供了最根本的精神力量。对于以马克思主义为哲学基础的希望思维而言，希望以及乌托邦实质上就是一种革命的精神和力量，希望哲学实质上就是一种革命思想和理论，其革命旨趣就在于通过变革资本主义来实现人的自由。既然希望是对现实进行超越性理解的思维，既然乌托邦是超越现存世界的文化精神，既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未来的哲学，这就意味着希望思维的革命旨趣在于克服异化，实现自由。布洛赫指出：“向前的唯物主义或马克思主义暖流乃是一种‘到家’的理论与实践，或者源自不适当的客观性的出口。借助于此，世界不再使自身的主体与客体异化，也就是说，把它们发展成为自由。”^③布洛赫从希望哲学的批判立场鲜明地展现了马克思关于消灭阶级和建立无阶级社会的革命理论，其独特之处在于主张以希望作为文化批判的力量来消灭异化并最终通向无阶级社会，在具体的乌托邦中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

在关于实现自由的问题上，以希望思维为核心的理想批判固然立足于文化和意

① [德] 恩斯特·布洛赫：《希望的原理》，梦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第10页。

② [德] 恩斯特·布洛赫：《希望的原理》，梦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第162页。

③ [德] 恩斯特·布洛赫：《希望的原理》，梦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第248页。

识层面上的革命,但是并没有完全脱离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生活的基础性意义的基本观点,依然十分重视物质生活的匮乏对变革旧世界的重要意义。布洛赫指出:“革命旨趣总是从饥饿开始,饥饿启发穷人,饥饿变成炸毁匮乏之监牢的爆炸物。”^① 这里充分展现了布洛赫文化批判理论中所具有的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同时,布洛赫还注意到,如果说希望是无产阶级变革资本主义的文化动力,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那么资本主义的统治阶级同样会使用代表其根本利益和“文化上使其美化”的意识形态来压制无产阶级的希望思维。在布洛赫看来,在希望思维的导向下,人们将“通过不断具体化的革命历史”来超越当下的资本主义及其所造成的异化的生存方式,人们将开辟“直至无阶级的人”的具体的乌托邦的“直路”,而人本身的能力即对异化之克服的“资质”、为自由而抗争的“素质”是通向自由王国的“直路”。

总而言之,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从阶级意识、恢复哲学、文化霸权、希望思维的精神层面上改造和发挥了马克思的理论,展现出推动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文化批判,把马克思立足于物质基础变革的实践取向转向了立足于精神文化批判的理论取向,把文化批判作为推动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武器,通过文化批判来激活无产阶级的主体性,并在这一基础上恢复主客体相统一的总体性原则。这实质上是把意识革命和文化革命作为改变旧世界的决定力量,把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精神状态的变革视为实现人的解放的关键因素。“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虽有局限性并出现了偏离,但其中也有不少积极元素,在一定的意义上有借鉴作用。”^② 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种偏离中以文化批判的方式锻造了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的武器”,并力求借此来促成“武器的批判”。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为批判和超越发达工业社会、探索 and 实现人的自由构建了重要的理论进路,并提供了独特的思想武器。

Cultural Critique of Promoting the Western Revolution

—The Critical Logic of the Early Western Marxism

LU Wenzhong

Abstract: In order to promote western revolution of proletariat, Early Western Marxism especially made an emphasis on cultural issues resolved in spiritual dimension based on Marxism's basic ideas and critical spirit. Lukács's critique of materialization centered on class consciousness, Korsch's philosophical critique centered on restoring philosophy,

① [德]恩斯特·布洛赫:《希望的原理》,梦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第68页。

② 刘卓红:《唯物史观创立进程中的马克思早期文化批判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年第8期。

Gramsci's cultural criticism centered on cultural hegemony, Bloch's ideal critique centered on the thought of hope, all demonstrated the critical logic of the early Western Marxism.

Keywords: Western Revolution; Cultural Critique; Proletariat; Early Western Marxis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变与不变：中国共产党奋斗目标百年演进 与规律探赜

李慧敏*

【摘 要】中国共产党不变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为实现这一最高理想，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至今，结合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逐步形成了反帝反封建、土地革命、抗日救国、建立新中国、“一化三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两个十五年”等阶段目标。党奋斗目标的百年发展演进表明，党在始终坚持共产主义最高奋斗目标的同时，也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确立各阶段奋斗目标的实践特质。

【关键词】共产主义；民族复兴；与时俱进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在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之前，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不断地进行反抗和革命的努力。反帝反封建的农民起义、奋起救亡的资产阶级维新运动、推翻封建统治的资产阶级革命，这些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进步但均以失败而告终。中国共产党革命初期是以共产主义为目标的，随着实际革命斗争的深入，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中国人民现阶段最迫切的不是实现共产主义，而是反帝反封建。此后，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结合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分别提出了反帝反封建、土地革命、抗日救国、建立新中国、“一化三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个十五年”等阶段性奋斗目标，逐步带领中国人民走向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准确把握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奋斗目标的发展历程，深入探寻党奋斗目标的演进规律，对于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实现共产主义最高理想，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 李慧敏，中国矿业大学（北京）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一 中国共产党奋斗目标的演进理路

“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① 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初步掌握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知识分子们，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论断。这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坚持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同时不忘结合中国国情提出符合现实要求的奋斗目标，以向共产主义不断迈进。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奋斗目标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实践特质。

（一）革命时期党奋斗目标的演进理路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经历了从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到“反帝反封建”的转变，这是党奋斗目标的首次转变。中国人民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为救亡图存进行了不断的努力，这些努力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历史的进步但都以失败而告终，不适合中国革命道路。而中国共产党则以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为指导，结合中国革命实践，提出适合实际需要的阶段性目标，从而带领人民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根据党早期组织的革命运动经验，党的一大通过中国共产党纲领，将中国共产党的目标正式确立：“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以期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联合共产国际。”^② 中国共产党纲领的通过，表明党的奋斗目标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便在一大纲领的指导下，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领导中国人民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革命实践。中国共产党初期领导的共产主义革命在实践过程中曲折前进，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更加深入的学习，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产生了新的认识。尤其是华盛顿会议的召开，让中国共产党及人民深刻认识到帝国主义对中国政治的控制、经济的掠夺已愈加深。中国共产党随着革命斗争的深入，逐步认识到中国人民当时需要的不是实现共产主义，而是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的残忍压迫。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与当时的中国实际是不相适应的，所以在指导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必会遭受打击。所以共产党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开始结合中国国情，反思奋斗目标的现实性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将共产主义最高目标与中国现实革命目标相结合的首次尝试。最终于

^① 《李大钊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第103页。

^②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第86页。

党的二大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提出目前在中国革命实际状况下，党的奋斗目标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①这一宣言提出的民主革命纲领实现了中国共产党从共产主义最高目标到反帝反封建阶段目标的现实性跨进，为中国革命的正确进行指明了方向。这印证了中国共产党将最高目标与现实目标相结合的科学性，为党后续根据中国国情提出各阶段目标提供了借鉴。

以反帝反封建为目标的革命在遭受沉重打击之后，中国共产党结合革命现实的需要，开启了土地革命阶段性目标，主要目的是重新积蓄党的革命力量。开展土地革命、武装工农是中国共产党重新积蓄和扩大革命力量的重要途径，是为实现反帝反封建军阀这一阶段目标做的准备工作。八七会议的召开，正式确定共产党开展土地革命、广泛吸收工农革命力量的阶段性目标，这为党后续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奠定了初步基础。在土地革命期间，党确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逐步开创工农武装割据局面，主要积蓄力量武装反抗国民党新军阀的反动“进剿”。党的六大指出，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同时，会议明确了此时处于革命低潮期，重点要放在积蓄革命力量上。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指出：“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②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以农村为根据地，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在农村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路线，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伟大创举。实践证明，这一时期的革命准备工作为未来复兴中国革命找到了出路。

土地革命尚未完成，国民党还在对红军不断实行“围剿”之时，日本发动武装侵略东北的战争，中国正式进入抗日救国时期。随着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中国共产党于1935年在瓦窑堡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指出，党的总任务是“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③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民族危机加深，国内主要矛盾变化的实情，及时调整斗争目标为抗日救国。坚持避免内战，保存革命力量，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④至此，正是中国共产党及时认识到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并提出符合中国

①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第100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98~99页。

③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第501页。

④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第333页。

革命需要的阶段性目标，才取得了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

（二）建设、改革时期党奋斗目标的演进理路

抗战胜利后，中国人民渴望和平与安定，党便带领人民开始了建设新中国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一直奉行和平建国方针，在遭到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政策打击后，内战已不可避免。面对当时革命形势的发展，毛泽东指出：“那就是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① 建立新中国的过程是曲折的，代价是巨大的，结果是必然的。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完成了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任务，建立起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自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由革命目标转为建设目标，这是历史性的转变，是中国人民期盼已久的转变。虽然新中国成立之初民主革命的任务尚未完全完成，国际形势依然严峻，但中共中央不畏困难，有条不紊地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启建设新中国的伟大征程。

中国共产党自创立就确立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随着民族矛盾的解决和新中国的成立，党正式将社会主义建设提上日程。1952年，党提出了“一化三改”，这时党的奋斗目标是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将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国家。这一目标的确立也是党基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的建设发展和变化所作出的重大决策。周恩来指出：“集中地说，我国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就是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也就是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比重中逐步增长的时期。”^②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党的奋斗目标变为在新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上，迅速发展生产力，以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正式开启了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在视察人民生活时曾多次动情地提道：“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③ 随着党奋斗目标的确立，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开始重整旗鼓，加快改革建设的步伐，取得一系列非凡成绩。“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④ 在这一目标的引领下，党带领全国人民不断努力，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人民生活进一步改善、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综合国力明显增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牢牢把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大跨步地走向美好生活。习近平指出：“我们党在不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第462页。

②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第255页。

③ 《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第381页。

④ 《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第843~844页。

同历史时期,总是根据人民意愿和事业发展需要,提出富有感召力的奋斗目标,团结带领人民为之奋斗。”^①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对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充实和完善,顺应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的需要,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总布局。这一阶段目标的实现,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深化改革,推动经济社会健康持续发展,在注重经济建设发展的同时,全面推进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方面的协调发展。党中央针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提出把握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各项举措、坚持设计和发展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制度、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高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改善民生保障民生各项举措来保障该目标的实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关系到党和国家的新阶段奋斗目标的确立。习近平指出:“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发展条件,从二〇二〇年到本世纪中叶可以分两个阶段来安排。第一个阶段,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② 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变,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党中央提出了“两个十五年”奋斗目标,将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创造美好生活,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断前进,朝着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不断迈进。

二 中国共产党奋斗目标的规律探赜

(一) 党奋斗目标的“变”与“不变”之统一

从价值层面看,中国共产党不同时期的奋斗目标是结合中国国情,基于现实需要提出的,体现了党奋斗目标之“变”;综观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党所提出的奋斗目标都是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以共产主义为最高理想,体现出为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以期实现共产主义的“不变”价值依归。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奋斗目标主要分为两大部分,即革命目标 and 建设目标,革命目标解决的是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问题,建设目标解决的是如何建设好中国、发展好中国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共产主义为党的最高理想,这是中国共产党坚定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的精神标识,是永恒不变的。实现不同历史时期的奋斗目标是追求共产主

^①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第77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第22~23页。

义的历史过程和重要组成部分，是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共产主义不是一蹴而就的，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就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只有实现各阶段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解决社会面临的最迫切矛盾，共产主义伟大理想才能照进现实。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目标，制定纲领，领导群众，发动运动，因其奋斗目标与人民愿望不相符而遭受到了剧烈打击，而后转变为反帝反封建。这是中国共产党奋斗目标的首次转变，也是马克思主义最高理想与中国国情的现实结合，是奋斗目标之“变”，是马克思主义之“变”。党在争取民族独立以及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任何时期都不忘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坚持从民族和人民的共同愿望出发，确立自己的阶段性奋斗目标。

同时，党奋斗目标的百年演进体现了远大理想和共同理想的辩证统一关系。中国共产党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是永恒不变的，是对阶段性共同理想的规定和引导，阶段性共同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基础和前提。没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指引，阶段性的共同理想就会失去方向，没有阶段性共同理想的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也只能是空想。中国共产党在确立各阶段性奋斗目标时，都是以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为前提，各阶段共同理想的实现都是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奠定基础。现阶段，我国的共同理想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目标解决的是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有一定的时效性、渐进性和可变性；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关于人类未来理想社会形态的最高级，是全人类的最高理想，有一定的长远性、宏观性和稳定性。共产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基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脉络总结出来的，是从资本主义衍生、社会主义过渡而来的，共产主义不只是对未来某一社会形态的描述，而是指整个人类社会演进的历史过程。所以，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靠单个国家的力量就能实现的，这事关全人类的未来和希望。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家间联系日益紧密，中国共产党在努力发展自身的同时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党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同时，也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中国共产党以非凡的成绩和现实的举措，向世界宣告远大理想和共同理想的统一。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国力量不断崛起，闪耀着智慧之光的中国方案开始走向世界。

党奋斗目标的确立，既体现出中国人民最迫切的愿望，又规定了党和国家前进的方向和路线。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奋斗目标，是由中国历史发展现状决定的，也是由中国人民自我选择的。因此，无论是从党的自身建设还是从国家事业的全局来看，党的奋斗目标都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下，结合中国国情，以人民意愿为宗旨来确立，这是保证各项事业顺利进行的前提。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指出：“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① 这是党不变的宗旨，也是确立奋斗目标不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096页。

变的准则,革命时期人民渴望独立和解放,建设时期人民渴望发展和进步,党的奋斗目标在时代和人民的要求下,实现了“变”与“不变”之统一。中国共产党正是在坚持“变”与“不变”之统一的立场上,带领中国人民不断地实现阶段性奋斗目标。

(二) 党奋斗目标的确立依据和价值依归

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党奋斗目标百年演进的确立依据。在共产党成立初期,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封建军阀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党的奋斗目标基于社会主要矛盾确立为反帝反封建,目的是改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被压迫的状况。毛泽东强调:“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在发展过程中的变化,正是表现出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力量。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①

中国共产党善于抓住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矛盾,制定相应的策略和主张,从人民最迫切的愿望和理想出发,确立每一阶段的奋斗目标。在同一历史时期,社会存在诸多矛盾,其中必有一种主要矛盾,这一主要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规定和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主要是解决民族矛盾以及阶级矛盾,到建设时期的奋斗目标转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主要解决的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对于主要矛盾的准确把握,是确立党正确奋斗目标的基础,是党带领中国人民走向正确方向的保证。在确立革命和建设各阶段奋斗目标的过程中,党也出现过偏差,主要是由党对当时社会主要矛盾把握失误造成的。党创立初期的革命战争时期,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深化,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是与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不相符的,导致很多革命运动遭受打击;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等目标不符合当时生产力水平较低的社会主要矛盾,导致社会主义建设很长一段时间处于缓慢发展的状态。在不能准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的情况下,确立奋斗目标是危险的,对国家的建设和发展影响都是巨大的。从中国进入建设时期以来,党便牢牢地正确把握住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制定了符合时代要求的奋斗目标,得到人民的拥护,取得非凡的成就。新时代,党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习近平指出:“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② 新时代党提出的“两个十五年”目标,就是在深刻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基础上提出的,符合社会发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326~327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第9页。

展的客观要求。

党奋斗目标的确立体现出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价值依归。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历史，是坚持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百年历史，同时，党也根据时代和人民的要求，提出了不同历史时期的阶段性奋斗目标，且依靠人民的力量不断完成这些目标，体现了党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立场。中国共产党奋斗目标的百年历史，是由人民群众的力量推动实现的，为了群众，依靠人民，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带有明显的人民导向。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奋斗目标演进的历史，就是一部人民选择和人民创造的历史。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党非常重视人民的力量，坚定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基本立场。党各时期的奋斗目标由人民需要所规定又靠人民力量去发动，既代表了人民利益又依靠人民力量去实现。革命时期，正是基于人民对于独立与解放的渴望，以及为民族独立与解放不惜牺牲一切的革命意志，党才能带领中国人民走向胜利；建设时期，正是有人民对于发展和进步的渴望，以及为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的建设信念，党才能带领中国人民走向辉煌。正是有广大人民的参与，才为党带领人民追求奋斗目标提供了扎实的根基和不竭的动力，只有始终坚持为民的宗旨和依靠人民群众的导向，党的奋斗目标才能与时代相契合，与人民相联系。脱离人民群众的奋斗目标是不科学的，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三）党奋斗目标的与时俱进和实践特质

中国共产党奋斗目标的演进体现出党始终坚持从现实出发、与时俱进的实践特质，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集中体现。一方面，党各时期奋斗目标的确立是由社会主要矛盾决定的，社会主要矛盾决定了奋斗目标的内容和方向；同时，中国共产党奋斗目标的演进，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阶段性共同理想的辩证统一关系。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奋斗目标的演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深化的结果，符合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总体来看，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在把握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基础上，在曲折中不断前进，经受住了历史和人民的考验，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具体体现。全方位把握和总结中国共产党奋斗目标的演进规律，能够为党未来提出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阔步前进的奋斗目标提供基本规律遵循，为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奠定基础。

党奋斗目标的百年演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深化的结果，是与时俱进的，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伟大创举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既完成了革命任务，又走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在20世纪上半叶，革命与战争是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中国共产党广泛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与阶级斗争理论，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发展出了适应中国实际的毛泽东思想，用以指导中国革命和战争的实践。到20世纪后半叶，和平与发展成为中国面临的新问题，革命与斗争的理论已经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中国共产党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并借鉴苏联建设的经验，开启了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实践和探索中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① 党奋斗目标的实现离不开科学理论的指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是经过实践检验证明的科学理论。党的集体智慧是党奋斗目标百年演进的推动力量。党章明确规定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党的行动指南。从党章的规定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对于党制定和执行奋斗目标的重要作用。

总体来看，党的奋斗目标随社会历史发展潮流，在曲折中不断前进。党成立初期，由于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规律认识不足，未能确立明确的现实奋斗目标，遭遇挫折；革命时期，由于过分信任外部力量对于革命的作用，遭受打击；在由革命转为建设时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等错误路线，导致建设停摆。曲折与失误不可避免，党在奋斗过程中及时发现并调整，重新确立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目标，不断带领中国人民走向幸福，带领中华民族走向世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事关全人类的利益与希望。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无疑是向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迈进的伟大尝试，符合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符合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利益扩大到从全人类的利益出发的转变，这是党近百年奋斗积累的伟大成果，是党带领中国人民经过近百年的奋斗和探索，不断朝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迈进的一次伟大尝试。中国将同世界人民一道携手建设美好的世界。

Mutative and Constant: The Evolution and the Law of Centennial Goals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LI Huimin

Abstract: The highest goal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to realize communism. In order to realize this supreme goal, the party has gradually formed stage goals, including anti-imperialist and anti-feudal, agrarian revolution, anti-Japanese and national salvation, establishment of a new China, “One Transformation and Three Reforms”, build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uilding a well-off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① 《胡锦涛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6，第620页。

“Two Fifteen Years” and other phase goals by combining the practice of Chinese revolution, construction and reform. The evolution of the party’s goal over the past century shows that the party has always adhered to the highest goal of communism, while adhering to the combination of Marxism and Chinese practice, insisting on integrating theory with practice, and prac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establishing each stage goals from reality.

Keywords: Communism, National Rejuvenation, National Rejuvenation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浅析百年大党之“七无”真谛

刘泽刚*

【摘要】百年大党是怎样炼成的？我们可从无产、无私、无畏、无类、无欲、无我、无止这七个方面去寻找答案。无产指的是中国共产党乃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政党；无私说的是共产党人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立党为公，绝无私利可图；无畏则表现出共产党人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英雄壮举；无类则谈及共产党在各个时期的统一战线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革命和建设做出最大努力；无欲讲到要克制自我欲望，作为共产党人要摒弃不必要的世俗化贪欲，把人生精力奉献到党和人民的事业中去；无我是说共产党人以社会价值为重，从而忽略甚至牺牲个人的许多价值成分；无止即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一个开放的科学体系，需要与时俱进地加以丰富和发展，那么共产党人的追求当然就是无止境的。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七无”；百年华诞

1921 年，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只游船上，诞生了中国共产党。此后，它走过了风雨兼程、波澜壮阔的一百年。从 50 多名党员发展到如今 9500 多万党员的大党，从灾难深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中国共产党堪称传奇的奋斗历程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其彪炳史册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精心萃取。现笔者从以下七个方面略作探析。

一 “无产”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系统、集中地阐述道：“消灭私有制”，

* 刘泽刚，历任教育部《基础教育参考》编辑、《中国人大制度研究》编辑、《传奇人物》副总编，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

“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然后“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①

党的一大制定的党纲指出，确定党的名称是中国共产党；党的性质是无产阶级政党；党的奋斗目标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②

可见，中国共产党是地地道道的无产阶级政党，除了为无产者谋利益，别无选择。这是其远大事业的坐标原点，是解决“我是谁，为了谁”这一原则问题的逻辑起点。

我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可以说是地地道道的白手起家，通俗一点说，就是“要啥啥没有，只有命一条”。很明显，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起点，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所在。无论今天的百年大党缔造了什么样的辉煌业绩，树高千尺也忘不了这个本根。

“无私”

《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指出，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与群众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不允许任何党员脱离群众，凌驾于群众之上。^③

党章第一章第二条指出，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中国共产党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

回首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无私奉献的党员不胜枚举。^④

焦裕禄 1962 年被调到河南省兰考县担任县委书记。1964 年 5 月 14 日，焦裕禄被肝癌夺去了生命，年仅 42 岁。他在兰考担任县委书记时所表现出来的“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精神，被后人称为“焦裕禄精神”。

焦裕禄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他长期有病，家里人口又多，生活比较困难，可是他坚决拒绝给他救济。他说：“兰考，是个重灾县，人民的生产、生活都很困难，我们应该首先想到他们。要把这些钱用到改变兰考面貌的伟大事业上去，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汉译纪念版），中华书局，2012，第 44 页。

② 李捷、王顺生：《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第 64 页。

③ 参见《党章必修课》，中国言实出版社，2017，第 7 页。

④ 参见《党章必修课》，中国言实出版社，2017，第 8 页。

用到改善兰考人民的生活中去。”焦裕禄的办公桌、文件柜都是原兰考县委初建时买的，有不少地方破损。当时有人劝焦裕禄同志换个新的，他没有采纳这个建议，而是修了修照样使用。他用过的一条被子上有42个补丁，褥子上有36个补丁，同志们劝他换床新的，他说：“我的被子破了，是需更换新的，但应该看到，灾区的群众比我更需要。其实，我这就很好，比我要饭时披着麻包片，住在房檐底下避雪强多啦。”^①焦裕禄的衣、帽、鞋、袜都是拆洗很多次，补了又补，缝了又缝的，虽然破旧得很厉害，但是焦裕禄同志总是舍不得换。

又如，1979年，孔繁森第一次赴西藏工作，担任日喀则市岗巴县委副书记。在岗巴工作3年，孔繁森跑遍了全县的乡村、牧区，与藏族群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93年春天，年近50岁的孔繁森赴任阿里地委书记后，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全地区106个乡他跑遍了98个，行程达8万多公里，茫茫雪域高原到处都留下了他深深的足迹。在孔繁森的勤奋工作下，阿里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1994年11月29日，在完成任务返回阿里途中，孔繁森不幸因车祸殉职。

他曾在日记中写到，阿里的贫穷是我们的耻辱，带领群众致富是我们的天职。他生命的最后十天，还在为阿里的发展而奔波，办成了十件大事。就在牺牲的头天晚上还写下了《阿里亟待解决的十二个问题》，成为留在雪域高原的绝笔！在细微的方面，他把真诚、善良、博爱的胸怀，投入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奉献给了为人民做好事之中，以帮助别人为乐趣。正是这些点点滴滴，一个个无私助人的行为演绎了“仁爱”的高尚。他经常随身带着小药箱，自己花钱买药品，在工作之余为藏族同胞看病，口对口为病人吸痰，用胸口为聋哑老人暖脚，三次献血900毫升，抚养在地震中失去父母的孤儿，等等。孔繁森对自身价值的自我实现意识，对个人理想与社会发展需要关系的认识，堪称无私胸怀的经典版。

如今，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严峻斗争中，广大党员更是身先士卒、无私奉献，以共产党人的使命与担当谱写了一页页感天动地的壮丽诗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指出，抗疫斗争伟大实践再次证明，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无比坚强的领导力，是风雨来袭时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中国共产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始终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得到了最广大人民衷心拥护和坚定支持，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力和执政力的广大而深厚的基础。

三 “无畏”

1955年，毛泽东同志发表演讲：“我们共产党人是以不怕困难著名的。”^②他指出：“我们在战术上必须重视一切困难。对于每一个具体的困难，我们都要采取认

^① 引自【建党百年专栏】忆往昔峥嵘岁月（74）兰考；https://www.sohu.com/a/470797159_121124290。

^②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392~393页。

真对待的态度，创造必要的条件，讲究对付的方法，一个一个地、一批一批地将它们克服下去。根据我们几十年的经验，我们遇到的每一个困难，果然都被克服下去了。种种困难，遇到共产党人，它们就只好退却，真是‘高山也要低头，河水也要让路’。”^① 这里就得出一条经验，它叫我们可以藐视困难。这说的是在战略方面，是在总的方面。不管任何巨大的困难，我们一眼就看透了它的底子。所谓困难，无非是社会的敌人和自然界给予我们的。

正因为有了这种“不在话下”的大无畏精神境界，中国共产党人才能够从白色恐怖的血腥屠杀中爬起来，掩埋好同伴的尸体，拿起手中的长枪继续奋斗；能够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中以少胜多、以弱克强、出奇制胜、力挽狂澜；能够铸就二万五千里长征这种战天斗地、史无前例的革命神话；能够将不可一世的日本帝国主义赶出国门，直到向中国递交投降书；能够以“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摧枯拉朽之势粉碎国民政府在大陆的反动统治、消灭一切纸老虎；能够在一穷二白的大地上以辉煌成就来回击对中国共产党的冷嘲热讽；能够在世界社会主义遭遇严重挫折的风口浪尖上，坚定不移地走中国自己的道路，不怕鬼、不信邪，以铁的事实树立起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

由此，共产党人“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可见一斑。中国共产党人就是始终秉持这种初心和使命，练就了“金刚不坏之身”，获得了为理想信念赴汤蹈火、舍生忘死、任劳任怨、鞠躬尽瘁的革命勇气。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时代呼唤中国共产党人要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把握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得到人民衷心拥护。在当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节点上，绝不能有“喘喘气、歇歇脚”的思想，共产党人一定要深刻领会我们党的初心和使命，以坚定的理想信念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克服软骨症、无能症、恐惧症，不惧风雨、砥砺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四 “无类”

共产党的“无类”境界，就是寻求各阶级、各阶层和各种社会成分彼此之间最大利益的汇合点，求同存异，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期最大限度地完成好某一历史时期的革命或建设任务。其统一战线就广义而言，是指不同社会政治力量在一定条件下，为了一定的共同目标而建立的政治联盟或联合；就其狭义而言，是指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战略策略，主要是无产阶级自身团结和同盟军问题。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统一战线都是中国共产

^①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393页。

党的一大重要法宝。

列宁说过,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可能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这对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和以后的时期,都是一样适用的。有两种同盟军,一种是直接的,即尽可能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另一种是间接的,即充分利用敌人营垒中的一切矛盾。在这里,根据具体的环境和条件采取必要的妥协,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争取同盟军的一条重要策略原则。^①

国民大革命时期的国共统一战线是广大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参加的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土地革命时期的工农民主统一战线包括两个联盟:工、农、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的联盟;工、农、知识分子和非劳动者的联盟。抗日战争时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第二次合作)包括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以及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亲英美派。解放战争时期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包括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广大华侨、各界民主人士及其他爱国分子和国民党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地方实力派。社会主义新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联盟,是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国内国际场合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将共产党人的无类境界提升到更高更广的层次。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总书记再一次提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18年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将《序言》中“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的交流”修改为“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引起各国关注,成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国际流行语,大家共同致力于“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五 “无欲”

回首我国古代社会的兴衰史,我们不难发现无数团体、政权或领袖人物在歌舞升平、灯红酒绿中寿终正寝,继之而起的便是新兴的历史人物休养生息、清心寡欲、无为而治,可往往是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有时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又重复昨天的故事,在金钱、权利等名利双刃剑的面前表现得无能为力、任由宰割。因此他们都跳不出兴衰治乱、往复循环的历史周期律。

因此,党章第四十条规定了党的纪律,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执纪必严、

^① 参见《列宁论党的建设问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第133页。

违纪必究，抓早抓小、防微杜渐，按照错误性质和情节轻重，给以批评教育直至纪律处分。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让“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党纪处分、组织调整成为管党治党的重要手段，严重违纪、严重触犯刑律的党员必须开除党籍。^①

毛泽东同志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发出“两个务必”的号召：“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②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从西柏坡前往北京。路上，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2013年6月18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议上强调：“这次教育实践活动的主要任务聚焦到作风建设上，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③；“要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④ 这“四风”是违背党的性质和宗旨的，是当前群众深恶痛绝、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也是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的重要根源。“四风”问题解决好了，党内其他一些问题解决起来也就有了更好条件。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进一步指出，坚定不移深化反腐败斗争，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重点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案件，聚焦政策支持力度大、投资密集、资源集中的领域和环节，坚决查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审批、国企改革、公共资源交易、科研管理等方面的腐败问题。深化金融领域反腐败工作，持续惩治国有企业腐败问题，加大对政法系统腐败惩治力度，深入推进反腐败国际合作和国际追逃追赃。深化标本兼治，做实以案促改、以案促治。足见其反腐决心！^⑤

六 “无我”

2019年3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罗马会见意大利众议长菲科时谈道，我愿意做到一个“无我”的状态，为中国的发展奉献自己。“我将无我，不负人民”八

① 《党章必修课》，中国言实出版社，2017，第1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438~1439页。

③ 《习近平关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论述摘编》，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第21页。

④ 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3年6月18日。

⑤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日报》2021年1月25日。

个字,言简意赅地道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世界的辩证法,提纲挈领地诠释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鲜明体现了党性和人民性的高度统一,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精神族谱的最新表达。“我将无我,不负人民”,出发点在“人民”,落脚点也在“人民”,这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人格的鲜明价值指向。^①“思想境界提高了,道德修养加强了,对个人的名誉、地位、利益等问题就会想得透、看得淡,知所趋、知所避、知所守,不为名所累、不为利所困、不为情所惑,就能自觉把精力最大限度地用来为国家和人民勤奋工作,而不去斤斤计较个人得失,不去利用手中的权力牟取私利。”^②

“无我”概念,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带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表现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追求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境界,注目的是天下苍生。“无我”,其实可以称为“大我”。习近平总书记讲“无我”,并将其与“不负人民”相结合,以无我之境界、为民之情怀,彰显了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无我”,是共产党人的大境界。从在党旗下庄严宣誓那一刻起,“我”就不再仅仅属于我,而是交给了党、交给了人民。“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铮铮誓词中寄托的正是共产党人的“无我”。在和平环境里,对“无我”的诠释,就是一心为公、忘我奉献,心里始终装着党的要求、国家的大局、人民的利益、工作的需要,而不是驰于空想、骛于虚声,拈轻怕重、斤斤计较,特别是要以“无我”之境,摆脱名缰利锁,积极干事创业。

认识自我是一个贯穿古今的哲学难题。一般认为,认识自我的途径、对自身价值所持有的观点,是自我观的重要内容。社会存在决定思想认识,正确认识自我之难的重要原因是存在现实利益的羁绊。中国共产党人作为先进阶级的代表,超越了狭隘的个人主义,为实现人类理想社会的目标,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的实践中对这一问题作出了有力的回答,彰显了其先进性,也丰富了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

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奉献。自我管理的基础是自我认知。无产阶级政党要实现人类的最高理想社会,就必须具有超越个人名利和阶级局限、领先时代的高尚的自我观。由人类社会发展的价值追求来定义自我,在奉献人民中更多地实现利他性,这是共产党人自我观的重要特点,也是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

七 “无止”

马克思、恩格斯1872年在为他们于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新的德文版所写的序言中强调:“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

① 肖伟光:《“我将无我,不负人民”:共产党人最高人生境界》,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9年5月13日。

② 肖伟光:《“我将无我,不负人民”:共产党人最高人生境界》,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9年5月13日。

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① 这里，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认为，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一般原理在实际运用中应该结合当时的历史条件。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② 习近平在2018年召开的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同时，科学社会主义也绝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③ 所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关键在于学习和掌握其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以提高辩证思维的能力，防止形而上学，这才是真正的坚持马克思主义。

“事业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中国也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我们必须在理论上跟上时代，不断认识规律，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④ 我们应该深刻把握中国发展的时代特点，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与时俱进地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使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树枝繁叶茂、万古长青。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人民为中心，从中国的新阶段实际出发，一步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步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脉络日益清晰、日益具体化，它的根据和出发点就是问题意识。什么是问题意识？就是从解决实际问题出发，创新理论、创新思维、创新我们的发展方式和发展理念，带着问题去调查研究，勇敢地探索。

An Analysis on the Essence of the “Seven-without” of a Centennial Party

LIU Zegang

Abstract: How did the centennial party be made? Let us look for answers from the seven aspects of being proletarian, selfless, fearless, classless, desireless, selfless, and endless. Being proletarian mean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a party representing the interests of the proletariat. Being selfless means the Communists serve the people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146页。

③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8，第26页。

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第21页。

wholeheartedly, establish the party for the public, and never gain selflessness. Being fearless means the Communists dare to change the world. Being classless talks about the united fron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n various periods and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which unite all forces possible to make the greatest efforts for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Being desireless talks about restraining self-desires and abandon unnecessary secular greed, devote their life energy to the cause of the party and the people. Being selfless comes from Taoism, which means Communists consider social value a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thus neglecting or even sacrificing personal value elements. Being endless means Marxism itself is an open scientific system that needs to be enriched and developed with the times, thus the pursuit of the Communists is of course endless. The above-mentioned “seven-without” are a summary of the experience of the CCP’s brilliant achievements over the past century.

Keywords: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even-without”; Centennial Birthday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界定与新时代中国的文化自信

余 斌*

【摘 要】传统文化是否优秀与其能否适应和促进历史的发展有关。每当人类社会发生大的社会变迁时都会产生相应的文化革命。优秀传统文化的存在是因为历史的辩证发展是否定之否定，经过历史变迁的现代文化包含着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那些能够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而与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融合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那些经得起今天的实践检验，进而成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一种需要或者能够成为推动实现美好生活的一种要素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拥有最多的能够长久保持的因素的文化必然是最有前途、最有自信的文化，而新时代中国的文化正是这样的文化。

【关键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文化革命；文化自信

一 参差不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习近平同志在欧洲学院发表重要演讲时指出：“中国是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家。在世界几大古代文明中，中华文明是没有中断、延续发展至今的文明，已经有 5000 多年历史了。我们的祖先在几千年前创造的文字至今仍在使用。2000 多年前，中国就出现了诸子百家的盛况，老子、孔子、墨子等思想家上究天文、下穷地理，广泛探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真谛，提出了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他们提出的很多理念，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自强不息等，至今仍然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① 悠久的文明和没有中

* 余斌，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

① 习近平：《出席第三届核安全峰会并访问欧洲四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欧盟总部时的演讲》，人民出版社，2014，第 41 ~ 42 页。

断的传承,使得在中国历史上相继出现且没有在历史的演变中消失的文化,得以留传下来形成非常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但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存在参差不齐的现象。最近,中国曲艺家协会相声艺术委员会、中国曲艺家协会行风建设委员会发出《关于加强相声界行风建设,自觉践行崇德尚艺的倡议书》。该倡议书指出,要坚决抵制恶俗粗劣表演。相声是一门雅俗共赏、深受人民喜爱的大众艺术,让人们在含着眼泪的笑声中得到教育和启迪,绝不能用低俗庸俗媚俗的内容和方式取悦观众、迎合市场。“伦理哏”、脏臭荤口、谄媚取闹、恶意调侃等做法跌破道德底线,败坏社会风气,丧失了相声艺术的基本操守。^①的确,一些相声演艺团体只图把观众逗乐,把钱赚了,并以此作为最高“情怀”,反对相声的教育和启迪作用,在表演时台上台下互相调戏而乐此不疲,在相声表演的内容和相声队伍的培养和管理方面全面回归旧社会的行帮陋习。

要知道,在旧社会,相声和许多曲艺的表演者都是社会地位低贱的戏子,虽然其中个别人也会受到追捧,甚至收入不菲,但仍然低人一等,甚至无权与普通平民通婚,是被富贵之人捉弄和玩弄的对象。其表演内容自然要讨好他人,谄媚取闹,其表演队伍的培养和管理也充斥封建主义人身依附那一套。新中国推翻了三座大山,解放了工人和农民,也解放了旧社会的戏子,使之获得了平等的社会地位,成为演员,一些人甚至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被称为艺术家。在曲艺表演队伍的培养和管理上也用现代化的艺术院校教育取代传统行帮的技术传承模式。但是,改革开放之后,曲艺演出市场化,一些演员为了获得经济利益,用低俗庸俗媚俗的内容和方式取悦观众、迎合市场,重新沦入戏子做派,宣扬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糟粕,旧社会的行帮陋习复苏,不仅不以为耻,反而因为有人追捧而扬扬自得。

正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参差不齐,习近平同志才突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才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才提出“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②曲艺家协会的倡议书也正是对习近平同志重要讲话精神的一个体现。这个倡议书也提醒我们必须有效识别和界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明白我们所传承和弘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到底是糟粕还是精华,进而在市场配置中通过扶持公有制文艺单位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公有制文艺渠道如中央和各地方电视台排斥戏子行为,排斥有戏子行为的艺人和文艺团体,把更多的和优质的资源用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演职人员和人民艺术家身上,主要按照社会利益而不是经济利益来配置文化资源,同时发挥好政府的积极作用,限制和查处跌破道德底线、败坏社会风气、传播传统文化糟粕的行为,使戏子式表演及其团体无路可走。

① 《曲协倡议抵制相声界恶俗表演》,光明网, <https://m.gmw.cn/baijia/2021-04/29/1302263430.html>, 2021年4月29日。

② 习近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光明日报》2014年10月16日。

为此,在界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前,我们首先要对传统文化与非传统文化作一下界定。事实上,文化之所以能够分为传统和非传统,除了历史的传承以外,更重要的还在于历史的变迁。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每一次经济社会的变迁,都会引起文化上的变迁,从而变迁前的文化相对于变迁后的文化就成了传统文化。而传统文化是否优秀,也与传统文化能否适应和促进历史的发展有关。因此,要界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需要回顾一下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变迁。

二 中国历史上的文化革命

习近平同志指出:“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历史性进步。”^① 每当人类社会发生大的社会变迁时都会出现相应的文化革命。这些文化革命通常会发生在经济社会出现变革之后,使新的文化能够适应和促进经济社会的新发展。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指出西方社会,“在贵族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概念是荣誉、忠诚,等等,而在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概念则是自由、平等,等等”。^② 与这种文化变迁相伴随的是西方的文艺复兴的文化革命。

在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历史中,中国社会经历了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巨大变迁,也发生了与之相应的文化革命。其中,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的文化革命比较缓和,主要表现为文明的平稳进步,其巅峰是诸子百家的形成。这一文化革命的缓和与社会变化的缓和是相适应的。原始社会末期出现了奴隶到奴隶社会的形成,并不意味着奴隶劳动成为社会劳动的主体,大多数人并没有从平民变成奴隶,从而社会变迁是相对平稳的。有人因为奴隶劳动不占主体就否定奴隶社会的存在是没有意义的。在中外历史上的一些奴隶社会中,土地公有的平民劳动仍然占有很大份额甚至是主体。但正因为奴隶劳动的出现,人类社会才有了更多的剩余劳动来支撑极少数人从事开发文明的活动,人类文明才有了较快发展。

春秋战国末期,中国开始进入封建社会。有一些学者不承认中国古代社会曾经是封建社会,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拿西方封建社会贵族统治的政治制度与中国古代的中央集权制政治制度进行比较,认为两者存在较大的差异。但是,他们没有看到,今天人们公认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也存在很大的差异。英国和日本都有封建王朝的国王和天皇,尽管他们手中的权力比早些年的权力少了很多。美国有总统无总理,法国则同时存在总统与总理。因此,用政治制度的形式来判断经济社会的形态是不大合适的。要知道,是经济社会形态决定政治制度而不是政治制度

①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5,第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52页。

决定经济社会形态,而经济社会形态又与生产力密切相连。马克思早就指出:“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①因此,中国历史上小块土地私有制和小农经济的出现就使得中国经济从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这时出现的文化革命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是因为,儒术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价值观符合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秩序的需要。马克思在谈到法国小农时曾经指出:“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就这一点而言,他们又不是一个阶级。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无论是通过议会或通过国民公会。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②而中国古代的小农则是通过一位成为他们的主宰的天子来代表他们,并通过儒家文化来维持这个体系。

到了近代,外国资本以武力入侵中国,西方资产阶级“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③中国开始发展现代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经济与封建经济发生了冲突,加上中国国内民族间的矛盾,以及中国与外国的民族矛盾的爆发,封建王朝无法延续下去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但是,中国的资本主义文化革命迟至1919年才开始发生。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推翻儒学这一主流封建文化,提倡“科学”与“民主”等近代资产阶级文化。幸运的是,这时俄国十月革命已经成功,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文化因素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有所体现。

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的先天不足和软弱,中国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没有取得最后的成功。而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兴起,使中国无产阶级开始逐渐取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权,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向新民主主义革命,与之相适应的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也发生了。其标志就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讲话中,毛泽东提出了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批评了为着剥削者压迫者的文艺,强调我们的文艺“是为人民的”。^④事实上,“科学”与“民主”一开始就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既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势力服务,也为资产阶级镇压工人的反抗服务。五四新文化运动没有强调“科学”与“民主”为人民大众服务,一些人在马列主义传入中国的背景下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和鼓吹“不问西东”,代表的就是资产阶级文化或旧民主主义文化,而“科学”与“民主”为人民大众服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60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2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35~36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855页。

务则代表的是人民大众文化或新民主主义文化。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社会从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也需要而且也会发生相应的文化革命。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①这其实就是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方针。这是因为,恩格斯早就指出:“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②拨乱反正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纯而又纯的公有制经济基础让位于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于是随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发生作用,在文化上开始出现资产阶级精神污染。对此,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有些同志对精神污染不闻不问,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甚至认为是生动活泼,是‘双百’方针的体现。有些同志明知不对,但是不愿或不敢进行批评,怕伤了和气。这样下去不行。”^③

但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随着我们日益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中国文化也迎来了新的革命。对此,习近平同志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和“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④

总的来看,中国历史上每一次文化革命都力图培育符合和引领时代发展的先进文化。“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⑤

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界定

所谓优秀传统文化,自然是在今天的生活中仍然能够发挥积极作用的传统文化。而在传统文化中之所以存在仍然能够在今天发挥积极作用的优秀传统文化,则是因为历史的辩证发展不是一次性的否定,而是不断的否定,是否定之否定。正如小麦的辩证生长,通过对种子的否定而成为植株,再通过对植株的否定而成为果实,而经过否定之否定得到的果实中包含着最初的种子一样,经过历史变迁的现代文化通过对传统文化和过去文化的否定之否定的发展,也同样包含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例如,恩格斯曾经指出:“最初的、素朴的观点,照例要比后来的、形而上学的观点正确些。”^⑥但是,这些素朴的传统观点,曾经被形而上学否定过。“把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5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313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45页。

④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5,第1~30页。

⑤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5,第5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第728页。

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各种自然过程和自然对象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这是最近400年来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①形而上学的考察方式“在相当广泛的、各依对象性质而大小不同的领域中是合理的,甚至必要的”。^②只不过,这种“把各种自然物和自然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宏大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③的方式,“由于自然科学本身的发展已经站不住脚了”。^④现代科学又回到了最初的、素朴的从总的联系上去看待事物的观点上。所以,这些最初的、素朴的观点就是优秀的传统文化,但在今天,我们所采用的并不是它们本身或它们的原初形态,而是将它们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成果即唯物辩证法的运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⑤列宁则指出:“应当明确地认识到,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能完成这项任务。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硬说是这样,那完全是一派胡言。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条条大道小路一向通往,而且还会通往无产阶级文化,正如马克思改造过的政治经济学向我们指明人类社会必然走到哪一步,指明必然过渡到阶级斗争,过渡到开始无产阶级革命。”^⑥

这就意味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那些能够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而与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也就是列宁所说的无产阶级文化相融合的中华传统文化,尽管这一部分还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全部。例如,中华美食文化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尽管它与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没有直接的关联。如今中医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治上的有效性也表明,中华传统文化中除了那些与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融合的部分外,还有一些经得起今天的实践检验,进而成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一种需要或者能够成为推动实现美好生活的一种要素的中华传统文化同样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今天我们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中医的科学性与有效性就不能用西医的理论和标准来检验和判断。如果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医需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那也不能强求用西医的方式来改造中医,但可以探索将中医量化的模式,提高诊断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第23~2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第2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第24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第457页。

⑤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第23页。

⑥ 《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2017,第334页。

的准确率和用药的准确性。

从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来看，资本主义否定了传统社会，而社会主义又否定了资本主义，从而在对传统社会进行了否定之否定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传统文化中就会有相当多的一些优秀部分能够与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融合，得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①这也是为什么西方诞生的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东方的中国取得成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能够取得重大成果的根本原因。

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落后于西方国家，近代中国也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否定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之后，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之后，中国迅速地完成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迟至今日都没有完成的无产阶级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并且避免了犯颠覆性的错误，中华民族踏上了伟大复兴之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发扬，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也得以恢复和发扬。

笔者曾经撰写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与中国传统精神有很多契合之处。^②这些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相契合的中国传统精神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里不再赘述，而是补充其他的一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示例。

例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强调“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虽然王子与庶民在身份上存在等级差别，是不平等的，但是他们在法律面前要平等。尽管事实上这一点并没有做到或者说极少做到，但这种思想和文化，比资本主义时代不仅在事实上优待犯法的资本家或企业家，而且还在公开的法令和主张上强调优待犯法的资本家和企业家要优秀得多。当然，能够做到不仅主张上而且事实上使每个人都在法律面前平等，那只能是社会主义时代的事情。

中国传统俗语讲：“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中国古代文献也讲“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这都是在说明，人不能太自私，要为后人、为人类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与之相比，现代西方经济学则认为每个人都是也都应当是自私自利的理性经济人，鼓吹“自私的基因”，“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甚至成为“每个资本家和每个资本家国家的口号”。^③显然，如果每个人都只考虑自己，那么既不可能有多少文明可以传承，而且已有的文明也很难传承下去。习近平同志指出：“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培育和发展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克服困难、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④他本人所表明的“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精神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

① 《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2017，第334页。

② 余斌：《西方开花的马克思主义为何先在中国结出硕果？》，《当代世界》2019年第5期。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第311页。

④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5，第2页。

扬。中华文明有如此多的优秀传统文化，一方面与中华文明传承数千年时间之长有关，传统文化众多，其中总有一些文化能够成为优秀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文明才得以延续下来。

就像同一个艺术形式可以表达不同的艺术内容，五言绝句可以有不同的内容一样，中华传统文化还有一个特点是，其内容与形式（载体）可以分离，可以旧瓶装新酒，从而方便将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而成为今天的优秀文化。例如，中国古代著名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其实没有什么实质内容，也就是说可以加任何内容到里面去。比如，我们可以用自然辩证法为天地立心，反映自然规律；用阶级斗争为生民立命，实现人类解放；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为往圣继绝学；用实现共产主义为万世开太平，从而将古代的这个横渠四句与今天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直接结合起来。

我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中华传统文化中有很大部分表现了中华民族想作为、有作为的精神。今天我们同样是想作为、有作为，区别只在于今天想作为、有作为的依据和对象与过去的传统有所区别，从而只要调整想作为、有作为的依据和对象，就能使传统想作为、有作为的方式适用于今天的情形，使其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例如，中国古代文人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里的修齐治平表现的就是古代文人想作为和有作为，当时的修齐治平之道是封建社会的三纲五常，如今只要代之以马克思主义的治国理政和良好的个人修养与家风，就可以继续适用于当前的情形。再例如，中国古代提出格物致知，这是素朴的唯物主义认识论。但是，后来的一些人不知道如何去格物，比如哲学家王阳明对着竹子格物数日，一无所得反而大病一场，于是转向了唯心主义的心学。而毛泽东同志则在《实践论》中说明了格物致知的现代意义：“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的组织同性质，你就得实行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验，变革原子的情况。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①

四 新时代中国的文化自信

一种文化之所以成为传统文化，并不只是因为它历史悠久。西方的毕达哥拉斯定理即中国的勾股定理以及欧几里得几何并没有被当成传统文化，西方的天主教文化也没有被视为传统文化。《共产党宣言》里曾经提到，资产阶级“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②正是这种从属关系才使得东方文明都成了传统文明，西方文明则代表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287~28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36页。

现代文明。

但是，在资产阶级文化之后，无产阶级文化开始兴起，恩格斯谈到当年在欧洲最先进国家中存在的三种道德，即由过去信教时代传下来的基督教的封建的道德、现代资产阶级的道德和未来的无产阶级道德，指出：“哪一种是合乎真理的呢？如果就绝对的终极性来说，哪一种也不是；但是，现在代表着现状的变革、代表着未来的那种道德，即无产阶级道德，肯定拥有最多的能够长久保持的因素。”^①显然，拥有最多的能够长久保持的因素的文化必然是最有前途、最有自信的文化，而新时代中国的文化正是这样的文化。

这首先是因为，新时代中国的文化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先进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新时代的中国坚持推进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代表着现状的变革和未来的发展。其次，中华文明延续传承数千年，为新时代的中国保留了大量优秀传统文化，而其他文明要么传承中断，要么文明发育比较晚，留下来的历史文化不多，其中的优秀部分自然相对也少。再次，中华文明极具包容性。中国人讲“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诗经·小雅·鹤鸣》），近人鲁迅提倡拿来主义。习近平同志也主张：“不同文明要取长补短、共同进步。”^②我们不仅吸收了来自西方的现代科学技术，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还用西方的文艺形式展现我们的革命文化，如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中华传统“和合”文化在中华民族发展成为一个多民族和谐共生的大家庭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古往今来，中华民族之所以在世界有地位、有影响，不是靠穷兵黩武，不是靠对外扩张，而是靠中华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和吸引力。”^③如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同样需要和合文化这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挥积极的作用。

最后，新时代中国的文化特色在于我们绝不自欺欺人，不搞双重标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到贵族统治时期和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概念时指出：“一般说来，统治阶级总是自己为自己编造出诸如此类的幻想。”^④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平等的普世价值就是这样的幻想。西方一些反华政客强调要维护他们的价值观，但是他们非幻想的价值观不过是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在演讲中所揭示的所谓“美国不断探索进取的荣耀”即“撒谎、欺骗和偷窃”。这样的价值观我们是绝不会苟同的。

有人提出，在对外交流时要用西方能够理解的语言来表达我们的观点，迁就西方的主流价值观，这一方面是缺乏文化自信，另一方面也不了解西方媒体中的话语代表的是西方统治集团的利益而不代表西方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同时还低估了西方左翼唤醒民众的努力，低估了西方民众的智力。当年毛泽东同志能够用三个世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2014，第99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第544页。

③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5，第3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52页。

的划分、能够用纸老虎等中国话语表达我们的观点，今天我们同样可以而且更应当用中国话语走向世界。

习近平同志在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的回信中指出：“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① 这就是新时代中国的文化自信。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交织而成的新时代中国文化带给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

On the Definition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China's Cultural Confidence in the New Era

YU Bin

Abstract: Whether traditional culture is excellent is related to whether it can adapt to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y. Whenever human society undergoes major social changes, there will be a corresponding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existence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s due to the dialectical development of history's Negation of negation and the modern culture that has undergone historical changes contains the excellent components of traditional culture.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s those that can be integrated with revolutionary culture and advanced socialist culture through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and those that can withstand the test of today's practice and become a kind culture that is needed by or promote a better life. The culture with the most factors that can be maintained for a long time must be the most promising and confident culture, and the Chinese culture in the new era is exactly such a culture.

Keywords: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Revolutionary Culture; Advanced Socialist Culture; Cultural Revolution;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① 《习近平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回信》，《光明日报》2021年5月11日。

从孔夫子到马克思：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 内在精神契合性^{*}

田辰山^{**}

【摘 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契合融通，是时代大课题。深入研究二者交会渊源、内在联系，才能厘清中国当代主流思想形成的核心与脉络，从而为建立起一套完整自洽的中国道路叙事理论体系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本文首先以比较中西阐释哲学中的“比较文化语义环境”阐释方法论，分析出中西主流文化核心基因差异在于“一多不分”与“一多二元”的不同，在此基础上分析儒家思想和马克思哲学在中西各自文化语义环境当中呈现出的基因样态，从而揭示二者在世界观、认知论、思维观、社会观、人生价值观等内在精神方面的契合点，进而说明二者得以历史交会的缘由，并分析了被误读为对立的若干观点，进一步阐明二者的确存在内在精神的契合性，而且马克思主义与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传统学术的“对接”和融通已经是完成之现实，并已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成果所证明。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儒学；一多不分；比较中西阐释哲学

引 言

目前，世界正处于全球格局转型的重大时代，中国从百余年前的积贫积弱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形成全球变局的重要力量。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正在全面复兴，“百善孝为先”“家和万事兴”的公益标牌出现在大街小

^{*} 济宁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项目“从孔夫子到马克思：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内在精神的契合性分析”（项目编号：20JSGXCIK01）；北京中外文化交流研究基地立项项目（项目编号：BCERC2020-2A05）。

^{**} 田辰山，哲学硕士、政治学硕士、博士，国际儒学联合会荣誉顾问，北京外国语大学原文教专家，现担任东西方关系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学及比较中西哲学文化。

巷,“亲诚惠融”“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承载着儒家思想核心价值观的外交理念,正借助于众多国际经济文化交流平台走向世界。

与此同时,世界上对于中国制度、中国道路的攻击唱衰从未停止,以美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视为“异端”;在国内,毋庸讳言,将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对立的现象也并不罕见。众所周知,儒家思想是中国几千年来的主流文化,而马克思主义则是中国当代主流意识形态,将二者分割开来,对立起来,就意味着对于中国传统与现实认识的割裂和错乱,必然造成思想理论界的分裂与混乱,如此,中国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乃至文化自信将何以构建,以其昏昏,如何使人昭昭,向世界讲清中国模式也就缺乏了理论根基。

因此在此重大历史节点,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交会的渊源,剖析二者的内在联系,从而厘清中国当代主流思想形成的核心与脉络,才能回答究竟什么是中国文化核心基因,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可以在中国发扬光大,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的内在契合点为何,马克思主义为什么是中国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才有可能建立起一套完整自治的中国道路叙事理论体系,才能从根本上扭转中国“有理说不出”的被动挨骂困境,建立起真正的理论自信。

何谓“内在联系”?是指事物之间本质的、天然的、非人为的关联。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究竟有没有内在联系?这是我们在研究之前必须扪心自问的问题,亦即我们研究此问题的初心,究竟是因为二者真有内在本质关联,还是为了某种人为目的,将本来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生拉在一起强做关联?对此问题的回答不但关系到研究者的学术客观性与专业性,也关系到研究结果的科学性与可信性。

在此我们做一个重要的判断,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传统学术的“对接”和融通其实不但已经是完成之现实,而且也已结出伟大的现代成果。事实胜于雄辩,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及发展就是二者对接、融通的现代实践性成果,这是摆在我们面前无可置疑的事实。而且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不是西方人开着炮舰带进来、强加给中国的,也不是哪个军阀强行推行的,而完全是知识分子冒着生命危险推广宣传,是人民大众在革命中被自然吸引欣然接受的。正是这些事实,使我们坚信二者之间一定存在某种内在关联,我们所应做的就是对这种关联探源究本,回头进行再认识、再总结,在哲学理论上进行系统性梳理分析和建构,在历史的长河中完成我们应做的重要一环。

本文以比较中西阐释哲学中的“比较文化语义环境”阐释方法论,来确定中西主流文化核心基因差异,在此基础上分析儒家思想和马克思哲学在中西各自文化语义环境当中呈现出的基因样态,从而揭示二者在世界观、认知论、思维观、社会观、人生价值观等内在精神方面的契合处。进而说明二者得以历史交汇及被误读为对立的缘由,进一步阐明二者的确存在内在精神的契合性,为构建新时代中国话语体系奠定理论基础。

一 中西主流文化的核心差异

要理解儒学和马克思主义内在精神契合性，必须要从中西两个文化语义环境的比照开始，这是因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反映着各自文化的宇宙观、认知观、思维观、人生观和方法论。我们必须首先弄清楚中西主流文化的核心差异，才能搞清二者所处的不同的文化意义环境，在此基础上进行比照，才能看清二者究竟是对立还是相通。

（一）西方“一多二元”文化语义环境

美国比较哲学家安乐哲认为，西方文化语义环境的特质英文叫作“transcendentalism”和“dualism”，意思是“超绝主义”和“二元对立”。我们用简洁的汉语可称它为“一多二元”。^①如图1所示，此处的“一”是大圆点，是超绝于万物的造物者、主宰者，就是上帝的概念；“多”是下方众多的小点，是指上帝派生、创造出来一个个的单子个体；“一”和“多”都是个体性的，关系是对立、冲突的，不但“一”对“多”是单线单向主宰关系，“多”和“多”之间也是互相冲突的竞争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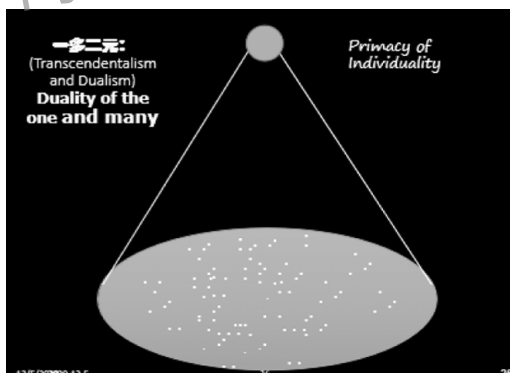


图1 西方“一多二元”

图1反映出的其实还有西方的一种假设性思维模式。即在看到小白点所代表的花鸟鱼虫、山川河流野兽等万物后，会思考“万物从何而来”的问题，其思维方式、学术方法就是善于假设，因此就假设上面有一个创造一切的“一”的大圆点。这样其宇宙结构就变成了一个三角形，上面“一”主宰、创造下面一切的单子个体万物，在这样的宇宙观基础之上，就形成了如图2所示的竞争性社会观。

图2中向上的箭头是一层一层的，表示众多的单子个体在竞争，竞争之后就形成“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论。竞争导致大多数人都失败淘

^① 参见郝大维、安乐哲合著的比较中西哲学经典著作《期望中国》(Anticipating China)。

汰,只剩下少部分人构成所谓精英利益集团,形成两党竞争,争夺上帝赋予的人权、自由、财富、政权,这就是所谓的“competition for the good”,在这种通过竞争获得权利的三角形社会结构中,每个个体都是独立追求个人利益的,因此“个人主义”称其为文化的主旋律,人和人的关系,团体和团体的关系,乃至国与国的关系都是对立和竞争的。“一多二元”就成为西方主流文化的核心特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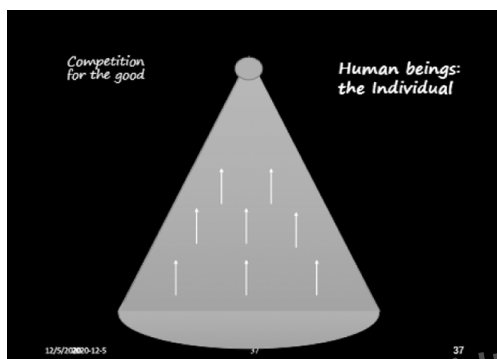


图2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综观西方主流哲学思想,从古希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直到启蒙运动确立了个人自由主义传统,自由、民主、人权、竞争、个人利益等西方思想主流概念,无不渗透着上述“一多二元”的文化特质。

- (1) 奠基于哲学的假设和虚构命题之上;
- (2) 假设有形而上学的超绝造物神,为唯一真理或唯一超绝本体;
- (3) 宇宙间万物皆为形而上学、本质不可分的单子个体,个体互不联系,它们一旦碰到一起就会决出一个我赢你输的二元对立。

我们要确定一种思想是否属于西方思想,就要看其是否具有西方主流文化“一多二元”的内核,是否具备上述若干特征,而非仅看其出现的地域。

(二) 中国“一多不分”文化语义环境

“一多不分”这一概念,最早由唐君毅先生提出,是其七点哲学启示之一,^①后安乐哲、郝大维、罗斯文等学者在其学术研究中吸收这一概念,发展出一套比较中西哲学理论体系。“一多不分”,英文翻译为“the inseparability of one and many worldview”。如图3所示,这里的“一”并不是高高在上超绝的“一”,而是由万物构成浑然整体之“一”,“多”则是指互相联系的万物,这样“一”和“多”之间,“多”和“多”之间都是不可分割的关系,称之为“一多不分”,中国主流文化正具有这种迥异于西方孤立个体“一多二元”的“一多不分”特质。

^① 唐君毅:《中西哲学思想之比较研究集》,上海书店,1989,第9~1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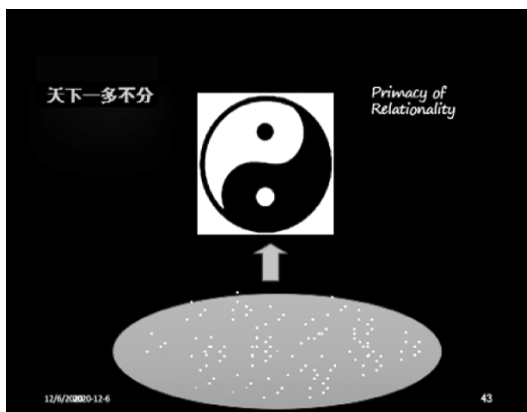


图3 中国“一多不分”宇宙观

换言之，中国的“一多不分”是一种对立统一、普遍联系的观点，是一个事情里既有你又有我、既有阴又有阳、既有白又有黑的一体两面。每个个体都是包含着天地、阴阳两种元素的浑然而一之整体，而且“多”中的每一个个体都在“一”之中，是“一”的组成部分，因此每个人不应把自己看成个体，而应同时是别人、是天地、是自然、是社会，社会造就了我们这个“一”。我们身上反映的都是父母、家庭、社会、文化，所以在中国这里“一多不分”没有单子个体。各种事物之间就是相互关联的合作性关系（见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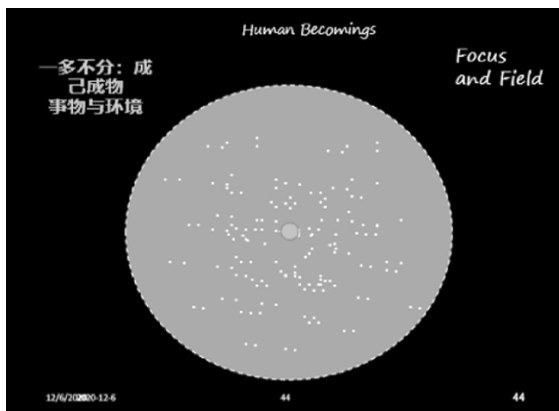


图4 中国心－场社会结构

中国“一多不分”文化观念来自何处？中国人同样看到天下万物山川河流、花草鱼虫，但是并没有以假设为前提进行学术论证，而是通过观察万物，在经验基础上建立自己的观念。《易经》特别突出“观”，“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从观察中认识到万物互相联系的“道”理，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整个世界为“道”，为“阴阳”的，就是“一多不分”。“一”为“道”，“阴阳”为关系，就是“多”，《道德经》当中“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

物”，“一”和“多”这种不可分割的联系就这样从观察中感悟出来，而非假设出来。中国这套由观察而产生的以关系为本的“一多不分”哲学，不同于西方由假设而构建的以个体为单位的“一多二元”思维，在英文中称作“primacy of relationality”。

“一多不分”的文化特质，使我们中国人看待任何问题，都是将其置于所处环境当中，即通过森林看树木，这样我们看待问题的社会观就形成“心-场结构”（focus and field），“focus”就是焦点，“field”就是焦点所在的场域。在“一多不分”的宇宙观当中，人不是固化的，而是一个变化观念，不是生而为人，而是学以成人，安乐哲认为这相当于把英文中固化的“Human Being”概念变为“Human Becoming”这一动态性概念。“做人”是中国思想文化的核心命题，其内容正是将个体置于整体关系环境中，通过在各种关系中的恰当定位，逐渐使个体由一个焦点的个体扩展成一个场域的整体，即由“小我”成长为“大我”，达到“天人合一”“物我不二”的境界。可以看出中国文化中个人的成功，恰恰在于其与关系的融合程度，而绝非击败别人的程度。

不仅儒家思想，中国传统思想都表现出这种“一多不分”的特质，即具有以下特征。

（1）形成于真实的观察和体验的经验之上；

（2）体察到宇宙万物实为一个浑然而一的整体；

（3）宇宙万物是互相依存、不可分割的关系，由于存在本质联系，合作是其主旋律。

（三）中西文化基因的核心差异

综上所述，中西文化基因的根本差异在于以下几点。

（1）西方主流哲学理念奠基于一假设的命题之上，中国主流哲学理念则产生于观察的经验之中。

（2）西方主流哲学都具有二元结构，即都有形而上学的超绝的“一”存在，这个“一”可以是上帝，可以是唯一真理，可以是绝对理性，总之是唯一超绝本体；中国主流哲学中不存在超绝的“一”，而只有与万物不可分割的整体之“一”。

（3）西方主流哲学认为宇宙间万物是孤立的，它们之间是我赢你输的“二元对立”竞争关系；中国主流哲学则认为万物之间是普遍联系的，它们之间是同气连枝的“一多不分”合作关系。

因此，是经验的，还是一假设的；有唯一造物神的，还是浑然而一的；是普遍联系的，还是单子个体的；是社会的，还是独立的；是竞争的，还是合作的。说到底，是“一多不分”的，还是“一多二元”的。这些问题是检验各种哲学是本质相连的，还是根本对立的最好的试金石。建立起这些标准，就为我们科学分析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儒家思想的关系提供了依据。

二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儒学的内在精神契合点

所谓“内在精神”，是指哲学和文化的内在要义或精髓核心，包括哲学深层的宇宙观、思维观、认知观、社会观和人生观（价值观）等元素；所谓“契合性”，是指两种哲学思想在五大范畴上，具有具体的、相属的、汇通的、可以构合的底层逻辑一致性，且这种契合性，不但可以在理论上加以论证，而且具有现实实践的检验；对于这种契合性产生的渊源可以进行说明，且对于反证能进行合理的解释和澄清。

“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内在精神的契合性”，是一个比较中西哲学基本范畴课题。要分析“孔子”和“马克思”二者之间的联系，必须找到两种思想体系哲学上的内在联系，即找到二者在宇宙观、思维观、认知观、社会观和人生观（价值观）这几个范畴上的相属性或汇通性。

（一）宇宙观的契合

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内在精神融通的决定原因是在于宇宙观的契合。

如前所述，中国儒学是“一多不分”的宇宙观。儒家眼中的宇宙是人文化的家国天下。《大学》八条目中，正心、诚意的个人意识与治国、平天下的社会治理浑然合一；《中庸》当中，“诚者”，非但成己，而且成物，合外内之道，故修德可以配天，尽性可以与天地参；《孟子》提出“万物皆备于我”；《易经·系辞》认为“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贵，备物致用、立功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可以看出，在儒家的宇宙观中，天人本为一体，人不但可“至诚如神”（《中庸》），而且“显道，神德行，是故可与酬酢，可与祐神矣”（《易经·系辞》），在人之上，没有一个超绝主宰之神的概念。

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不是“一多二元”的，这是非常明显、毋庸置疑的。我们作出这一判断，关键有三点。

- （1）马克思主义是无神论，没有上帝的存在；
- （2）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一切事物都是互相联系的；
- （3）马克思强调一切都是变化的。

马克思理论来源之一是黑格尔的思想，但黑格尔是唯心主义，马克思是唯物主义。黑格尔是“绝对精神”目的论，即历史的完结是走向“绝对精神”，如同基督教走向上帝那里去是同一条路线。因此在西方，黑格尔辩证法被人们认为是基督教另一个版本。他所讲的，其实在有限意义上是内在联系，在最终目的意义上，是外在联系，是基督教的话语转换体系。黑格尔辩证法的终结目的是与“绝对精神”（上帝）会合。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神论,没有上帝或“绝对精神”,世界是内在联系、充满运动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生成和消逝。这种原始的、素朴的、但实质上正确的世界观是古希腊哲学的世界观,而且是由赫拉克利特最先明白地表述出来的:一切都存在而又不存在,因为一切都在流动,都在不断地变化,不断地生成和消逝。”^①

这是马克思总结出来的宇宙观,这段话酷似来自《易经》的观点,马克思提到的赫拉克利特的表述,是比古希腊的任何思想都更接近中国“一多不分”世界观的。马克思认同赫拉克利特,正是其脱离西学主流神的“一多二元”立场,而是来自根植于人类经验的“自然宇宙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阐述了自然宇宙观,在深层向着中华传统“一多不分”天道万物观靠近,成为独占鳌头的西学精华。西学迄今也未再产生出超过这一哲学体系的任何其他学术。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宇宙观彻底否定西方主流的造物神(或唯一真理)的本体论,从而自然走向世界万物内在普遍联系的认识,它宣称变化为自然宇宙的本质,而一个固定不变的本体只是非事实之假设,这完全脱离了西方“一多二元”的思想体系,成为在西方“一多二元”主流思想中的异军突起。所以我们可以得出这么个结论,马克思主义是从“一多二元”走向“一多不分”的哲学,因此演变为西方思想与中国儒家最契合的人文学说。

(二) 认知论和思维模式的契合

由“一多不分”的宇宙论出发,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在认知论和思维模式上也体现出契合性。

《易经》中展现出中国哲学认知世界的主要方法为“观”。《易经·系辞下》中说明远古先民作卦的过程:“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於天,俯则观法於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可以看出道理的获得,主要通过生活和劳动当中的“观察”,随着生活和劳动范围的扩展,认识的范围也越来越广大,获得的经验感知也越来越丰富,渐渐归纳总结出自然之道理,达到“感而遂通天下”之境界。可以发现,这种“感而遂通”的认识方法,“观”的是变,概括的是人日常生活的经验,达到的是“天人合一”的神妙的境界。所谓“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这是感性与理性相结合的过程,是天下万物会通的过程,用王阳明的话讲“知行合一”的过程,是人类通过实践认知活生生的过程,而非通过假设认定造物主的固化过程。

通过观察的经验,中国哲学认识到一天有昼夜,一山有阴阳,人类有男女,自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59页。

然总结出物极必反、相反相成的“一多不分”思维模式。《易经》中此种“互系通变、一阴一阳”的阐述比比皆是。如果从“一多不分”的生生不已的大生命体系看，人生观——也是中国崇尚观，是对生命生生不已的珍重，以生命至上，崇尚一个“生”字。人要怎样生活，如何待人，皆是从此处出发。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和唯物辩证法，与《易经》极为相似。

辩证法，英文是 dialectic，是产生在西方的概念，是古希腊苏格拉底与学生的哲学对答方式，叫“一辩一证”，是渐进“肯定－否定”的线性二元辩式，而不是中国阴阳思维。这个辩证法后来被西方忽略了。

直到启蒙运动以后，由于中国传统哲学文化被介绍到西方，在西方掀起中国热，莱布尼兹、黑格尔、康德等人都吸收中国思想，建立自己的辩证学说，“辩证”才被激活，在黑格尔手中被建立为一个庞大的体系，这是一个典型“西体中用”模式，将中国的阴阳用在“辩证法”说辞中，而思想体系则完全是一个西方基督教历史观版本的翻版，充满传统目的论、唯心主义、二元主义、形而上学的蕴意。

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才成为最接近中国传统非二元性阴阳思维的哲学，传达相反相成的哲学逻辑。在马克思哲学中这是非常突出的。这是由于马克思主义者属于无神论者，有自然运动的宇宙观，强调万物皆是内在联系，申明人是社会性而不是单子个体，等等。美国有个名叫奥尔曼·伯特（Ollman Bertell）的哲学家，把这个问题讲得很清楚。^①

虽然马克思在传达自己新的宇宙观的时候，受到了西方概念性语言表达的局限，但是，马克思还是做了去二元对立性、去一多二元化的处理，形成一种马克思特有的辩证法的叙述语言。如“规律”“法则”“进步”“发展”等，这些词在马克思这里和在汉语中，我们都可以理解为是与儒学传统含义相合的意义：“规律”是内在关系，“法则”是天理的“理”（内在联系），“进步”“发展”这等概念，不是黑格尔的或者基督教上帝主宰的历史观的“进步”，而是儒家思想传统“变化”意义的“苟日新，日日新”、与时俱进的“进步”，也即非超绝目的论的。在中国把马克思的思想翻译成中文，立刻就进入中国哲学叙事，变成中国非“一多二元”的哲学。比如“两极相通”，英文是“two extremes meet”，这个英文的语感是二元主义的，而“两极相同”则完全是“一多不分”哲学了。可以看到，这种对世界的认识是从实践经验中来的，不是从上帝的假设而来的，其对世界的思维方式是“一多不分”的，而非“二元对立”的，马克思的认识论和思维模式，与中国的知行合一认识论与阴阳思维模式非常契合。正是因为有这种深层契合点，到了现代，毛泽东专著《矛盾论》《实践论》，在中国古代辩证法或阴阳思维基础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并将它更加向前发展。

这里需要说明一点，有人把中国传统阴阳思维叫作“朴素辩证法”，这其实并

^① 参见〔美〕奥尔曼·伯特（Ollman Bertell）的著作《辩证研究》（*Dialectical Investigations*），1993。

不准确,原因是中国自古以来的“相反相成”思想,已经非常深刻。古希腊赫利克里特的一切流动思想,可以称为“朴素辩证法”,它没有马克思的辩证法更精到。

(三) 人生观和社会观的契合

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在对“人”的哲学认识上是契合、融通的,这仍然源自二者同具“一多不分”的宇宙观。

我们前面已经提到,儒家眼中的宇宙是家国天下,在儒家人文化的世界中,人处于焦点位置,《说文解字》解释“人”字为“天地之性最贵者也”(《说文解字》);“正德利用厚生,厚性是也”,人是生生不息的;“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会,五行之秀气,五行之端”(《说文解字》段注),人处于五行之中的,是同世界、宇宙不可分割的。人何以能与天地相匹配?孔子说“人者,仁也”,“仁者,人之德也”,因此“惟人为天地之心”,《易经》说人可“与天地合德”,中国儒学“人”是通过“德行”“修德以配天”与天地合二为一。因此,这形成了儒学“人”的三点重要内涵:

(1)“人”为宇宙万物之焦点;

(2)“人”这一焦点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其环境浑然一体,是“心-场”结构的关系系统一体;

(3)“人”性为善,“人”以“仁德”为其规定性,以“爱人”为其行为规范,以“大公无私”为其最高境界,因此“正德利用厚生”“修齐治平”成为儒家的生命意义和人生价值观。

以上“人”的内涵,必然形成中国“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理想,形成以构建和谐关系为本的个人道德进路和社会价值观。《论语》中,“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大学》说“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中庸》中天下国家有九经,就由家庭一步步扩展到社会乃至国际关系的“治国平天下”实现途径,是由爱亲、爱家、爱国,必然扩展到爱天下的“大同”和谐社会观。这种社会观是活生生建立于人类社会中的现实理想,而非构建于上帝规划的假设之上的乌托邦。

中国儒学对“人”的认识,同西方以“神”为天地万物之主宰,以“人”为上帝之创造物;以“神”为真善美之本体,以“人”为存在天然缺陷之客体;以“人”为单子个体,以“人”“神”为二元对立的固化结构,完全是两套不同的哲学。从而也迥异于西方以“个体竞争成功”为人生意义的人生观及私有财产至上、竞争为王的社会观。

下面我们来分析马克思对“人”概念的认识及其人生观和社会观,看它与上述哪种哲学认识更契合。

马克思认为“首先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体对立起来。

个体是社会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其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人是一个特殊的个体，并且正是他的特殊性使他成为一个个体，成为一个现实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同样，他也是总体，观念的总体，被思考和被感知的社会的自为的主体存在”^①。

可以看出，首先马克思认为社会不是抽象的存在，而是大家现实地生活在一起；社会不能跟人对立起来，人不能跟社会对立；每个人既是个体的，又是总体的；其特殊性不在于个体性而在于关系；我们个人也是整个社会总体在我们身上的体现，我们身上的一切东西都是从社会中来，首先是父母、家庭、祖宗，我们身上有文化，家庭的文化、社会的文化、道的理念，整个中国的文化就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也是“观念的总体”；是“被思考和被感知的社会的自为的主体的存在”，社会是一个主体，我们也是与社会一样的自为存在。这里，“自为的存在”不是上帝的，不是外在力量。因此，我们可以从中领会，马克思对“人”的概念同儒学及中国文化十分契合。

马克思主义同样强调道德，但是此道德不同于西方主流宗教性的道德，而是阶级道德、共产主义道德。马克思话语中的“无产阶级劳动者”，就是社会大多数人，就是民众，就是不平等社会的弱势群体。提出“阶级道德”，对立于西方封建旧道德与个人至上的所谓新道德。西方封建旧道德是服从教会裁决，以上帝名义训诫人们不做坏事。文艺复兴将封建道德抛弃，产生个人主义的“新道德”，即认为个人主义是天经地义。马克思的“阶级道德”正是对这两种道德的否定。“阶级道德”“共产主义道德”，就是要为大多数普通人民服务的道德，是反对少数人奴役、压迫劳动者的道德，这和中国儒家的“民本”思想是同一逻辑，都反对少数人和大多数民众分离，形成贫富分化的“一多二元”结构；反对个人主义，自私自利，而强调共同利益，共同协作，这样“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成为其必然的社会理想，正如“大同世界”“天下为公”成为儒家的社会理想一样。

“共产主义”这一概念源自西方，柏拉图《理想国》中首先提到了“共产主义”（communism）；但它是基于一神假设的概念。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科学”的，不是基于“一神”假设，二元结构，而是经验所得，一多不分。它传到中国后，自然与受到两千多年“大同社会”“天下为公”浸染的中国大众心灵产生共鸣。究其因，正是因为二者在人生观、社会公层面有着“一多不分”的内在契合点。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儒学具有以下内在精神契合点：

（1）普遍联系的、动态的“一多不分”的宇宙观，而非个体对立的、一成不变的、“一多二元”宇宙观；

（2）宇宙观建立于人类实践经验的认知之上，而非建立在超绝唯一的造物神假设之上；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第302页。

(3) 其思维方式是“一多不分”的辩证统一,而非“一多二元”的绝对对立;

(4) “人”是道德之主体,是关系之焦点,应以提高服务大众的意识与能力来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而不认为“人”的被造物,无法实现自我的完满,是单子个体,应以竞争获取成功为人生意义;

(5) 视天下为一家,视世界为“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天下为公”为大道,视“大同世界”“共产主义”为人间理想社会的和谐共赢社会观,而非视社会为孤立个体的角斗场,视世界为各国博弈的竞赛场,视自私自利为天经地义,视零和游戏为国际准则的社会观。

正因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儒学具有以上宇宙观、认知观、思维模式、人生观和社会观方面的契合,我们才认为二者的联系绝非牵强附会,乃是一种底层逻辑、深层内在精神上的契合。可以说,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是中国儒学与时俱进的当代版本。

三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对立认识的偏差分析阐释

我们之所以要在今天分析探讨马克思主义与儒学融通的契合点,是因为长期以来,出于历史等原因,存在一种将两者对立起来的观点,要深入理解二者内在精神的一致性,就必须对这些对立的论点作出回应和解释。

(一) 马克思唯物主义与儒学“物我不二”对立吗?

现在有人质疑“唯物主义与儒学相合”的观点,认为中国儒学不是唯物主义。这就需要我们精细地辨认不同唯物主义的准确内涵。除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欧洲至少有两种唯物主义:

其一,是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企图寻找到宇宙最后的物质不变本体,寻找最后最本质的“上帝粒子”。这种科学的形而上学的寻找,是建立在超绝造物主的假设之上,已经被量子论所打破。量子论证明万物到最后其实是相互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中国古代哲学的正确性。

其二,是“经验主义”加“物质主义”形成的一种“唯物主义”,这是走向庸俗的物欲主义,也即追求物质、金钱等,典型表现就是美国思想文化。这种“唯物主义”是从否定宗教和上帝开始,是沿袭启蒙运动思想,最后走到极端的追求物质的文化。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是由反对形而上学唯心主义而建立的,此“唯物主义”是针对上帝“绝对精神”的辩证,因此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是将哲学拉回到“现实人类社会”的域境中,是关注“人”而非关注“神”的哲学,是一种人类经验哲学,而非神的假定哲学。

同时,虽然马克思主义是经验主义,但并非“唯物质主义”。它的唯物是唯社

会现实和人的社会存在。马克思主义恰恰反对物质对人的异化，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利益至上正是对人社会性的阉割，是将人虚构为单子个体，炮制个人主义意识形态。这样做是剥夺人的自然性，将人变为以追求物为目的而导致自身物化，将人变为劳动力，变为商品，是对人性的一种奴役。

总之，马克思唯物主义追求的目标是全人类的解放，此“解放”有两层含义：一为摆脱神本的束缚，二为摆脱物的束缚。而此两者正是中国儒学的特质。中国儒学有“敬鬼神而远之”的传统，孔子“不语怪力乱神”，中国儒家“人”有成圣成贤之权利，有与天地参之可能，这是中国顶天立地之人的权利。同时，儒学赞赏“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的孔颜之乐，追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人气节，正是反对人被物所奴役。楼宇烈先生曾说中国文化的特质是“上薄拜神教，下防拜物教”^①，可见，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与中国儒学特质具有深层一致性。

（二）马克思主义“自由”“平等”理念与儒家“君君臣臣”观念对立吗？

这一问题我们在前面其实已经论及，但对此问题长期以来理解模糊，我们在此节想加以澄清。

马克思主义的“自由”，是人摆脱了物的奴役，摆脱了压迫的“一多二元”社会制度之后，获得的一种个人极大发展，同时又能极大地服务于整个社会的自由。这是区别于目前个人主义，只追求个体的欲望的一种浅薄自由主义，而接近中国儒家所说在志学、而立、知天命之后达到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内涵。

“平等”在儒学及中华思想语境，是由人与人相系不分喻义而来，不是从人作为单子个体的“个人主义”喻义而来，是一种恰宜正当的“中和”情景，表述的是恰宜关系达到的状态，应是社会和谐、人人各得其所的“大同”含义。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后，“平等”一词正表达了这一含义，即从“仁”延伸而出的社会人群阶层平等，是人与人互相尊重。在此意义上，“礼”也是“平等”，如我们前边所讲，社会分工不同，但无贵贱之别。不能认为父母和儿女之间，官长和百姓之间不平等，关系只要是相互性的即是平等，就是互相尊重与做好社会关系之本分。

在此需要说明，马克思主义和儒学都是建立在人类真实经验社会的哲学，不是建立在假设至上的想象。很长时间里流行着一种把“乌托邦”标签贴到“共产主义”或者“大同世界”思想的谬说，其实“乌托邦”的本质必然是“一多二元”的空中楼阁。而马克思主义“一多不分”才是来自实践、付诸实践的和真正可实现的。人与人之间是内在联系的，这是常识，是不需要证明的。人生来就是互相竞争和敌对的观点，是人为的假想虚设。认为宇宙有一个超绝力量主宰才是假想，至今

^① 楼宇烈：《中国的品格》，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第48页。

也是一个虚构。在此基础上精心制作一套美妙的话语：“自由、民主、人权”，才是真正的“乌托邦”。这是要彻底纠正哲学谬误，恢复经验的、可靠的，实实在在地反映天地人实在情况的哲学。

世界上没有抽象普世“民主”。真正的人民民主也不是简单一个选举形式，而是整个一个庞大的人生社会生命系统工程。民主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西方建立在个人主义之上的“自由”“平等”“民主”，不可能建立这样一个系统工程。只有在“一多不分”的互系宇宙观之上，才可能实现真正的自由、平等和民主。西方自由主义，口口声声要实现个人自由，但若每个人只关心个体自由，而不将社会看作一个整体，那么最后一定会陷入社会的混乱之中而无任何自由可言。事实上，新冠肺炎疫情在西方失控，正反映了西方这种自由主义的悖论。

（三）中国传统为什么需要马克思主义？

“既然中国传统已经那么好，为何还要从西方引进马克思主义？”也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这要从西方交流和历史的风云际会中寻找原因。

马克思主义学者张允熠认为其原因是“在16~18世纪东学西渐过程中，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对包括黑格尔、费尔巴哈在内的著名欧洲哲学家和欧洲思想界以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产生了深远影响。”^①英国学者李约瑟先生也曾指出“当欧洲在向中国寻求真理的热浪中酿成了法国革命的时候，落后的德国思想界正在进行着使哲学中国化的努力。卢梭也好，休谟也好，包括康德曾经崇拜的莱布尼兹、沃尔弗、伏尔泰也好，都是17至18世纪二百年间代表全欧洲向中国寻求真理的思想巨匠。”^②马克思在专门论述中国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是哲学家不能漠视的定理，就像天文学家不能漠视刻卜勒的定律或牛顿的伟大发现一样。‘对立统一’是否就是这样一个万应的原则，这一点可以从中国革命对文明世界很可能发生的影响中得到明显的例证。”^③

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来源之一，其与中国哲学的血缘联系自然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当马克思说“中国哲学黑格尔哲学具有共同点”时，实际上已经宣示了他本人的哲学也跟中国哲学具有“共同点”。这正是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后不会水土不服的内因。

从历史外因来看，20世纪初的中国，正处在酿生革命的大变局势，而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一种革命哲学引入中国，正符合革命的需要。内外忧患之中国，军事政治的失败，使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对自己传统思想的批判，儒家思想首当其冲，在当时已经不可能承担革故鼎新之使命，而来自西方的革命意识形态为中国人民所青

① 张允熠：《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学脉渊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8年第1期。

② 张允熠：《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学脉渊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8年第1期。

③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778页。

睐，使领导中国革命的核心共产党得以建立，从而重构了一多二元的“心一场”社会结构。此结构一旦形成，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就发生扭转，在仅仅数十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成立了。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是完全有效的。

那么是否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理论已完成了历史使命，在建设国家事业中变得可有可无？答案是否定的。传统儒学对待现代问题需要与时俱进，“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要转化成新时代的新话语，要直接应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现实。马克思主义是直接揭示资本主义压迫与剥削的社会现实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解决现代及后现代人类的问题的。现代和后现代的人类问题，就是资本主义带给整个人类一个全面危机的现实。马克思时代这一现实，直至200多年后的今天没有改变。而且世界私人资本势力更为强大，也因此今天更需要马克思主义这套具有深刻分析意义的传播载体。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转化，换言之，儒家思想在当今的版本就是马克思主义同儒学及优秀中国思想相结合的体系，并且是取得社会实践历史性成功的新转化。不可把马克思主义和儒学及优秀中国思想传统割裂、对立起来，二者是互系不分的。我们如果把二者有机地结合，中国则继续昌盛，继续进步、繁荣；如果将二者对立，中国会重新重蹈覆辙、遭受挫折。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转化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对西方“一多二元”自由主义思想结构的截然反衬与断然拒绝。儒学哲学由于具有同马克思主义契合相通的宇宙观与思维方式，并通过一场具有强烈中国意识的中国化哲学运动，将马克思主义嫁接到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传统的大树上，融合成为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必须理解到，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分析今天世界问题的锐利武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融合，是中国文化继儒释道融合之后，再次海纳百川、推陈出新的文化革新过程，具有全球性的历史文化意义。

结 语

21 世纪的今天，中国的社会现实、国际地位乃至当前世界格局，已发生和正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面临百多年来空前复杂与严峻的局面，中国视角也几经变化。然而，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一以贯之的逻辑没有变，中国与世界的历史课题没有变，中国道路“一多不分”的逻辑没有变。我们仍然是在近代以来先辈们开辟的道路上，绝不能忘记初心，必须继续他们未竟的事业，为欣然迎接不断摆到面前的新问题而提升我们理论的高度、广度和深度。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契合融通，是时代大课题，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讨论。

From Confucius to Marx: A Study on the Inner Spiritual Compatibility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Marxism

TIAN Chenshan

Abstract: The integration of Marxism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s a major topic of the times. Only when we thoroughly study the origins and internal relations of them can we clarify the core and context of mainstream Chinese thoughts formation of, thereby lay a soli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establishing a complete and self-consistent Chinese road narrative theory system. This article first uses the “comparative cultural semantic environment” methodology in Chinese and Western interpretative philosophy to conclude that the core gen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mainstream culture of China and the West lies i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one multiplicity” and “one multiplicity duality”. On this basis, it analyzes Confucianism and Marx’s genetic pattern in the semantic environment of their own cultures, thus reveals their spiritual convergence in terms of world outlook, epistemology, thinking, social outlook, and values of life. And then explains the reason why the two meet in history, analyzes several viewpoints that have been misread as opposites, and further clarifies that the two do have an inherent spiritual compatibility, and the “matching” and integration of Marxism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academics based on Confucianism has been completed and be proved by the great practical results of China’s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Keywords: Marxism; Confucianism; Compatibility; Comparative Interpretation of Philosophy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中医药独特优势何以彰显中华文化软实力*

吴文新**

【摘要】2020 年春初一场新冠肺炎疫情突袭而至，在全民抗疫中，中医药以其独特优势取得了优良的防治效果，赢得了社会广泛赞誉。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中医药以生命—生态性的复杂系统思维方式，对治疫古方化裁而成具有特效的“三药三方”，整体性而又个性化地诊治患者，具有无可置疑的更为先进的科学性。中医药这种生命、身心和天人整体观及其预防诊治康复技术体系有来自具有同样世界观和方法论、价值观的中华文化母体，而且二者母子连心、基因一致、血肉一体；作为“医药实学”生于并融于中华文化，既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化宝库的钥匙，是中华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内容。因此，我们要遵循中医药文化的本质和规律，适应时代特点和中国乃至世界人民的健康需要，推进中医药文化的守正“双创”，使之造福全人类，不断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

【关键词】中医药文化；中华文化；复杂性思维；守正创新；文化软实力

2020 年从公历元旦至农历春节，一场新冠肺炎疫情借助春运高峰从武汉蔓延全国，但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国人民团结一心、凝心聚力，经过两个多月奋勇抗战，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取得决定性胜利，经济社会秩序迅速恢复正常状态。回顾这次抗疫斗争的胜利，毫无疑问，每个中国人心里都坚定而清晰地感受到了，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中国共产党坚强而英明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5 万多勇敢“逆行”驰援湖北的医护、军人和志愿者们所充分彰显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但令人惊喜的是，中医药及其健康养生文化在抗疫中表现优异、贡献突出，这让我

* 基金项目：“科学认识和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研究”（项目编号：19BKS179）和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学术团队阶段性成果。

** 吴文新，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副院长，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中华文化的现代转化。

们深刻地感受到以中医药文化为载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巨大自信。于是,复兴中医药文化、加强中医药文化创新发展,就成为我们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助力中华文化伟大复兴、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任务、重要内容和实践途径。

一 效果显著:中医药阻击新冠病毒广受好评

抗疫伊始,中央的战略部署中就蕴含了中西医并重、中西药并用的思想,这促进中医药深度介入诊疗全过程,及时推广有效方药和中成药,有效减少轻型和普通型向重型、重型向危重型发展,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据报道,抗击疫情期间全国中医药主要开展了三方面工作。一是4900余名中医药人员驰援湖北,约占援鄂医护人员总数的13%,其中有院士3人、数百名专家,援助队伍规模之大、力量之强前所未有。二是轻症治疗和恢复期治疗中医药早期介入,重症、危重症实行中西医结合,制定了相应的治疗规范和技术方案。三是筛选出金花清感颗粒、连花清瘟胶囊、血必净注射液和清肺排毒汤、化湿败毒方、宣肺败毒方等有明显疗效的“三药三方”。

效果怎么样呢?据央视网报道,2020年3月23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领导介绍,全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中,有74187人使用了中医药,占91.5%;其中,湖北省有61449人使用了中医药,占90.6%;临床疗效观察显示,中医药总有效率在90%以上。^①这一突出成效受到国内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和积极评价。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在总结这次抗疫斗争经验时说:中医药是这次疫情防控的一大特色和亮点。在没有西医特效药和疫苗的情况下,注重发挥中医药治未病、辨证施治、多靶点干预的独特优势,首次大范围有组织实施早期干预,首次全面管理一个医院,首次整建制接管病区,首次中西医全程联合巡诊和查房,首次在重型、危重型患者救治中深度介入,探索形成了以中医药为特色、中西医结合救治患者的系统方案,成为中医药传承创新的一次生动实践。国际社会高度评价,“中西医结合的方式是抗击疫情的重要方案,正为全球抗疫作出贡献”。^②这实际上告诉世人,中医药在此情况下承担了治疗新冠肺炎“特效药”的职能。是否真的如此?随着我国抗疫趋于收尾,各种治疗措施的效果正在总结梳理之中,纯中医药、纯西医药、中医主导西医辅助以及西医主导中医辅助的不同方案治疗效果的对照研究陆续展开。这些研究结果将让人们非常欣喜地看到中医药的威力。

据新华社报道,仝小林院士团队的研究中,最终进入分析的721例,寒湿疫方组430例,对照组291例,主要的结局指标是新冠肺炎病情加重率:寒湿疫方组为

^① 《国务院新闻办就中医药防治新冠肺炎的重要作用及有效药物举行发布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 http://www.gov.cn/xinwen/2020-03/23/content_5494694.htm。

^② 孙春兰:《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全面加强疫情防控第一线工作指导督导》,《求是》2020年第7期。

0 例 (0.0%), 对照组为 19 例 (6.5%), 差别有统计学意义。患者总体年龄的均数为 48.5 ± 14.4 岁, 中位年龄为 48 岁。有合并基础疾病的例数为 334 人, 占 46.3%, 合并使用中成药的例数为 452 人, 占 62.7%。研究表明: 在社区推行寒湿疫方对控制新冠肺炎病情的加重具有保护作用。武汉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所有住院新冠肺炎病例 1476 例, 其中, 重症/危重症新冠肺炎患者 662 例 (中药汤剂组 484 例, 非中药汤剂组 178 例)。分析其中重症/危重症新冠肺炎患者的病亡风险, 结果显示, 共病亡 71 例, 其中中药汤剂组病亡 15 例; 未用中药汤剂组病亡 56 例。统计分析表明, 中药汤剂组的病亡风险下降了 87.7%, 与未用中药汤剂组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据仝小林介绍, 以年龄、性别和病情程度这 3 个影响因素为匹配变量, 采用倾向性评分最终匹配成功的病例为 312 例。病亡 49 例, 其中, 中药汤剂组病亡 13 例, 未用中药汤剂组病亡 36 例。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中药汤剂组的病亡风险下降了 82.2%, 差异仍具有统计学意义。^①

一年多来的中外抗疫的无数事实证明, 在中医队伍只占 13%, 并面临种种有形无形阻力的情况下, 这“三药三方”有如此疗效, 该是中医人付出多大代价才取得的! 这些工作和效果, 以及一年多来的中外抗疫的无数事实, 毋庸置疑地证明, 在西医药特效药缺席的情况下, 源于中华医药古方化裁而成的“三药三方”就是治疗新冠肺炎的特效药。这些事实不仅直接回击了那些“黑中医”和“废中医”的论调和行为, 更向公众展示了古老中医药文化的青春活力, 为新时代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带来新的希望!

二 生命—生态性复杂系统思维：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

中医药文化跟其中华文化母体一样底蕴愈厚、韵味愈醇。这一文化形式确实古老, 其表达方式难以为现代人们从容接受, 但作为中华先贤关于人的生命整体、身心奥秘和人与外界关系的一种世界观、方法论、价值论和实践论高度统一的认知范式、文化体系及完整的预防—诊治—康复技术体系, 却有着超越仅有 200 余年历史、源自西方文化的近现代医学的先进之处。正如习总书记所说: “中医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 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②

第一, 中医学的认知范式遵循复杂性系统思维的规律。

它把人的生命、整个身心乃至身心整体与外界环境 (自然、社会等) 之间的关系视为一个复杂的超巨系统, 这个系统的典型特征就在于其结构—功能的整体性、质—能—信息关联运行的开放性。复杂性、系统性、整体性、开放性思维是中医药

^① 《治疗新冠肺炎 中医药全过程起效》,《人民日报》2020 年 4 月 4 日, 第 4 版。

^② 习近平 2010 年 6 月 20 日出席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中医孔子学院授牌仪式时的讲话, “学习强国”, <https://www.xuexi.cn/lqpage/detail/index.html?id=29593211811999052>。

学及其相关文化最为典型的思维方式。复杂性是说人的生命系统（身）、意识或精神系统（心）、人的身心系统，以及这个整体与外部一切环境系统及其因素之间的关系（可称为“天人系统”）都是开放性的复杂系统，既具有符合生命规律的某些宏观—中观层面的确定性、必然性，也有着中观和微观层面的不确定性、随机性、偶然性等，因此，同样的疾病在不同的人身上会有不同的发病原因（“病机”）和机理（“病证”），或者不同的疾病在同一个人身上也会有相同或相似的病机和病证，甚至在不同的环境、条件、时间、地点、生活行为等影响下，不仅会有显著的个体化差异，而且还可能会有微妙的时空差异（时辰、方位等）。因此，有人称中医为“时间医学”“功能医学”等，确有其道理。复杂性的基础是系统性，系统性的本质特征是整体性，后者决定了中医“头疼医脚”的诊疗方法论的合理性。中医药学看待人的系统性和整体性，不仅是外观视角的实体结构上的，更是内在关联性视角的系统性和整体性。它有一整套术语、概念和表达方式来帮助人们理解这一系统性，比如阴阳、五行、经络、穴位、脏腑等。不仅不同的人有阴阳（男女）之分，而且同一个人内、外阴阳而又各有阴阳。人的生命系统中各个实体性要素无不有阴阳，比如心阴心阳、肝阴肝阳等。一般而言，脏为阴腑为阳，而在不同功能侧面则脏腑之间又互为阴阳。经脉也有六条阴经六条阳经。说人有三宝精气神，实际上人身上任何实体性的器官、组织也都有精气神三个层次，而精气神又各有其阴阳。比如，心脏之“精”比较接近现代解剖学上的心脏器官，心之“气”即所谓心气（通常所谓心阴心阳多指的是心之气的阴阳），心之“神”即所谓心神（亦有心之阴神、阳神之别）。再比如，肺脏之“精”相当于解剖学上的肺脏实体，肺之“气”即肺气，乃肺脏之功能动力（不是肺主呼吸的那个空气），肺之“神”即肺脏所藏之“魄”（五藏之一）；等等。与此相关，“治未病”就是通过调节人之身心的精气神的内在关联性使之实现阴平阳秘或结构与功能的平衡、时间与空间的适应、内部运动与外部环境的协调等，这就是养生保健的道理。同样，四诊（望闻问切）合参、八纲（阴阳虚实寒热表里）辨证诊治疾病的技术方法也无非是从这些方面入手。

第二，中医把人的身体看成一个有生命的即活的系统。

即使持有机机械唯物主义思维范式的现代科学也初步了解到，生命现象本身就是一个在整体性层面突现出来的功能性现象，而并非机械还原的基因、碱基对、核苷酸等能够揭示其整体性功能机理的。生命是活的，这个道理西医也懂，但无法落实到诊疗技术上，中医则从“治未病”到“治已病”始终贯穿“活”的原则。“活的”生命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病毒附着在一块钢板上，不多时就会失去活性，不再有“毒”，这是因为钢板是“死的”；但一个病毒在一个活的宿主身上，便会随着宿主生命的运动而发生变化，并在适当的细胞、组织、器官里存活下来并不断吸收宿主的生命能量而复制自己、发挥毒性活力，以此方式破坏宿主生命的整体性、内在要素相互关联的协调性、平衡性等，从而导致宿主得病甚至死亡。“活的生命”

是一个同义重复的说法，生命就是活的，活的就是生命。但是病毒似乎不是完整的生命单位，却具有生命的活力，而其活力（即对宿主生命的解构力和破坏力）也只有有在活的宿主生命体内才能彰显出来。西医实际上注意到了病毒的活性，把它放到培养液中进行培养观察，以发现其活性规律并最终找到“灭活”它的办法（特效药等），但是它忽略了宿主的生命系统的客观存在，特别是其整体性和复杂性；尽管做了一些动物试验，但其最终目的是要在人身上发挥杀灭病毒的作用，所以还是有很大差异的。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病毒在培养液中的活性表现和在宿主复杂的生命体中的活性表现是大不相同的。不过，仅此还远远不够，还要针对“人”本身。而中医恰恰特别注意人的生命活性，它既没有精准地捕捉到病毒并把它放在特殊的培养液中，也没有把它放在实验动物体内，而是根据它的天人整体观，按照它所特有的天人相应理论，在精气神合一、天人合一和八纲辨证的意义上直接做人的整体性诊断和治疗。“活的生命”是中医药一切诊疗的绝对前提，疾病发生于活的生命体，发展于活的生命体，当然也要在活的生命体中遏制它的恶性变化，最终拯救这个活的生命体，并使之活得更好。此外，“活的生命”不仅是一个生命系统，还是一个生态系统。以细菌在人体内的生存为例，据研究有几百种细菌寄宿于人体这个生态系统的不同脏器和组织，居于不同的生态位，参与人体的正常生命活动。如果由于饮食不当或外邪（比如与人体没有共生性的细菌）入侵导致这些细菌群落失衡，便会使人体的八纲失衡、气血失常，人的身体就会呈现病态（症状）。以作为外邪之一的病毒入侵而言，作为外来之物，总要受到人体天然免疫系统的鉴别和改造，如果病毒的活性与人体生命运动规律相一致，那人体就能和病毒和谐相处，或许疫苗就起到这样一种作用；但是更多的时候，病毒会把人体作为宿主而寄生于某些器官或组织，通过与其正常细胞的相互作用（更多的是对这些细胞的侵入、掠夺、破坏或解构）而营造适合自己生存繁衍的微环境，从而导致这些器官的衰竭、组织的崩溃，最终致使人不可逆地走向死亡。所以，针对病毒性传染病的预防和治疗，主要就是防止病毒入侵人体，并通过改善人体内的微观生态环境来破坏适合病毒生存的条件和环境，使之自然“死亡”或不能够发挥作用，如此彻底阻断病毒在人体内的生存繁衍。中药的作用，用西医的话说就是，改善人的免疫系统功能，提高免疫力，以及增强免疫系统对病毒的“灭活”效率；用生态学的语言讲就是，通过改善人之生命体内的生态环境而根除作为外来邪物滋生繁衍的土壤。病毒邪物即使侵入，由于没有生存繁衍的环境而无法发挥其毒性伤害人体，此正所谓“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西医如果不能把人体作为一个复杂的生命—生态系统来对待，那么它对病毒性传染病的治疗技术和手段就永远跟不上病毒本身之变异的步伐（这个变异是目前生物科学所无法预测、无法掌控的，或可说自然界中的病毒、特别是跟人关系密切的病毒之变异无规律可循），“特效药”和疫苗研制的速度何以跟上病毒变异的速度呢？中医则用增强正气（改善内微生态环境、增强免疫力）来“以不变应万变”，就如同我们通过改善生态环境来最大限度避免自然灾害及其对人类社

会的威胁一样。

第三,中医还把人的身体看成一个有意识的生命体。

这是更为重要的一点,揭示了人的生命体与其他动物之生命体的本质区别,因而把人的生命跟小白鼠或实验室里的培养液等区分开来了。中医尽管没有细菌、病毒这些实体性科学概念,但它知道,病毒细菌作为“外邪”“外淫”“异气”“戾气”等进入有意识的人体之后,其功能态是根本不同于它们在单纯实验室(甚至无意识的活体小白鼠体内)或纯自然环境里的功能态的,因此同样的药物对它们的作用是不同的。这一点的核心或灵魂是“有意识的”生命体。人的生命不仅是活的,而且是有意识的,包括了人的七情六欲,或者怒喜思悲恐(五志),或者魂神意魄精(五藏),这些意识性或精神性的东西(古人称之为“情欲”“情志”等),毫无疑问对人的生命体的影响是客观存在,并且常常是相当显著的。因此,人的生命体实际上是一个身—心统一体,简单地说是生命系统和意识系统相互作用而构成的超级复杂系统,亦即一个精气神相互作用的超级复杂巨系统。众所周知,对健康而言,意识系统的调整似乎更具有主导性的意义,比如人们常说阳光的心情带来健康的身体,或简单说“心态决定身态”(身体或生命状态);这就是中医理论中“喜伤心、怒伤肝、思伤脾、悲伤肺、恐伤肾”等道理。既然如此,我们身体的生命活动、意识活动及其对生命活动的影响若违背人的生命规律,必然伤及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阻碍经络畅通、气血运行等,就会导致生命系统运行失常,身体患病。据此,中医不仅有清心寡欲的养生之法,有调畅情志的舒心之方,还有根据五脏六腑与情志之关系的理论而形成的养生治疗康复方法,比如“五字诀”以五种声音调节情绪而对治脏腑之疾,音乐疗法也是如此。在这次抗疫斗争中,我们看到很多医护人员与患者一起唱歌跳舞、娱乐游戏、打太极、练八段锦等都起到了很好的改善人体内微环境从而促进康复的作用。人的精神情志(神)对战胜疾病的作用,也是通过改善气机和气血的运行状态(气)来发挥对于脏腑病灶(精)的改善作用,即所谓“精气神”系统的内在关联性,使得“神—气—精”的反作用规律发挥效能。总之,人这个有意识的生命体,作为精气神的统一体,具有小白鼠之生命体所不具备的独特功能,因而诊治疾病,实际上就是诊治人的精气神整体状态而不只是患病的病灶部位(精)。通俗地说,是“治人”而非“治病”,“人”好了“病”也就好了,而不是相反。如此可以发现西医在这方面的明显缺陷。

第四,中药制作遵循生命—生态的系统化规律,并非仅发挥单纯“有效”化学成分的作用。

中药无论是汤剂还是颗粒或胶囊,都是按照“君臣佐使”的原则配伍炮制而成的,是针对症状及其病症(包括季节气候饮食及患者体质等不只是外表病象)展开的整体性、系统性及内在增强性的生态性、生命性治疗,并配之以情志调节。生命性、生态性是中药配伍的根本特征,“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体现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等辩证关系的原理理念,是根据矛盾特殊性、

针对患者个性化特征的配药用药原则。一般而言,“君药”就像国王或皇帝,有统领性和决定性,是针对病证病机的根本之药;“臣药”就像丞相是皇帝的左臂右膀,具有执行皇帝命令的职能,把君药的指令信息传达到全身,发挥整体性的调节作用,增强君药的功效;“佐药”主要是辅助君药和臣药,除了增强对治功效,还能制约君药和臣药的毒性、治疗其他关联性病症(所谓“综合征”);“使药”除了对调和君药臣药佐药之功效外,还能把各种药物之性(寒凉平温热)味(酸苦甘辛咸)引入相应的经络,使之发挥调节气血、舒达脏腑的作用。显然,这是一种比附的说法,体现的却是一个生态系统的理念,一服中药君臣佐使各归其位各司其职、相互配合相互协调,共同发挥整体性调节治疗作用。显然中药的功效是多靶性、全方位的,是在生命—生态系统的意义上发挥作用的。不仅如此,中药大多来源于自然界,是自然生态环境的产物,由于特殊地质与水文气象环境的差异,不同产地的药物呈现的性味也有很大差异;与此类似,同一药物的不同部位也由于复杂的内外原因而呈现不同的性味特征和功效,因而可以治疗不同的疾病。比如橘子,作为中药,其实包含了多味药物,其不同的部分有不同的性味,名之为桔梗、青皮、橘皮(放一年后即陈皮)、橘肉、橘络、橘红、橘核、橘叶等,入不同的经络,治不同的病症。这跟西药的方法论和技术路线几乎截然相反。西药单纯关注以确定的化学成分精准地修正病毒或细菌的基因结构甚至某几个碱基对,这是一种典型的机械唯物主义、原子主义和还原性甚至降阶性、损伤性的诊治技术路线。西药的机械性体现在它对人体病灶部位的精准靶性,似乎是“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但是它对所有的人都是如此,而不去区分不同的人有着非常微妙复杂的个体差异,所以就出现“感冒通”“感冒灵”之类绝对的、普适的药物——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些药物对于感冒此类最为普通的疾病还真做不到“通”“灵”,原因就是它忽略了不同经络和气血类型的人表现为同样症状的疾病却可能有着完全不同的发病原因和机理。中医有所谓“同病异治”“异病同治”“内病外治”“外病内治”等在西医看来不可思议的治疗方式:只要病机和病证是相同或相似的,不管什么人就可以用相同或相近的方子来治疗;相反,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间似乎得了相同的病,但由于病证和病机不同,那也要采用不同的方子来治疗。这也告诉我们,研究中药不能着眼于中药中有哪些起作用的化学成分,然后把这些化学成分提取出来做成西药片剂等,这个中药化学化的思路是违背中药本质和规律的。事实证明,这样提取出来的中药片剂已经不再是中药而是西药,疗效当然还有但是比具有生命—生态整体性的中药方剂要差得很远了。这些年来中医药之所以受排挤、被边缘化,除了科学技术及其相关政策法规的原因以外,这种把解构中药方剂之整体性的化学化、西药化的研究和推广应用,不客气地说,就是一个错误的技术路线;或可说中药西药化是解构中医药、降低中医药疗效的一条歧路。这次抗疫斗争中,中药开出的“三药三方”不是千篇一律对所有新冠肺炎患者都一样,而是针对不同病期病症的患者,每天通过多次的望闻问切进行即时性的诊断,进而在“三药三方”相对稳定的君臣佐使配伍基础

上,进行化裁变通、适当微调,形成个性化的药方,同时也确保了中药方剂的整体性,是较为典型而纯粹的中药疗法,因此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治疗效果。

第五,中药使用着眼整体调节而避免了精准靶性治疗所带来的伦理风险。

中药直接在人身上使用,并没有必不可少的动物实验、人体试验等环节,这是否涉及危害人体的伦理问题?的确,中医不做小白鼠试验和人体试验,不牵扯太过复杂的伦理问题。它的前提和对象都是活生生的有七情六欲的人,一切疾病都在这样的活体及其内微环境与外部自然和社会文化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发生,因此调节这些关系是对治疗疾病的关键和灵魂——中医的阴平阳秘、五行生克、五脏六腑、经络气血、穴位感应等及其决定的辨证论治和药物性味归经体系,都无不归宗于此。如前所述,中药的生产有着非常独特、非常符合唯物辩证法的生命—生态性的个性化配伍技术和方法,它已经是在遵循人的精气神整体功能性规律的基础上生产出来的,那么,使用时只要通过诊断确定患者的病证病机而辨证用药即可,另须讲求用药的不同时辰,根据不同时辰不同脏腑之不同经络的运行状况而针对性地用药,效果就更为突出。中药方剂的生命—生态整体性针对的恰恰也是人的身心或精气神的整体性,因此辩证地配伍炮制、恰当地处方使用,中药的副作用就会最大限度地降低或消除。显然,西医药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恰恰缺乏这些最本质的东西。西药的单一靶性决定了它针对精确病灶的显著有效性,不过由于药物化学成分要在人的生命—生态系统整体中通过循环运行才能到达病灶靶点,因而在此过程中对其他脏器、组织、细胞往往会造成较为显著的副作用,甚至引发其他并发症。所以人们常说西药是一把双刃剑,在治疗病灶的同时也伤害了其他健康的部位、威胁到整体的生命功能。非典时期针对 SARS 病毒的激素疗法在杀灭 SARS 病毒的同时给患者留下了其他的脏器损伤后遗症,就是如此。机械唯物主义的原子主义世界观和分析还原方法论是包括西医药在内的近代科学的基本哲学基础。由于不符合基于现代复杂性系统科学的唯物辩证法,其对人体生命的副作用实际上体现出形而上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严重缺陷。严格遵循中医药理论方法的中药疗法却很少有这样的副作用。中医药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且与现代科学中基于复杂性系统科学和生态科学的整体主义世界观和系统整合方法论相一致、相贯通。由于符合人之精气神及天人合一整体性的本质和规律,其副作用就趋于最小化。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药治疗实践也证明:中药的安全性是西药所无法比拟的。西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相比于中医来讲确实是落后的,当然应该向中医更为先进、更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学习,否则畸形发展的西医只能越来越多地给人的健康和社会进步带来伤害和阻碍,而不是给人幸福并助推社会进步。

以上所述,只是大致借用了一些现代科学术语混搭着论述了中医药显效机理的“科学性”。从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原则看,千百年来、数 10 亿人的诊疗实践证明了一种医药体系对人的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的合理性、有效性。如果用仅有 200 年历史的西方医药学来判断和衡量中医学,

那就是拿错了尺子、用错了标准。一种医药学体系的真理性、价值性的判断标准只能是诊治实践及其疗效。能否真正养生保健、预防疾病、治病救人、完形康复,提高人们的身心健康水平和生命质量,这是唯一标准,也是最高标准,而不是它是否符合某种医药体系;更不能因为它的发现发明方法及其表述方式不符合某种语言和文化体系或一些人的理解方式和能力,就把它作为陈旧落后甚至愚昧迷信的东西抛弃掉。当然,中医药的显效机理并非本文所述这么简单,笔者也无意贬低或排斥西医,只是在持续多少年排斥和边缘化中医药的整个大环境中,欲说明一点:既然承认系统科学、复杂性思维、生态学乃至生命科学、身心科学(有人甚至加上量子科学)等是最先进的科学,那么如果能够把这些现代科学综合起来,或许能成为我们理解中医药奥秘或魔力的科学基础。如此看来,中医药与现代科学并不矛盾,它的科学性、现代性(乃至后现代性)及面向未来和全人类健康的实践价值等都毋庸置疑,绝不负“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这一美誉。

三 中华文明的实学精髓: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其实践经验,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①此话寓意深刻,值得反复玩味、深入探究。这里,我们立足中华文化大母体的高度来分析中医药文化及其地位和意义。

第一,中医药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其中尽为人知的儒释道三家文化构成中华文明的主体架构,展开来说,诸子百家中还有墨家、名家、农家、武家、兵家及杂家等。人们往往忽略掉的,也是更重要的还有“医家”。它渗透在儒释道兵武农各家之中,甚至形成儒医、道医、佛医、武医等各具特色的中医流派,加上具有基本相同的生命、身心和天人整体观的其他各少数民族医学,中医药文化可谓蔚为大观。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在西方文化冲击下,在“科学主义”“机械主义”等“工具理性霸权”的淫威之下,我们的相关政策、法规、制度及大多数人的深层观念,大多有形无形、有意无意助长了这种怪事的滋长蔓延甚至泛滥成灾。于是,经典意义上的中医药文化的衰落和中医药后备人才的紧缺及其造成的后果,随着老一代国医大师的相继离去,随着生态系统的长久失衡和人们生活方式的“现代化”“高科技化”“非自然化”等,日益凸显。2020年春新冠肺炎疫情的突袭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确实为我们敲响了这个警钟!——中医药已被战疫实践证明是特效药,但是如果我们的中医药人才和资源储备更加充足,那就可以避免更多的病亡、挽救多少家庭的

^① 习近平2010年6月20日出席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中医孔子学院授牌仪式时的讲话,“学习强国”,<https://www.xuexi.cn/lqpage/detail/index.html?id=29593211811999052>。

幸福。可喜的是,近些年来,随着文化觉醒和自觉程度的提高,我们中国人民的民族和文化身份认同也在迅速提高,而且随着综合国力的日益强盛、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愈益被更多国家和人民所接受,我们弘扬包括中医药文化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内外氛围也在日益浓厚和改善。如果说中国硬实力的增长必然带来中华文化软实力的强大,那么这次中国人民以凸显中医药独特优势的抗疫斗争的胜利,则实实在在地为弘扬中医药文化、进一步彰显和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

第二,中华文化与中医药文化母子连心、血肉一体。

那么,中医药学(文化)与中华文化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前面已经初步提到,中医药文化是在中华文化的母体中孕育出来的,它们之间有着最为深层的“遗传基因”和血脉联系,可以说它跟中华文化在精气神各方面都是一体的。不仅中医药的生命整体观、身心整体观及其天人整体观,都与以《易经》《道德经》《论语》《庄子》等古典文献的世界观高度一致,而且在中医药经典方面,比如《黄帝内经》、张仲景《伤寒论》和《金匱要略》、葛洪《肘后备急方》、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孙思邈《千金方》和《千金翼方》等,以及宋代多部百科全书式的中医药经典荟萃,元明四大家特别是对瘟疫的著述等都充分体现了中国儒释道思想的哲学智慧。古代文人有“不为良相,即为良医”的人生追求,除了“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沉醉于“杏林”之中,或游走于民间悬壶济世、拯救黎民、抚慰百姓,无所他求。直至近代,众多国医大师的人生阅历告诉我们,饱读中华诗书经典,转而学习中医则非常易于入门,比如民国四大家之一的施今墨。反之,中医药从业者也首先应该是国学爱好者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践行者。中医药文化永远要吮吸着中华文化母体的乳汁保持自己独特优势的发展,并把它跟时代和现实需求相结合,来推动中医药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进而推动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反过来,中华文化的“两创”也能够为中医药文化的“两创”营造更好的文化氛围、提供更好的文化滋养。

第三,中医药文化作为“医药实学”是中华实学的典型代表。

从更深层次看,中医药文化既为独立的中华文化形态,又是具有一定辐射性、渗融性的文化要素。它不仅辐射到中华文化的其他所有领域,甚至成为中国人特有的一种思维方式,比如习总书记就曾借中医术语和思维方式来说明国家和生态治理的道理^①等;所谓上医治国,中医治人,下医治病,不仅说的是医道医术水平之高低,而且说的是中医学的世界观、价值观、修养论、认识论、方法论、实践论等,可以应用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甚至可以成为治国理政的思想宝库和智慧源泉。中

^① 比如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4月视察长江,就其生态问题这样说:“我讲过‘长江病了’,而且病得还不轻。治好‘长江病’,要科学运用中医整体观,追根溯源、诊断病因、找准病根、分类施策、系统治疗。”(习近平:《在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8,第9页。)

医药文化无时无刻不在接受着中华文化其他领域和要素的思想或智慧滋养。中医药体系中的认知和诊疗模式源于中华文化的世界观、方法论、价值观、修养论和实践论；中华文化借助中医药文化的实践致用性，成为具有“学以致用”“知行合一”实践理性特征的实学文化。中华文化本质上就是“中华实学”，中医药文化就是中华实学中的“医药实学”，是关于人的生命整体、身心整体及天人整体的实养实炼、实修实证、实察实验、实感实悟、实诊实治的理论和方法体系、学理和技术体系、养生保健体系、预防康寿体系和诊断治疗体系等。中华实学不仅包括常说的理学实学（又称实理实学）、气学实学（又称实气实学）、心学实学（又称实心实学），以及事功实学、实测实学（或科技实学）及“启蒙实学”等，更包括旨在确保人的生命安全和提高身心健康水平的“医药实学”——中医药学及其养生健康文化。医药实学之“实”，恰在于它来自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数十亿人养生保健、促进健康、诊治疾病的实践，在于它实实在在的“治未病”和“治已病”的效果，挽救了多少黎民百姓的生命、极好地延续了中华民族的人种血脉，在于它对于人的生命整体、身心整体和天人整体之生成奥秘的直觉把握和深刻洞察，在于它穿越千年而能够自如地应对人与外部环境相互关系的变化所带来的种种不适与失衡——2020年春西医药束手无策的新冠肺炎疫情也能在古药先方的基础上化裁出种种针对性的“特效药”来，这不是奇迹，而是必然，是它对人的身心奥秘和天人合一之深刻洞察、整体直觉的结果。有人总是要求中医药诊治疾病要讲出道理来、要做小白鼠实验、要做双盲实验、要做循证调查等，否则就是伪科学，就是骗子；这种说法过于武断而且充分显示的是对中医药文化的无知与偏见。几千年来一部部中医药经典著作，从《内经》到《伤寒论》再到《本草纲目》《温病论》等，无不头头是道、理论清晰，只不过中华先祖特有的表达方式有人看不懂罢了。看不懂就说没道理或是伪科学，岂有此理？千百年来无数中华民族的先人们，现在、曾经和依然受惠于中医药的人们所经历的治疗、康复和健康促进的实际效果，为什么不比仅仅有动物实验或少样本支撑的所谓“实验”“实证”更有说服力呢？难道检验医药学真理的标准不是大多数人或越来越多人的养生保健和诊治实践，而是少数专家的动物和几个病例样本的有效性实验吗？

第四，以中华思维、中华价值特别是中医药思维和中医药价值对待中医药文化。

以上论述表明，中医药文化只有在中华文明范式的框架内才能获得合理的阐释和精到的理解；相反，领悟了中医药文化的世界观和思维范式，也就初步摸到了中华文明的精髓之所在。这实际上告诉我们，那种试图在西方文化框架内或在西医药科学范畴内阐释和解读中医药文化的做法，可能具有一定学术意义，但对中医药文化的发展未必有本质层面的意义，甚至有可能是把中医药更加边缘化、去特质化、去优势化的一种方法；用中医药的态度和方法来对待中医药，用中华文化的思想智慧来推进中医药的生存和发展，才是符合中医药本质和规律的恰当做法。中医药作

为能够打开中华文化文明宝库的钥匙,是万万不能被号称“科学”的西医药文化的机械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所解构的;充分理解中华文化与中医药文化的母子连心、其间在精气神各层次各方面的血肉联系,是正确把握中医药文化的本质及其独特优势的基础和关键。

四 守正“双创”:推动中医药文化发展增强民族文化软实力

时至2020年4月,正值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取得决定性胜利之时,世界各国却开始了疫情的疯狂肆虐,迄今已近2年尚未见消失迹象。本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为了世界人民的安康,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愿意与世界各国分享抗疫经验,其中包括中医药抗疫的成功经验。在前半年外事活动中,无论是习近平总书记,还是其他党政部门,在多种场合频频提到中医药抗疫的方法和效果,这引起了世界各国的赞誉和重视,中医药及其健康养生文化走向世界、挽救世界上更多的患者、造福更广大的人群,就显得愈益迫切、意义也更加突出。但是这需要我们自己有充分的、高品质的中医药物力和人力资源,不仅满足国内人民对于健康的美好生活的需要,而且能满足世界人民的健康需要,这就要求我们在战略高度推动中医药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首先,内心里真正认同并切实增强对中医药文化的自信。

毛泽东同志曾讲,“中医问题,关系到几亿劳动人民防治疾病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的尊严、独立和提高民族自信心的一部分工作”。^①在这方面习近平总书记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他不仅一直坚持中西医并重的原则理念,体现了一种深刻的文化自信,而且在多次外交场合他也特别自豪地向外国人讲道:“传统医药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在促进文明互鉴、维护人民健康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医药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以其在疾病预防、治疗、康复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受到许多国家民众广泛认可。”^②在这次抗疫斗争中,他也多次向国内外强调,要战胜疫魔,必须坚持中西医并重、中西药并用,甚至讲到中医药抗疫斗争从古代防治温病的“隔离”到种“人痘”再到种牛痘和开发疫苗的历史,鼓舞人们更多更好地运用中医药来提高治愈率、降低感染率和病亡率。

其次,我们要把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中医药宝库保护好、传承好、发展好,深入挖掘中医药宝库中的精华,充分发挥中医药的独特优势。

中医药文化博大精深,中医药宝库资源丰富,中医药经典部部厚重,中医药思想极富智慧,中医药理论遵循辩证逻辑,中医药实践救扶黎民百姓,真可谓功德无

^① 《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第258页。

^② 习近平2017年7月6日致金砖国家卫生部长会暨传统医药高级别会议的贺信,“学习强国”,
<https://www.xuexi.cn/lqpage/detail/index.html?id=12096265956294742577>。

量,因此,毛泽东同志这样教导我们:“我们中国如果说有东西贡献全世界,我看中医是一项”^①;“西医要向中医学习……要尊重我国有悠久历史的文化遗产,看得起中医,也才能学得进去”^②;“这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闲视之。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③毛泽东说:“你们不要以为针灸是土东西,针灸不是土东西,针灸是科学的,将来世界各国都要用它”^④;“重视中医,学习中医,对中医加以整理,并发扬光大,这将是我们的祖国对全人类贡献中的伟大事业之一。”^⑤他把挖掘、传承、弘扬中医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奉献于人类的一项伟大事业,可见中医药文化之珍贵、传扬它的重要意义和深远价值!

再次,坚持古为今用、守正创新,努力实现中医药健康养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代健康理念相融相通。

中医药文化诞生于小生产和手工业的农耕经济时代,其文化的家族秘传之法,有其独特的优越性,但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在某种意义上影响中医药文化的发扬光大以造福更多的人民;其理论表达方式的确令今人难以尽快掌握其精华和诀窍,影响了普及推广和普惠应用。因此,根据时代的特点、环境的变迁、世界的实情、世人的需要等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具有客观的必然性、紧迫的必要性。但是,正如总书记所说,“要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传承精华,守正创新”^⑥。这个创造、创新一定以守正为前提,是守正转化、守正发展,而不是解构性、破坏性的;一定是在中华文化系统中的,而不是以另外的文化做标准来评判和剪裁;一定是保持其中医药生命整体、身心整体和天人整体之质的规定性的,而不是把它变成另外的东西或者非中非西、非鹿非马的东西。毛泽东曾十分关注这个问题,他认同1959年1月21日《人民日报》社论《认真贯彻党的中医政策》里的说法,“不要对于中医治疗办法中暂时还不能作出科学解释的部分轻易加以否定”^⑦。可见,中医药创新发展的前提是“守正”,既要避免曾经出现的“中西医汇通派”以西医为标准、为先进及以西医教育方法培养中医人才的做法,也要避免固守中医药经典、局限于家族代际秘传的保守做法,而要将经典学活,借鉴家族传承培育高超医道医术人才的实质性经验,推广到现代化的中医药教育体系之中;同时将中医药经典理论通过种种通俗而实用、合理而合规的方式加以传承和推广普及,能够使最广大的人群切实养成卫生养生、保健预防的习惯,从而促进健康、延年益寿,提高现代人的生命质量、生活品位、人生内涵、人格境界等。

① 《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第205页。

② 《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第245页。

③ 《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第462页。

④ 《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第365页。

⑤ 转引自李经纬《中医史》，海南出版社，2007，第403页。

⑥ 习近平2019年10月对中医药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学习强国”，<https://www.xuexi.cn/lgpage/detail/index.html?id=16430940896098883854>。

⑦ 《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第575页。

最后,建立健全法制政策标准体系,发挥中医药在治未病、重大疾病治疗、疾病康复中的重要作用。

要落实习总书记指示:“建立健全中医药法规,建立健全中医药发展的政策举措,建立健全中医药管理体系,建立健全适合中医药发展的评价体系、标准体系,加强中医古籍、传统知识和诊疗技术的保护、抢救、整理,推进中医药科技创新,加强中医药对外交流合作,力争在重大疾病防治方面有所突破。”^① 这涉及国家层面的中医药政策体系和制度建构问题,也是关于中医药创新发展造福人民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问题。笔者认为,在即将到来的振兴、复兴中医药的过程中,不能用机械唯物主义(分析还原-科学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解构中医药理论体系,坚拒用转基因技术改造中草药种质资源,这是毁掉中草药疗效的釜底抽薪之举,要有高度警惕性,因为中医药最讲求顺从自然,讲求天人合一;不能把高等中医药院校办成西医药教育为主、中医药教育“特色”点缀的学校,而要切实符合中医药文化体系本质和规律及其核心价值观和方法论来培养真正的中医药人才;不能把西医药的执医标准机械照搬到中医药领域里来,因为这两个是截然不同的标准——中医药应以疗效为中心建立独立的中医药标准体系;不能忽视乃至歧视世家传承的“民间中医”富矿,通过合乎伦理无违法规的途径和方式,把散落于田间地头、街头巷尾的万万千千身怀绝技的“民间中医”充分地挖掘出来,使他们合法地、体面地从事救死扶伤、悬壶济世的伟大事业,根据中医药自身的发展规律、人才成长规律和执医诊疗规律来支持、鼓励、引导其合理合法发展;不能按照西医药资本化、产业化的思路,把中医药事业完全市场化、商品化,成为资本赚取无止境利润的所谓占GDP多大比重的“支柱产业”,因为中医药事业本质上是养护生命、守护健康的文化事业、科学事业、公益事业和慈善事业,金钱至上、资本逻辑必然腐蚀中医药文化的灵魂,中医药历史上的“大医精诚”以生命至贵为圭臬,资本、利润跟权势、地位一样都会扭曲中医药文化的价值观,最终彻底毁掉中医药。

中医药文化只有保持其质的规定性并在其本质和规律的轨道上传承、弘扬、创新、发展、推广、运用,才能愈益充分地彰显其独特的预防诊疗康复优势。如此真心弘扬中医药文化,在不断夯实健康中国之文化根基的同时,更加自信地“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充分发挥中医药防病治病的独特优势和作用,为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② 这也是中华文化软实力得以流光溢彩、普照全世界、惠及全人类的时候!

①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第115页。

② 《习近平对中医药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传承精华守正创新 为建设健康中国贡献力量 李克强作出批示》,《人民日报》(海外版)2019年10月26日,第1版。

Why the Advantag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ould Enhance the Soft Power of Chinese Culture

Wu Wenxin

Abstract: In the early spring of 2020, a new crown epidemic raid on China. In the national anti-epidemic, Chinese medicine has achieved excellent prevention and control results with its unique advantages, won wide acclaim in the society. Therefore, the key lies in the Chinese medicine internally has life-ecological complex system thinking mode, to cure the epidemic by “three drugs three parties” from the ancient prescription, the whole but personalized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patients, and obtain remarkable curative effect. It has unquestionably more advanced scientific.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a holistic view of life, body, mind and nature, and its technical system of prevention, treatment and rehabilitation, comes from the mother body of Chinese culture with the same world outlook, methodology and values. As a “medical practical learning” (madical ShiXue) that born and integrated in Chinese culture, it is not only the treasure of ancient Chinese science, but also the key to open the treasure house of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important content of soft power of Chinese culture. Therefore, we should follow the essence and law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adapt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and the health needs of the people of China and even the world, promote the correct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make it benefit all mankind, and constantly strengthen the soft power of Chinese culture.

Keywords: Chinese Medicine Culture; Chinese Culture; Complex System Thinking; Upright Innovation; Cultural Soft Power

先秦儒家乐教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吴 宁 李文卓^{**}

【摘 要】在如今政治、经济取得飞速发展的背景下，提高国家自身文化软实力的任务尤为凸显。探讨先秦儒家乐教，能够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先秦儒家乐教旨在通过音乐对人们进行性灵、道德上的教化，对于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以及夯实社会主义文化的基础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先秦儒家；乐教；文化

先秦儒家把“乐教”看作维护当时社会等级秩序、促进个体差异性发展、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重要方式。“乐教”不仅是净化心灵的艺术教育，更是人格培养和道德教育。先秦儒家认为内容与形式都符合和谐精神的“德音”，在实现“天人合一”的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推进文化建设离不开传统文化的根基，学习和发扬先秦儒家乐教思想中引导人们向上的积极因素，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 乐教及其在先秦儒家的地位

参透乐教在先秦儒家的地位，首先考察典籍记载的乐教。

（一）典籍里的乐教

中国自古就将道德看作为正统，而颂扬道德的雅乐自然而然地成为人们从内心情感来进行道德教育的重要工具，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早在尧舜禹时期就以

^{*} 本文系2017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研究”（项目编号：17JZD001）、2017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美国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项目编号：17FZX030）的阶段性成果。

^{**} 吴宁，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李文卓，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国外马克思主义。

“乐”教人，这是比先秦儒家更早的乐教。乐教在诸多典籍中都有所涉及。远古时期，物质资料相对匮乏，人们只能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来获取知识，言传身教就成了当时教育的一种实践方式。舜要求夔以“乐”来教育孩子，以“乐”为教，与“礼教”“诗教”相通。天子将“乐”作为礼物赏给有德行的诸侯。“五音不全”的五音，即宫、商、角、徵、羽。每一音都有其各自所对应的：君、臣、民、事、物。音乐以感人心、动人情的方式教化人们，能够实现身体与心灵的契合与快乐，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周文王时期教育的中心便是礼乐。社会政治的实施是在礼乐规范的熏陶下自然而和谐地进行，音乐与人的身心相对应、自觉地维护社会政治秩序。乐教是中华文化史上独树一帜的存在。乐虽无书，但在诸多典籍中都有记载。乐教强调音乐要与善连接，重视音乐对调和人和社会关系的作用以及懂得节制的教育作用。远古时期乐舞的本原含义就是对宗教神秘的狂热追求，“乐”与“仪式”在远古祭祀典礼中是相通的，并与伦理道德相联系。^①“乐”最开始就以舞蹈、曲调以及歌唱的形式统一于原始祖先的祭祀典礼中，演绎了“礼”又融于“礼”。“礼”与“乐”始终交融，即使是春秋战国“礼崩乐坏”的时期，无论是典礼、祭祀还是设宴，礼仪和乐舞仍保持着紧密的关系。^②乐教是礼教的补充，礼乐在仪典中互相配合，在人们生活的各种重要场合中都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乐教在远古人类的祭祀活动中产生，尔后与政治、宗教、教育、艺术相互渗透、相互交融而成集以上各方面于一体的礼乐制度。在氏族政治瓦解的东周时期，儒家思想应运而生。^③儒家赋予乐教以新的精神文化价值，使之成为达到完美社会与完美人格的政治主张和个人修养。

（二）乐教在先秦儒家的地位

先秦儒家非常重视乐，希望通过音乐达到教化百姓、为政治服务、以“乐”安人心、移风易俗的目的。孔子注重音乐对百姓精神和情感上的教化功能，主张用礼来治理百姓、用乐来改变风俗，明确了礼和乐的区别，把内心激情寄托在对乐的感受上，体现出对乐感悟的独到之处。孔子曾经大力正乐、教乐、论乐，以修身养性，以乐治国的理想，对后世有着深厚的影响。自孔子之后，孟子、荀子发挥音乐对人类性情之感化、社会风俗之改善的功能。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孟子很重视仁义道德与“乐”之间的关系，“动容周旋中礼者”（《孟子·尽心下》），
“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表达的是对不羁人格的追求。“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孟子·万章下》）。孟子非常重视“金声”对人的

① 何炳棣：《原礼》，载《释中国》第4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第2384页。

② 杨华：《先秦礼乐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第222~226页。

③ 陈来：《周文化与儒家思想的根源》，《现代哲学》2019年第3期。

教化作用,将“乐”作为培养人性灵与道德规范的工具。荀子阐述了“雅颂之声”就是在道德基础上形成的,是颂扬功德、进行道德教育的音乐,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荀子阐明了“乐”和王的统治之间是相通的,“故人不能无乐”(《荀子·乐论》),把礼乐看作培养人们心智的工具,又通过教化的方式将其制度化,认为“乐舞”既能使人容貌端正、身体健康,又能够培养人的情操、增强纪律性,凡是受过乐教的人都有着宽阔胸襟、严格纪律、强魄体格的高素质。荀子在《乐论》《富国》中进一步丰富了儒家乐教。《礼记·乐记》论证了音、声、乐三者的区别,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乐教和现实意义。先秦儒家认为,通过“乐教”使人们拥有更高的道德情操和人格素养,人的道德情感以及人格素养的形成都离不开乐教。先秦儒家已将乐教的作用强调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乐记》以乾坤天地之第一道作为儒家礼乐之第一道,表达出了对乐教的极度认同。先秦儒家既主张以礼约束乐、节制乐,又强调以乐辅佐礼。先秦儒家将乐教当作道德教育的最高境界,因此乐教在先秦儒家思想中有着很高的地位。

二 先秦儒家乐教的演进和主要特点

先秦儒家乐教是指以音乐达致和谐的人格教育,梳理先秦儒家乐教的演进,才能把握先秦儒家乐教的主要特点。

(一) 先秦儒家乐教的演进

先秦儒家乐教主要经过了三个历程。第一,作为连接天与人的通路,儒家首重之乐——祭祀乐,起到了“上通下达”的效果,在原始宗教祭祀典礼中的地位尤为突出,将宗教思想、神话信仰等人们内心深处的敬畏感衔接起来,^①反映出人的各种状态与情绪,最后再以音律的形式表达出来。乐的出现表示人们已经有了表达内心情感的需要以及可以驾驭这种表达的能力,同时也说明了人们已经在精神上产生了想与“神”相互连接的愿望,尤其表现在氏族宗子上。^②第二,乐的存在方式——礼乐一体。一方面,“礼”包含“乐”,舞者对舞蹈的表演和音乐人对曲子的演奏这类表达方式是组成礼仪的重要部分。另一方面,“乐”作为“礼”的辅助工具,以音律和节奏节拍的方式抒发个人的感情,从而为礼的推进渲染气氛、营造声势,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从礼乐的理论意义和现实功能上来看,两者是完全平等的关系,礼乐通过各自不同的方式为人们制定正确的行为准则,并且在这个基础上逐渐达到了儒家所期盼的规范。“乐”与“礼”彼此协作、内外共举,从表达人的感情、塑造人的性灵的作用上看,礼乐是一个整体。在远古祭祀典礼这种神圣庄严的气氛中,

①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1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第176页。

②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7,第79页。

以“礼”规范人们行为的同时,以“乐”感化人们的心灵,通过人们心灵的感知再将“礼”转化为“乐”,从内在表现出来,扣人心弦。“乐”是“礼”的外在表现,通过韵律节拍的方式表达情感。宏观上,“乐”即“礼”;“乐”就是“礼”。第三,雅乐——“乐”的衍生。随着时间的推移,“礼”的政治教育功能被逐渐放大,原本有着浓厚宗教色彩和意义的“礼”逐渐被弱化为其自身内涵的一个隐性分支。人们对“乐”的看法也发生了些许变化,变得更注重其社会功能和娱乐价值。先秦儒家深刻地认识到,要想以“乐”来达到教化行为的作用便不能抛弃“乐”的宗教性,^①也不能将“礼”或“乐”中的任一个单独抽离出来,只强调乐“上通下达”连接人神的神秘力量,而忽视了其对社会伦理的规范作用。他们把礼乐结合起来并将祭祀礼与祭祀乐“合二为一”,于是“雅乐”出现了。雅乐虽然是从祭祀乐演化而来的,将祭祀作为一种道德实践的重要方式。^②但更符合时代需要与时代精神,根据时代要求的变化而变化,并与道德教育、社会规范之间有了更为密切的联系,先秦儒家乐教以“雅乐”施以教化,引导人们积极向上;是对雅乐内涵的理解和升华,主张只要有教化与礼仪就会有雅乐,“雅乐”不仅是隆重活动的象征,更具有教化功能和社会意义。“雅乐”出现之后,“乐”除了仍作为连接人神的工具之外,又与对人的道德教育、情感教化、社会伦理等密切相连,被赋予了调解人与人关系的作用,“乐教”就是在这一作用的激发下产生的。

(二) 先秦儒家乐教的主要特点

“乐”是发自内心的,反映了人们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情感体验。“乐”既然能够反映出人的感情,它也就能激发起人的感情,听到什么样的“乐”,也就能激发出什么样的感情。不同的声音互相应和,发生着不同的变化,各种不同的变化交汇起来,编织出新的音种,最后再通过乐器演奏或人声演唱,将人们不同的内心情感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这便是“乐”。

1. 先秦儒家乐教是智力教育

先秦儒家乐教是一种智力教育,能促进记忆力、注意力等。智育注重主动地去寻求真理、研究学问的过程,注重通过亲身实践引导人们更加全面地掌握知识和技能。孔子看重音乐对智力教育的作用,认为礼乐是提升人的智力的一种基本途径和方法,提倡以六艺来教育弟子,而“礼”、“乐”为六艺之首。智力是在面对生活中出现的新事物或新问题在心理上的一种适应力。音乐可以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进行教育和表达,从而改造人的心智,锻造和改变人的内心世界及其对外在世界的观点与看法。音乐既然以表现人的内心世界为根本特征、具有充分的主体性,那么就要将人作为主体,充分表现出人的真情实感而真正成为马克思所说的“自由的精神

^① 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第1~2页。

^② 徐复观:《中国人性史论·先秦篇》,上海三联书店,2001,第26页。

生产”。乐以人为目的，是人的心声，理应高扬人道主义精神而不屈从于异己的力量，否则，就会束缚感情、压抑心声。先秦儒家乐教所提倡的“乐”是个体充分尊重个性，在自由表现个性的基础上发展人的智力，使个体心声既具有无限丰富的个性，又与他人息息相关。音乐上的自由变革、形式上的不断创新都要诉诸人的内心世界、情感生活，都应以人为本，而不是为创新而创新，是将“人”视为对象，重视人的感受，尤其重视矫正和改变人的内心世界。音乐具有一定的抽象性，抽象性能使音乐比其他方式更能引起心灵共鸣，在一定程度上超越空间的时间、阶级和民族的界限，成为全民族、全人类的共同语言。音乐能够使智力得到提高，来达到智育的真正目的。

2. 先秦儒家乐教是道德教育

先秦儒家乐教的主旨在于“乐”对人的教化作用，旨在通过对人们心灵的教化，达到丰富人的情感、指引人们积极向上的目的，起到培养个人道德、融洽人际关系、提高审美教育等作用。^① 孔子指出人不仅要聪明、果敢而且必须“文之以礼乐”（《论语·宪问》），认为音乐对个人的作用不是外表的纹饰，而是内心的教养，可以达到修养身心、净化心灵、端正品性的效果。音乐不同于其他声音，音乐的音律起伏牵动着人的情绪波动。一个人可能在文章创作中有虚构幻想的情节，也可能在歌唱时去领悟和表现原创作者的情绪与感受，但对音乐产生的内心情感是真实的、不掺假的。音乐骗不了任何人，是个人感悟与品行修养的外在表现，每一位原创作者都用优美动听的旋律来记录下自己的切身体会。作者能够通过自己的音乐表达感情，而听者也能够通过音乐与作者产生心灵上的共鸣。《语丛一》强调礼乐把“德”作为其最高主旨，全面而深刻地阐述了礼乐与道德之间的关系。“德生礼、礼生乐”“仁义，礼之所由生也”“圣知，礼乐之所由生也”（楚简《语丛一》）。礼乐是道德的内涵，道德是礼乐的表现。音乐可以升华个人品德，好的音乐教育也是一种德性教育，礼乐和道德二者是相通的。先秦儒家乐教是统治者想要达成“以德治国”的重要工具，“夔始制乐，以赏诸侯”（《礼记·乐记》），天子将美妙的音乐作为一种赏赐给有德性的诸侯，得到赏赐的诸侯会以更高要求的德性去完善自己，未得到赏赐的也会效仿他人、以德性去激励自己。

从个人的层次来看，音乐可以给人带来快乐和满足，^② 能够提升生活幸福感、平静感，能够磨练品行、塑造更完美的品格。孟子继承并发扬孔子的乐教观念，尤为重视音乐对道德的正面作用，认为个人在提升修养与境界的过程中必须经历并完成“乐”。“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孟子·万章下》）这里的“金声”泛指钟类的打击乐器，“玉振”泛指磬类的打击乐

① 祁海文：《儒家乐教论》，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第146页。

② 郭沫若：《公孙尼子与其音乐理论》，载《〈乐记〉论辩》，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第12页。

器。他认为,孔子对于仁义道德修养的提高就像是“金声玉振”始终遵循条理,“仁声”就是真、善、美统一的德音,只有把“真”和“善”两者结合成圆满的状态,才能称为“美”;“始”代表着下功夫去学,“终”则代表着道德教育的达成。从社会 and 国家的层次来看,兴于诗立于礼、崇尚仁义的“乐”也可以教化社会、移风易俗、实现天下大同,可以反映民情、考察得失、斟酌损益、改善治理,从而使社会关系和睦、民心归附。

3. 先秦儒家乐教是性灵教育

先秦儒家乐教的核心思想是“乐”对人的性灵教化作用。《乐记》中特别注重乐教,^①而荀子对《乐记》的理解则有更加深入的整合:第一,音乐能够促进人们积极向上,通过优美旋律表达出其中包含的情感,能让人从中感受到喜怒哀乐,这对人们的精神情感有着很好的宣泄和表达作用。第二,“乐”能够“感化”人。《论语·卫灵公》的“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禁绝郑声,便可疏远奸淫狡诈的人,乐观积极的音乐可以鼓舞心灵、促进人民积极向上。“郑声”则会使人民萎靡不振、意志沉沦。在选择音乐时,首先要全面地判断音乐表达的主题,谨慎地使用音乐。第三,音乐可以抚慰人们的心灵。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内心与现实之间的差异使人想得到精神的慰藉。音乐能使老百姓发生共鸣,是心灵的慰藉。乐有“雅乐”和“俗乐”之分,对性灵有好坏之分、正邪之别,要培养辨别“雅俗音乐”的能力。淫邪之音不仅无法正确地引导人们朝积极方向发展,而且使人趋恶。这种音乐对社会风气的影响就像毒蛇一样,是社会“长出”的毒瘤。相反,“雅乐”则能使人心和气、人与人相互敬重、移风易俗、谐和服从。各种不同形式的“靡靡之音”不能深入人心、抵达心灵,违背了儒家乐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人民理应是社会的主人,人民的音乐理应成为主流。然而,出于种种原因,“放郑声”的思想还在影响着一部分人,对人民音乐横加指责、进行压制的行为还时有发生。和历史上的“郑声”一样,今天人民群众的音乐创作、表演也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不健康因素,对此不能放任而应加以引导。但如果颠倒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不是把人民当作主人,让人民群众根据实践的检验去鉴别良莠、进行取舍,而是由少数人“为民做主”来决定提倡什么、禁止什么,显然是不妥的。如果以革新为邪僻、视健康为淫靡、将支流当主流、把人民的音乐看作“靡靡之乐”“亡国之音”,就更是错误的了。我们应该充分吸取“雅颂之声”的精华和乐教的内涵,创作出更高品质的音乐以“净化”心灵。

三 先秦儒家乐教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意义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应当积极学习并借鉴先秦儒家乐教,丰富道德教育的教学形

^① 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资料注释》上,人民音乐出版社,1986,第222页。

式和教学内容,用“乐”来修正社会道德教育的旧观念、树立道德新标准,增强社会道德教育的实效性。

(一) 有助于彰显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先秦儒家乐教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思想的发展上起过重大作用。不仅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深厚来源,而且是彰显中华文明独特的精神魅力。我们要加强对先秦儒家乐教的宣传,让优秀文化以一种更加新颖的方式融入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来,进而影响整个社会、国家。“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① 只有帮助人民真正地理解中国文化,才能让人们树立起文化自信。文化自信必须充分地调动人们主动追求先进文化的积极性、热爱文化,必须继承和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来实现。优秀传统文化是指从前推崇的、民族特色的、但在今天仍能够对人产生积极作用、经得起时代考验的文化。“先秦儒家乐教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表,是文化自信的重要基石。”^② 我们在弘扬先秦儒家乐教的过程中,要选择那些人民喜闻乐见的并能够运用到实际生活中的内容并加以发展,与各种媒体平台、宣传机构组成强有力的文化组织发挥其作用。先秦儒家乐教是一种文化交流与音乐碰撞,对于不同的人会起到不同的作用。每个人、每个组织都可以通过这些平台机构举办主题音乐节、音乐分享会等各种各样的交流活动,这样的活动可以让人民更多地参与进来,在富有趣味的活动中更好地理解乐教,使人与人的交往变得更加平和,淡化彼此之间的误会和矛盾。乐教的根本目的是表现与陶冶人的情性,乐教使人相互关爱、结成最完美的关系,以完善人格。这是孔子最高远的音乐哲学,不是一般只追求音乐技巧的人所能领会的。新时代要提炼出乐教顺应时代潮流的内容,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发展,可以通过歌唱、演奏等方式,让音乐更有“温度”,传播社会的正能量,走进人的生活 and 心中。音乐深刻地反映了社会,凡是音乐都是产生于人心的。音乐完成于外部,又能反过来感化人的内心。听一个国家的音乐,就能了解该国的风俗;考察一个国家的风俗,就能了解该国的志趣;分析一个国家的志趣,就能理解该国的道德。先秦儒家乐教以其强大的和谐力,形象直观地展示中华文化与中国形象;先秦儒家乐教中的典章制度、礼乐德治以及“和而不同”等观念可以为政治文明建设提供借鉴,其中蕴含的情感体验与道德伦理显示了中国人的精神追求以及以礼待人的处世之道,能够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资源;先秦儒家乐教体现了我们民族的精神,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先秦儒家乐教体现的以审美达到人格最高境界的思路及注重教育中感性作用的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出版社,2017,第40~41页。

② 郭步山:《孟子思想与当代中国文化自信》,《新华日报》2017年9月13日,第15版。

理念在今天仍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宝贵财富。音乐变再现为表现、变模拟为抒情,是浪漫的艺术,尤其要求挣脱外在的束缚、驰骋想象与联想,要求形式生动丰富、内容健康和真实,以真、善、美结合的作品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在今天,音乐应该自由地抒发人民内心的声音、表达人民的喜怒哀乐。音乐的实践表明,强烈地表达健康感情的音乐作品不仅能打动人,而且能潜移默化地影响人、教育人,简单地进行道德说教的音乐作品不仅不能打动人而且不能教育人;感情强烈的音乐作品往往不胫而走、深入人心,简单进行道德说教的音乐作品必定脱离人民、没有生命力。今天,我们应该充分注意音乐的特征,创作出能够强烈表达人民喜怒哀乐的音乐作品,使音乐真正唱出人民的心声,鼓舞人民为争取自己的幸福而奋斗。音乐为自由抒发人民之情,就要在艺术技巧、手法上不断创新;就应经过时间的考验,由人民群众去鉴别,而不能由少数人设定条条框框。否则,就不会有音乐艺术的发展与提高。对于外来的音乐文化,既不能全盘接受又不能一概排斥。我们可以将先秦儒家乐教融入图书馆、博物馆、科学文化艺术、媒体、网络电视等文化事业中,把人民群众的积极健康、多彩多姿、生动活泼的日常生活与乐教相结合,重点突出乐教对人的道德以及社会教化作用。世界各国正处于时代大变局中,代表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音乐不能落后,我们应该给音乐事业“松松绑”,借鉴先秦儒家乐教,大胆改革、勇敢创新。

(二) 有助于促进社会和谐

音乐是社会的产物,必然要产生社会功能。中国传统礼乐文明是涵摄个人、社会关系、家国、天地宇宙的文明秩序体系,贯彻了个人从生到死的生命历程,是个人在世的情感抒发形式;伴随着待人接物的方方面面,是人际关系的道德伦理规范;构筑了家国秩序,是人对家国的感情认同与政治认同方式。礼乐文明具有超越的人文精神,宋代程颐认为,“礼”只是一个序,“乐”只是一个和。“和”是乐教的宗旨,是儒家思想的关键内容、是包含个人与社会两个方面的“和”。从个人层面来讲,将“乐”与“礼”相关联起来,并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人的情感。《礼记·乐记》中描述:“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啍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动。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会因为各种原因引起喜、怒、哀、乐等情绪变化,而并不是所谓人心具有先天感情的说法。^① 君王意识到“乐”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调节人们产生的各种情绪,提倡让百姓感受不同的“乐”,以达到净化心灵、调节情绪、得到中和的目的。《雅》《颂》是

^① 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资料注译》上,人民音乐出版社,1986,第225页。

先秦儒家乐教的典型代表,感悟《雅》《颂》之论,可以使百姓心胸宽阔、谈吐不凡。“听其《雅》《颂》之声,志意得广焉;执其干戚,习其俯仰诘伸,容貌得庄焉;行其缀兆,要其节奏,行列得正焉,进退得齐焉。故乐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纪,人情之所不能免也。”(《礼记·乐记》)这便是所谓的人之“和”。从社会层面来看,“乐者,通伦理者也”,说明“乐”可以调节国家与宗族之间的关系。“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术形焉。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礼义。合生气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阳而不散,阴而不密,刚气不怒,柔气不慑。四畅交于中而发作于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夺也。然后立之学等,广其节奏,省其文采,以绳德厚。律小大之称,比终始之序,以象事行,使亲疏、贵贱、长幼、男女之理,皆形见于乐。”(《礼记·乐记》)但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场合中,“乐”带给人“和”的感受却是不同的,也说明君王是以协调国家、宗族作为基本宗旨来制定的“乐”,“是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故乐者,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节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是先王立乐之方也”(《礼记·乐记》)礼乐的文化内涵极其简洁、表征秩序与和谐,但贯穿于中国人从个体修身到家国天下的诸多层次和环节。音乐和谐而又平和,体现和谐而又有平和的自然之道,这就是音乐传达的“意”。所谓“意”,指自然无为之道。也就是让音乐达到恬淡平和的自然境界。儒家乐教强调将“乐”作为连接“天”的工具,宇宙自然是大天地,人是小天地,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所以做事要顺应自然,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中国传统文明对礼乐的崇尚是最具代表性的,也最能凸显中华民族文化特质的文明取向。追求秩序与和谐是乐教的基本要求,也是中国人调和心性、培养良俗社会、建立国家政治体制、协调自然关系的基本原则。先秦儒家乐教,既是培养文艺能力,也是调和感情与伦理的性灵教育,不但将诗、乐、舞融为一体,创造了一种新的娱乐形式,而且还能使人在情感上获得满足。和谐社会注重一个“和”字,李泽厚对“和”有着独特的见解,认为“乐”的作用不同于“礼”所强调的规范性,它更注重“和”、注重内心的感化以及情感上的交流,在感化内心的过程中陶冶情操、在情感交流的过程中塑造人格。“和”还体现在乐器演奏上,以秦腔表演为例,二胡、板胡在其中担任着重要的角色,二胡讲究的是运弓的平稳以及音色变化的掌握。演奏者的力度大小对音准有着很大的影响、运弓的快慢程度表现的是曲子所表达的心情或高亢或低沉、拨弦讲究的是一种“轻拢慢捻挑”的技艺功底。只有掌握了力度、运弓、拨弦三者之间合作的“和”,才能较好地表达出一首曲子或一场表演想要表达的东西,稍有差池便会有所偏颇。事实上,乐曲表达的“和”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一种强调合作与适度的“和”,也是理性与感性、人与自然相统一的“和”。乐曲的演奏都要将不同寓于统一之中,偌大的社会更需要包容各种不同甚至对立冲突,才是和谐社会的真正所旨。文艺的基本功能是审美,作为人类的精神产

品,文艺还具有认知、教育、娱乐等多层面的社会功能。文艺具有时代性与社会性。好的作品总能反映出时代的特征,而经典的作品之所以有永恒的魅力,是因为它们将时代性与社会性上升到艺术的层面进行精神的开拓,创造出人类文明的新财富。荀子将礼乐视为能够教化人的工具,并在这个基础上将礼乐视为制度的一个体系。先秦儒家注重把“乐”当作一种礼节的增加,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了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而不是一项简单的艺术能力的培育和熏陶。

(三) 有助于培养时代新人

人的全面发展就是注重在德、智、体、美、劳等各个方面的均衡。学校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中心阵地,其中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帮助学生提升道德素质、坚定信仰以及全面发展的重要渠道。^①然而,目前学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仍有许多问题需要深思,教学过程相对固定、教学质量也不高,导致学生在听课的过程中产生视觉、听觉、审美的疲劳,很少主动地进行独立思考,缺乏实践创新能力。在进入新时代、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今天,先秦儒家乐教融会贯通智育与德育,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寓教于乐具有借鉴意义,可以让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乐教的形式展现出来,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融入儒家礼乐文化、红色革命音乐、传统器乐文化等音乐元素。学生在轻松的音乐氛围中发现未知,这样既能够激发学生主动性又能体现先秦儒家乐教的当代价值。音乐对人的道德教化就像仁、义、礼、智扎根于人们的心中,不必刻意等待便已深入骨髓,是“仁声之入人深也”的教化。

先秦儒家乐教对人进行性灵、德育、智育等方面的教化,有望培养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与接班人。时代新人应继承中华文化多年沉淀下来的思想理念以及道德规范,用乐教升华人格素养。^②《尚书》记载的人格素养:“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尚书·舜典》)这是指为人应当温和敦厚、宽阔而谨慎、既刚正不阿又不盛气凌人。孔子认为礼乐能够塑造人格,只有经过礼乐熏陶的人,方能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人不仅要在技能、智谋、德行上有所发展,还要接受礼乐的教育。礼乐并非某种技能或智慧,如果一个人有擅长的技术、道德和思维但缺失了礼乐,那么所有这些都不完美,没有礼乐教化的人生是不完整的;没有礼乐的社会,是不长久的。荀子指出“乐教”在塑造人格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认为不同类型、不同主旨的音乐与人的品格是相互对应的,每一种性质的音乐与每个人不同的性格类型存在一定的联系。在荀子看来,人没有任何先验道德,只有先天禀赋的自然本性,这种自然本性如果任其放纵,便会成为弃善之恶,通过礼乐的控制、引导、陶冶、教化,才能培育出忠信、辞让等善的品性。“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荀子·劝学》)先秦儒家乐教旨在将人的内心情感作为出发点,循循

① 张小雨:《“新时代”德育工作与儒家乐教的结合》,《文山学院学报》2020年第4期。

② 金妍妍:《先秦儒家乐教对于高校德育的启示》,《德育研究》2020年第9期。

善诱指引人们走向上和向善之路，这个过程中并没有繁杂的教导和牵强的灌输，却潜移默化地、未经察觉地提升自己的人格，最终达到审美与道德的最高境界。“国有国体，人有人格”，每个人的人格组合起来就代表着整个社会乃至整个国家的格局。先秦儒家乐教中的人格教育对塑造时代新人的人格素养仍然有着不可小觑的能量。我国应当以严格的标准去要求和塑造时代新人，在教育改革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要重视先秦儒家乐教的理论研究和学习，培养乐教的师资。

Pre-Qin Confucian Music Educ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Culture in China

WU Ning, LI Wenzhuo

Abstract: In today's context of rapid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task of improving the country's own cultural soft power is particularly prominent. Analyzing the connotation of Confucian music education, we hope to inspire the promotion of China's socialist cultural construction. The purpose of Confucian music in pre-Qin Dynasty is to educate people's spirit and morality through music.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nhance the soft power of Chinese culture, carry forward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consolidate the foundation of socialist cultural construction.

Keywords: Pre-Qin Confucian; Music Education; Cultural Construction

以中医人学优秀资源拓展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文化内涵探析^{*}

岑孝清 黄 刚^{**}

【摘 要】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离不开文化建设。目前，以人为本已经成为这一共同体文化价值的核心。以人为本的人，含义是丰富的，但人体生命是不可或缺的。中医人学思想以生命辩证法独步于世界医学哲学，所包含的天人合一、贵人精诚、养生防治等基本内容，是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文化建设的优秀资源。发掘中医优秀思想文化资源，不断拓展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内涵，有利于巩固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的民心相通文化工程。

【关键词】中医人学；中医生命辩证法思想；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民心相通

2013 年 10 月 3 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尼国会的演讲中提出了“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重要倡议。中医药作为中华文明的杰出代表，蕴含着深刻、丰富的人学思想。发掘中医人学优秀思想资源，拓展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内涵，不断巩固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的“民心相通”文化建设工程，这在新冠肺炎疫情世界大流行发生后，尤其有意义。

一 中医生命辩证法思想及其科学性

在思想史上，中医基于人体实践和自身的认知逻辑，不但揭示了人的生命如何产生、变化和防治的规律，而且对处于自然和社会两大环境中的人有着系统的认识，这就是中医生命辩证法思想。传统中医生命辩证法思想的内容极为深刻，其科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带一路’中国—东盟传统医药文献资源战略保障体系研究”（项目编号：18XTQ002）；广西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下中医人学学科创建研究”（项目编号：2019BS001）。

** 岑孝清，哲学博士，广西中医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黄刚，硕士，广西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学内容是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文化建设的宝贵资源,但需要深入挖掘和研究。

(一) 中医人学思想以人的生命健康为中心

中医思想体系,自《黄帝内经》问世起至今,已有2000多年。它系统揭示了人的生命起源、本质和规律,建立了直接为临床服务的辨证论治方法体系,表现出鲜明的“以生命健康为中心”的思想特征。这一特征是由中医哲学的基本问题决定的。

关于中医哲学的基本问题,时下学者们有多种看法,诸如阴阳关系问题、形神关系问题、天人关系问题等,其中,天人关系问题是在《黄帝内经》首卷首篇中提出的。在《素问·上古天真论》里,黄帝问道:“今时之人,年半百而动作皆衰者,时世异耶?人将失之耶?”^①这是说,人的衰老,是受时代与环境的因素影响呢,还是由于人们没有注意养生方法造成的呢?这个问题虽然朴素直接,但实质问题却是在问:人的生命变化的内在根据,是社会和自然界的外在因素呢,还是人的生命活动内在因素?因此,这个发问所反映的是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而这正是哲学的基本问题,正如中国人学学会前会长陈志尚教授所说,哲学的基本问题是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②《黄帝内经》开卷的这个命题决定了中医哲学思想发展的人学路向。

对于这个问题,《素问·上古天真论》的回答是:“能年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③也就是说,人们能够度过百岁而动作不显得衰老,是因为他们全面掌握并运用了养生之道。这就是认为,人的生命变化,其根据是内在的,为人的生命发展规律所决定,遵循此规律就能健康长寿,违背就会生病短寿。《黄帝内经》关于生命变化的内因论和人本性还有诸多表现,例如《素问·上古天真论》中问道:“人所老而无子者,材力尽邪?将天数然也?”回答是:“天癸竭。”^④天癸,指人体先天肾之精水,因此还是内因论。生命活动的这种内在根据,还通过“根于中者,命曰神机,神去则机息”^⑤的命题表达出来。“中”即人体内在系统,“神机”即系统的功能。可见,中医哲学思想是以解决人的生命健康问题为宗旨的,无论是在具有首创思想体系之功的《黄帝内经》里,还是在其之后的整个中医思想史上,都是这样的。可以说,在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上,中医哲学思想确实是以人的生命健康为中心的。因此,当代著名的国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说,“中医是以人为本的医学”。^⑥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中医人学也由此而提出。^⑦

① 郭霭春:《黄帝内经素问校注语译》,贵州教育出版社,2010,第1页。

② 陈志尚:《哲学新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第28页。

③ 郭霭春:《黄帝内经素问校注语译》,贵州教育出版社,2010,第3页。

④ 郭霭春:《黄帝内经素问校注语译》,贵州教育出版社,2010,第3~4页。

⑤ 郭霭春:《黄帝内经素问校注语译》,贵州教育出版社,2010,第425页。

⑥ 邓中光主编《邓铁涛新医话》,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4,第31页。

⑦ 岑孝清、韦兆钧、裴彧:《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中医人学学科化建设探析》,载程恩富、吴文新主编《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2020年第1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第135~150页。

总之, 尽管中医药的思想体系是有世界观内容的, 却是以人的生命为中心建构起来的。如果说, 在西方哲学思想史上, 物质与意识、存在与精神的哲学基本问题一经产生, 便侧重于意识和精神的路向发展, 直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出现后才有改观的话; 那么, 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上, 《内经》里人与世界的关系基本问题一经产生, 便走上了人学发展的道路, 奠定了中医呵护、维护和保护人的生命健康的理论基础。

(二) 中医生命辩证法思想

人是自然界的产物, 人与自然相互关联和作用, 人体自身各组织或系统也都是相互联系的整体, 人因其与自然的相互作用, 以及生命的自组织功能态而保持生机活力。这就是中医生命辩证法思想。正是这一思想, 使得数千年来中医真正地有效地呵护、维护和保护着中华民族的生命健康。

第一, 气本论。气是一切存在的本原, 气化是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这一观点, 在《内经·素问》的许多卷篇中都有议论和揭示。如《素问·天元纪大论》中说道: “太虚廖廓, 肇基化元, 万物资始, 五运终天, 布气真灵, 摠统坤元, 九星悬朗, 七曜周旋, 曰阴曰阳, 曰柔曰刚, 幽显既位, 寒暑弛张, 生生化化, 品物咸章。”^① 此后, 还有《难经》的“原气”说, 明代温补学派创始人张景岳的“气即万物”说, 等等。清代, 本气论更得到广泛传扬, 如喻嘉言的“大气论”、徐大椿的“元气存亡论”、唐容川的“水火气血论”。可见, 气本论揭示了人的生命及其活动的客观实在性。

第二, 阴阳对立统一论。气是运动变化的, 阴阳对立统一是运动变化的根源, 表现出“五行生克制化”的整体联系性。《素问·天元纪大论》说: “故物生谓之化, 物极谓之变, 阴阳不测谓之神, 神用无方谓之圣。”所谓“神”, 即“在天为气, 在地成形, 形气相感, 而化生万物矣。”对此, 明代的张介宾在其所撰的《类经·撮生类》中注解: “夫生化之道, 以气为本, 天地万物莫不由之。故气在天地之外, 则包罗天地; 气在天地之内, 则运行天地; 日月星辰得之明, 雷雨风云得之以施, 四时万物得之以生长收藏, 何非之所为?”^② 可见, “神”讲的是运动变化, 而且运动变化的本体是气。气的运动变化性, 在《素问》中是明显的, 多处有体现, 如《阴阳应象大论》《六元正纪大论》《气交变大论》《至真要大论》等。其中,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指出: “天地之动静, 神明为之纲纪, 故能以生长收藏, 终而复始。”^③ 这就是说, 自然界的一切运动和静止, 都是由阴阳之间神妙的相互作用所致, 在自然界, 这表现出生息不止、循环往复的春生、夏长、秋收和

① 郭霭春:《黄帝内经素问校注语译》, 贵州教育出版社, 2010, 第371~372页。

② 郭霭春:《黄帝内经素问校注语译》, 贵州教育出版社, 2010, 第370~371页。

③ 郭霭春:《黄帝内经素问校注语译》, 贵州教育出版社, 2010, 第38页。

冬藏规律。要之,万事万物变化虽是复杂的,但“其要一也”。《素问·阴阳离合论》说:“阴阳者,数之可十,离之可百,散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然其要一也。”郭霭春先生注释“其要一也”为:“它的根本规律只是阴阳对立的统一这一点。”^①著名中医思想家任应秋先生也说:“祖国医学里‘阴阳’这个名词,都可以用‘矛盾’的含义来理解。”^②总之,阴阳对立统一是人、自然及其一切存在之所以普遍联系的根据。

第三,气化人生论。人是自然的产物,是客观实在的生命活动体。首先,生命的本质是气,生命源于精气,如《素问·宝命全形论》说:“人以天地之气生。”^③又如《灵枢·决气》说:“人有精、气、津、液、血、脉,余意以为一气耳”,而“两神相搏,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谓精”。^④这是认为,精是人体生命得以产生的物质基础,是构成人体生命的基本元素。《灵枢·经脉》如实描述了胚胎的发生过程,“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脑髓生,骨为干,脉为营,筋为纲,肉为墙,皮肤坚而毛发长”。^⑤其次,人体生命的产生是自然造化的过程和结果,不是什么超人间力量的东西所致,也没有什么超自然的神秘之处。例如《灵枢·本神》说:“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⑥生命起源没有超出自然之处,人体生命的活态也是一种自然现象,是“先天之气”与“后天之气”相互作用的缘故。这里,气即精气;先天之精气源于父母精血,为阴;后天之精气源于五谷等外界物质和能量,为阳。《素问·生气通天论》还指出:“阴者,藏精而起亟也;阳者,卫外而为固也。”^⑦由此,人的生命保持着活态。

(三) 中医生命辩证法思想的科学性

科学是源于实践、反映客观对象实际的、可重复检验的知识体系。中医生命辩证法是数千年来指导中医有效维护中华民族生命健康的科学,无数人体生命活动、临床医治和健康维护的实践证明了其科学性。

第一,数千年来中医维护中华民族生息繁衍的事实。中医生命辩证法是中医学的核心思想,在历史上,它通过中医这一外在形式的实践活动,维护着中华民族的生命安全与卫生健康,为民族的繁衍生息保驾护航。中医思想家、教育家任应秋先生说:“我国属于多民族、多人口的国家,几千年来就是靠中医学维持其繁衍昌盛,这就客观地证明了中医学的现实意义。”^⑧英国皇家医学学会院士马伯英也指出:“中

① 郭霭春编著《黄帝内经·素问》,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2,第46页。

② 王永炎、鲁兆麟、任廷革主编《任应秋医学全集》卷十,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5,第2312页。

③ 郭霭春:《黄帝内经素问校注语译》,贵州教育出版社,2010,第153页。

④ 郭霭春编著《黄帝内经灵枢校注语译》,贵州教育出版社,2010,第253页。

⑤ 郭霭春编著《黄帝内经灵枢校注语译》,贵州教育出版社,2010,第102~103页。

⑥ 郭霭春编著《黄帝内经灵枢校注语译》,贵州教育出版社,2010,第81页。

⑦ 郭霭春:《黄帝内经素问校注语译》,贵州教育出版社,2010,第19页。

⑧ 王永炎、鲁兆麟、任廷革主编《任应秋医学全集》卷十,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5,第5439页。

国人民之所以能够生衍繁殖,日益兴盛,当然有许多原因,但卫生保健事业所起的作用必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这方面首先应归功于中医。”^①著名国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也揭示道:中国“几千年来,从未出现过像欧洲那样,一次疫症流行,死亡人数达一二千万者”^②。这无疑是中医的功劳。例如,1894年的鼠疫大流行,疫情非常严重,中医在当时是主要的医疗力量。^③又如,进入21世纪第3个10年之际,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医药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不断验证其拯救人之生命健康的本色和效用,诚如李红梅在《人民日报》上撰文所指出的那样,“全国中医药参与救治的确诊病例已经超过6万例,占比在85%以上。在药物和临床救治方面,中医药在阻断轻型患者向重型患者发展方面取得积极成效”。^④

第二,大量方剂仍然普遍有效地应用。中医是在辩证法的指导下开方用药的,因此,至今大量方剂的普遍有效应用,这是能说明中医生命辩证法的科学性的。在中医史上,如果说《内经》《难经》两大医典奠定了中医理法体系,但临床性还不够显著的话,那么《伤寒论》《金匮要略》就基本上都是临床经验的积淀了,而中医临床经验积淀是通过方剂的形式不断传承的。《伤寒论》记载的方剂有113首,《金匮要略》记载的方剂有262首。今天,专家们认为,这两部中医经典所载方剂,大多切合临床实际,许多都是行之有效的,是至今仍然普遍应用的。^⑤而代表着历史上方剂先进水平,对世界医学产生巨大影响的《千金方》,更能说明中医思想的实践效果了。这部经典汇集了唐代以前的医方,共有方剂6500余首,这部大典所载的很多验方成为现代医生常用的名方。

第三,总结临床经验的医案。医案是中医临床经验的总结,是中医保健和医疗有效性世代传承的案例,凝聚着中医生命辩证法的智慧。从司马迁《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记载的25例医案起,2000多年来,历代名医医案有280多种。对此,著名国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研究后总结道:“中医药学之发展,不是依靠实验室之实验研究,主要靠中医系统理论指导下,反复进行临床研究,而病案就是临床研究的资料或总结报告。”^⑥在笔者看来,医案这一经验的来源和总结,不是来自实验室,不是来自科技手段,而是来自长期的无数次的人体实验,是无数中医家长期思考或经验的结晶,是数千年来中医临床家们“望闻问切”的试验的结果,而且这样的试验与治疗是同时同步的,是一体的。尤其是,中医临床的对象不仅是病理状态的人,还是一般状态的人,这显示了中医“不治已病治未病”的独特优异性。

① 马伯英:《中国医学文化史》下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第621页。

② 邓中光主编《邓铁涛新医话》,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4,第250页。

③ 金小沫:《当代岭南医学流派与名家学术传承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广州中医药大学,2010,第7页。

④ 李红梅:《用好中医瑰宝》,《人民日报》2020年3月4日。

⑤ 张成博、程伟主编《中国医学史》,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6,第41页。

⑥ 邓中光主编《邓铁涛新医话》,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4,第37页。

历史已经表明,中医在临床实践中,不但形成了一套关于人的医疗卫生保健学说,还形成了关于人的人学思想体系。对此,无论是中医学界还是相关理论界,大多用生命哲学来指称。笔者以为,生命哲学名称过于宽泛了,中医生命辩证法的指称更为准确,更符合其原创性特征,更能显示其科学性特征。中医生命辩证法既是今天建构生命科学的优秀思想资源,也是今天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文化建设的宝贵资源。

二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人本思想与健康理念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离不开人,其发展的第一位是人的发展,因此以人为本已成为其社会文化共同体的核心价值。不仅如此,《中国—东盟卫生合作与发展南宁宣言》第4条还进一步说:“我们认识到,健康是发展的核心,是发展的先决条件和结果,还是衡量可持续发展的有效指标。”^①健康是人的健康,人的健康不但是人的发展基础,也同时是人的发展本身。可见,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是追求以人为本理念的共同体,是人们追求健康美好生活的一种社会文化共同体。因此,汲取中医人学优秀思想资源,丰富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建设是有世界性意义的。

(一) 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建设进程中的以人为本思想

至今,中国—东盟已经完成了命运共同体的社会经济发展框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即中国—东盟所寻求的利益共同体已经找到,这就是2015年全面建成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以及中国和东盟各国对2018年11月14日发表的《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2030年愿景》的施行。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经济发展决定文化发展,那么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建设历程如何呢?在完成《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蓝图2009~2015》(以下简称《蓝图2015》)各项指标的建设后,2015年底,东盟正式宣布“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成立,还明确了“社会文化共同体”为三大核心共同体之一;同时,在原来文件的基础上,东盟还通过了《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蓝图2025》(以下简称《蓝图2025》)。《蓝图2025》继续坚持了《蓝图2015》以人为本的思想,提出“以人为本、环境友好和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文化共同体就是要建设的目标”。^②

(二)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对健康理念的呼唤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建设,其内容可以来自国家间的主流意识形态、

① 《中国—东盟卫生合作与发展南宁宣言》,中国一带一路网, <https://www.yidaiyilu.gov.cn/zchj/sbwj/10397.htm>, 2019年9月29日。

② 王勤主编《东南亚地区发展报告(2016-2017)》,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第13~14页。

民间交往的多样文化、海洋文明底色或大陆文明底色、传统文明的延续或现代文明的赋予,甚至是宗教文化的人文精神。不过,从东盟各民族文化特性(尤其是宗教)和不同国家意识看,这些内容的建设并不乐观,许多学者也指出了这一点。例如,周士新指出:“东南亚各国的政治制度不仅没有强制影响到宗教,反而往往向宗教做出较多的妥协。在这种情况下,东盟要想形成一种统一的文化战略,实在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①然而,无论是棕色人还是黄种人,此国人和彼国人,这个民族或那个民族,都有最基本的生命健康问题,由此产生的关于人体生命活动思想或价值观,是最直接的,它常常是可以跨越国界甚至种族樊篱的。这一点,已经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中得到了反映。

201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国会所作的《携手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演讲,其中就提到了汶川地震时印尼向中国派出医疗队的事。习主席说道:“2008年5月12日,中国汶川发生特大地震,灾区人民急需救援。印尼第一时间向中国人民伸出了援手,派出医疗队赶赴灾区。印尼医疗队抵达灾区后,不顾灾后余震的危险,夜以继日工作,诊治了260名灾民,为844名居民和120名学生提供了义诊。”^②印尼的这些医务人员未必是中医,也未必是传统医学领域的医生,但这段话,却反映了生命健康至上及其优先的人本价值,这一点是各国元首和人民都重视的。例如,2020年2月20日,为应对新冠肺炎世界大流行,中国和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外长,在老挝万象举行中国—东盟关于新冠肺炎问题特别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其中就有“对因新冠肺炎感染病逝者表示深切哀悼,对患病和受疾病威胁民众致以诚挚慰问”的特别声明。^③

事实上,上述中国—东盟外长关于新冠肺炎问题特别会议的联合声明,一定意义上就是中国—东盟各国对构建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愿望。这也是“一带一路”之“民心相通”这一世界性文化建设工程发展的必然。因为,关于健康的理念,在2019年4月22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进展、贡献与展望》的国际文件中已经指出:“民心相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人文基础。享受和平、安宁、富足,过上更加美好生活,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梦想。”^④显然,无论是和平、安宁,还是美好生活的实现,都离不开人的健康及其发展,这就是“一带一路”所蕴含的健康理念。这一理念同时也是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基础,因为中国—东盟联合体主要就是属于“一带一路”的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上的国家或地区,中国—东盟(10+1)合作机

① 周士新:《东盟的文化战略与中国的政策选择》,《教学与研究》2016年第11期。

② 习近平主席在印尼国会发表重要演讲,新华网,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xjpynghyj/wz.htm>, 2019年10月5日。

③ 《中国—东盟关于新冠肺炎问题特别外长会在万象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 http://www.gov.cn/guowuyuan/2020-02/20/content_5481441.htm。

④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进展、贡献与展望》,中国一带一路网, <https://www.yidaiyilu.gov.cn/ldzd/dejgfl/wjxz/86708.htm>, 2019年9月29日。

制就是这一走廊所要构建的机制,而这个合作机制的文化核心就是民心相通。可见,健康理念与民心相通是有密切联系的,健康事业是民心相通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2020年3月2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世界大流行的严峻形势,习近平主席即时提出的“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重大倡议,不但对于世界各国卫生健康事业有重大意义,对于“一带一路”之民心相通工程同样有重大意义。事实证明,习近平主席这一伟大倡议,不但对世界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给“一带一路”文化建设工程带来了新的内涵。作为“一带一路”之民心相通文化建设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建设也将激活健康理念,进一步拓展其内涵,为打造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提供精神动力。

(三) 中医人学优秀思想拓展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文化建设的现实基础

以中医人学优秀思想拓展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文化建设有着坚实的现实基础。首先,最直接的当然是约20亿人口的人体生命健康的需要。其次,中医与东盟传统医疗保健已成为命运共同体。^①目前,东盟各国对中医和中药也在逐步放开和认可,例如,新加坡对中药及其制品的推崇,泰国将中药作为合法进口,越南鼓励中药生产和注册等。这是中医人学优秀思想服务命运共同体文化建设的良好环境。再次,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对传统医药的认同和需要。2009年东盟峰会通过的《蓝图2015》指出,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以人为本,有社会责任感,实现东盟各国人民和国家间的团结、稳定和统一的共同体”。^②这里,以人为本的社会文化建设可以从“以生命健康为中心”这一基本的共识开始,而这正是中医人学思想的固有内涵。可见,作为传统医药优秀文化资源的中医生命辩证法思想,不但可以在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卫生健康的实践中得到巩固和发展,同时还可以为这一卫生健康事业服务,进而深化其文化内涵,发挥其科学作用。诚如2016年10月27日《中国—东盟卫生合作与发展南宁宣言》第八条所宣示的:“我们认识到,传统医药在中国与东盟有悠久的历史,是中国与东盟各成员国卫生保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疾病的预防、治疗和康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③

三 拓展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文化内涵的中医人学思想资源

如前所述,中医生命辩证法是关于人的生命及其健康的系统知识,具有知识性

① 唐红珍、梁晓兰:《加快中医保健文化“走出去”助推“一带一路”建设——以中国与东盟合作为中心的研究》,《东南亚纵横》2018年第4期。

② 王勤主编《东南亚地区发展报告(2014-201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第316页。

③ 《中国—东盟卫生合作与发展南宁宣言》,中国一带一路网, <https://www.yidaiyilu.gov.cn/zchj/sbwj/10397.htm>, 2019年9月29日。

和科学性。从具体的内容看，中医生生命辩证法所蕴含的生命健康思想和人文精神，主要集中在三个命题上，即天人合一、贵人精诚和养生防治。这是拓展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文化建设的优秀资源。

（一）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是传统中医哲学思想的核心，也是中医生生命辩证法思想的基本内容。在今天的文化建设中，这个命题深得人心，许多人文学者和中医思想家们都常提到并应用这个命题。不过，在中医人学看来：人在自然界之中，而不是自然界在人之中；而且，在实践范围内，一切实践的活动及其衍生都是以人为中心的。事实上，传统中医生生命辩证法也认为：天地的本质为气，气的阴阳造化产生了生命，从而有了人。例如，《素问·宝命全形论》说：“夫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人能应四时者，天地为之父母。知万物者，谓之天子。天有阴阳，人有十二节；天有寒暑，人有虚实。能经天地阴阳之化者，不失四时。”^① 这是说，人与自然界是有联系的，人是自然界之阴阳气化的产物。进一步讲，对于人体生命的生理状态、现象变化以及人的本质和规律，中医生生命辩证法又是如何揭示的呢？

首先，人体生命及其活动的本质与规律，与气及其变化规律是相应的。《素问·阴阳离合论》说：“阴阳之变，其在人者，亦数之可数。”^② 《素问·天元纪大论》更具体阐述了人体生命的运动变化根源，认为“在天为气”，也就是风、热、湿、燥、寒；“在地成形”，也就是木、火、土、金、水；而且“形气相感而化生万物矣”。^③ 这些，讲的是人体生理和机理各要素之间，以及人体与自然界之间的应化关系，这种应化关系可概括为“五行生克制化”：一方面，五行之间有相生相克的正常关系，例如相克，其中就有承制关系。如《素问·六微旨大论》说：“相火之下，水气承之；水位之下，土气随之；土位之下，风气承之；风位之下，金气承之；金位之下，火气承之；君火之下，阴精承之。”^④ 另一方面，五行之间的关系还有相乘相侮的非常态关系。如《素问·五运行大论》说：“气有余，则制己所胜而侮所不胜；其不及，则己所不胜侮而乘之，己所胜轻而侮之。”^⑤ 这是说，气太过了，就要克制自己所要克制的它气，同时还要欺侮克制自己的那个气；而气不及的话，就会被胜过自己的它气欺侮，同时还要受到自己所克制的那个气的进犯。总之，对于“木火土金水”五行的整体性和联系性认识，尤其是对其中非常态关系的揭示，这是中医建立医疗卫生保健体系的理论基础。

其次，中医生生命辩证法不但认识到人体生命与自然界是整体，更揭示了人的能

① 郭霭春：《黄帝内经素问校注语译》，贵州教育出版社，2010，第154页。

② 郭霭春：《黄帝内经素问校注语译》，贵州教育出版社，2010，第43页。

③ 郭霭春：《黄帝内经素问校注语译》，贵州教育出版社，2010，第371页。

④ 郭霭春：《黄帝内经素问校注语译》，贵州教育出版社，2010，第387页。

⑤ 郭霭春：《黄帝内经素问校注语译》，贵州教育出版社，2010，第384页。

动性。《素问·举痛论》谓：“善言天者，必验于人。”^①而在中医辩证法看来，医生应当深刻认识和全面掌握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临床实践中遵循而不是违背这一规律，才能洞晓病情，对症下药，解决病人的痛苦，履行好自己的职责。它尤其指出，医生的高超医术，并不是由于什么神秘力量，不过是由于长久临床而掌握了“法天则地”原则罢了。如《素问·宝命全形论》说：“若夫法天则地，随应而动，和之者若响，随之者若影，道无鬼神，独来独往。”^②《素问·八正神明论》也设问：“用针之服，必有法则焉，今何法何则？”回答说：“法天则地，合以天光。”^③可见，诊疗体系不但反映了人对于自然界的依赖关系，而且反映了人发挥能动性而生活于自然界之中的客观事实。

总之，自然界客观存在，人源于自然界而为自然界之高级和特异生命；人相对于自然界是整体性个体，其生生不息的根据在于人体生命内在的整体功能活动；人可以“法天则地”发挥能动性，据此保养、防治从而永葆健康与活力。这些，就是中医生命辩证法天人合一思想的内容。显然，这是可以丰富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建设的。

（二）贵人精诚

东盟对于人的重视，早在2004年第10届东盟峰会通过的《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行动计划》中就出现了，而在2009年通过的《蓝图2015》更是直接强调：“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建设把人类发展放在第一位。”^④而中医生命辩证法的贵人精诚思想可以巩固和维护这个第一位，因为这一思想有着符合人体生命及其活动的科学认识，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尊重人，注重人体生命，以人及人体生命的价值为贵，如《素问·宝命全形论》说：“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⑤第二，人体生命活动是有规律的。例如，《黄帝内经》就揭示了人体生命的生长壮老已变化过程，女子以7年为周期、男子以8年为周期的一生的生理变化，还具体描述了人体生命历程的阶段性特征。此外，《灵枢·岁露》《素问·八正神明论》还讨论了一个太阴月中，人的生理机能的性变化规律；《灵枢·天年》则提出了10年一周期的观点等。第三，维护和保卫人体生命的医者要奉行大医精诚精神。在古代中医学家们看来，根据自然法则来维护人体生命，也就是在赞誉天地造化，因此维护者有莫大的功德。唐代医圣孙思邈说：“唯用心精微者，始可与言于此矣。”元代的王海藏说：“盖医之为道，所以续斯人之命，而与天地生生之德不可一朝泯也。”（《此事难知·序》）明代的张介宾也认为：“夫生者，天地之大德也；医者，赞天

① 郭霭春：《黄帝内经素问校注语译》，贵州教育出版社，2010，第227页。

② 郭霭春：《黄帝内经素问校注语译》，贵州教育出版社，2010，第156页。

③ 郭霭春：《黄帝内经素问校注语译》，贵州教育出版社，2010，第158页。

④ 王勤主编《东南亚地区发展报告（2014—201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第10页。

⑤ 郭霭春：《黄帝内经素问校注语译》，贵州教育出版社，2010，第153页。

地之生者也。”（《类经图翼·序》）古代医家的这些思想，当代中医学家们概括为大医精诚，视之为中医家至高的职业价值观，视之为中医家要追求的至高人生境界。

（三）养生防治

健康与长寿是各民族都普遍追求的，对此，中医有着一套符合现代医学发展趋势的防病治病和养生保健的方法论，即《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所说的“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①。这其实是中医生命辩证法在诊疗和养生方面的应用。今天，在维护中国和东盟各国人民生命健康的事业中，“治未病”思想可以发挥其独特的积极作用。

第一，顺时养生。养生就是养护人体生命，多指对正常人体生命的维护和保持，其根本理念和方法称为“养生之道”，即养生要顺应自然变化、遵循自然规律和人体变化规律。这方面，中医首先重视的是与人体生命息息相关的四季变化，《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说：“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②还有，中医特别珍视长期经验和总结出来的治则和诊法，例如脉诊，《素问·移精变气论》说：“夫色之变化，以应四时之脉，此上帝之所贵，以合于神明也。所以远死而近生，生道以长，命曰圣王”^③。事实上，中医有着许多切实可行的养生原则，今天的中医学家们总结为形神共养、保精护肾、调养脾胃等。

第二，整体性思维。对于人体健康的预防和治疗，中医有着一套详细而周密的方法论系统，表现出鲜明的整体性思维特征。其表现之一是，它的认识论基础，中医认为人体是整体，人体生命是五脏六腑等生理功能系统相互协调的活动体，各器官或系统内外相应，成为一体，如《灵枢·五癃津液别》说：“五脏六腑，心为之主。耳为之听，目为之候，肺为之相，肝为之将，脾为之卫，肾为之主外”^④。其表现之二是辨证论治法则。这是一种综合了病因病位等多种要素的整体性思维，例如在诊法上，就有望、闻、问、切的“四诊合参法”。中医虽也有单一的诊法，例如寸口脉诊、耳诊、手诊、明堂面诊等，但这些“单一”是指通过单一部位对人体生命全息给予综合判断，而且，其辨证之“证”不是仅指疾病，而是指对病因、病位、病性、病机、疾病的综合。

结 语

我们“认识到中国和东盟一直共同应对突发和重大挑战，形成守望相助、患难

① 郭霭春：《黄帝内经素问校注语译》，贵州教育出版社，2010，第13页。

② 郭霭春：《黄帝内经素问校注语译》，贵州教育出版社，2010，第12页。

③ 郭霭春：《黄帝内经素问校注语译》，贵州教育出版社，2010，第77页。

④ 郭霭春：《黄帝内经素问校注语译》，贵州教育出版社，2010，第278页。

与共的传统”，我们“决心继续努力，共同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及其负面影响”。^①因此，发掘中医药优秀人学思想资源，进一步拓展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内涵，从而巩固“一带一路”之民心相通和筑牢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意识，这在新冠肺炎疫情世界大流行背景下显得更有意义了。

With Chinese Medicine's Excellent Resources to expand Culture Connotation of China-ASEAN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CEN Xiaoqing, HUANG Gang

Abstract: Social and cultural community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is under construction, and “people-oriented” is the core of its common value, which has been recognized. The meaning of people in “people-oriented” is rich, but “physical life” is indispensable. The “unity of nature and man”, “noble sincere” and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illness” of Chinese Medicine Hominology are excellent resources for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a-ASEAN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which can not only promote the “Belt and Road” project to “health-connected” project, but also provide spiritual strength for the China-ASEAN Community to safeguard people's life, health, and regional public health security.

Keywords: Chinese Medicine Hominology; Dialectics; China-ASEAN Health Community; People-to-People Connectivity

^① 《为全球合作抗击疫情树立标杆》，《人民日报》2020年2月21日。

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逻辑内涵^{*}

江 凌^{**}

【摘 要】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以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为理论基础，为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现代化建设及其发展目标提出了新论断、新观点、新思考，蕴含着深刻的内在逻辑。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渊源与立论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灵魂，以人民为中心体现了人民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中心主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创新活力和驱动要素，中华文化自信、文化自觉和学习精神、文化交流互鉴是发展动力与方法论，对内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对外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是国家文化发展目标，构建人类文化共同体是全人类文化发展目标，这七个方面相辅相成，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内容与运行逻辑。

【关键词】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逻辑内涵；人类文化共同体

当今时代，文化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文化已经横扫社会领域，极速扩张着自己的地盘。可以说，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一切，从经济价值和国家权力，到各种实践再到自我的心理结构，都已经在某种意义上被纳入‘文化’的范畴”，^①法国学者让·鲍德里亚曾说：“人类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已经步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经济生产领域已经与意识形态或文化领域融为一体；文化的产品、影像、表征，乃至感

*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增强中华文化全球影响力的实现路径研究”（项目编号：18DZA312）的阶段性成果。

** 江凌，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文化产业管理系副主任，上海市高校智库管理与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市委宣传部前线智库基地特邀研究员，中国新闻史学会地方新闻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产业）学、新闻与传播学。

① Fredric Jameson,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146.

觉与心理结构都变成了经济世界的组成部分。”^①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现代化建设走进新时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蕴含着深刻的内在逻辑: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渊源与立论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灵魂,以人民为中心——人民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中心主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创新活力和驱动要素,中华文化自信、文化自觉和学习精神、文化交流互鉴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动力与方法论体现,对内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对外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是国家文化发展目标,构建人类文化共同体是全人类文化发展目标,这7个方面相辅相成、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内容与运行逻辑(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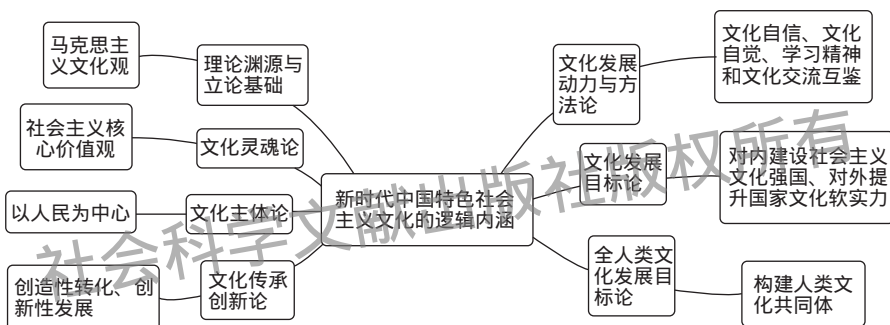


图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逻辑内涵

一 理论渊源与立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文化观

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作为一个超越了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的科学的理论体系,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揭示了文化意识形态的共产主义本质,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立论基础。

(一) 文化的意识形态性、阶级性与人民性

“文化的意识形态性是阶级社会所特有的文化现象,是以具有不同的物质利益的对立阶级的存在作为前提的。”^②不同的阶级会产生不同的阶级意识形态,“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③。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文化成了统治阶级维护阶级社会存在与自身利益的工具,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指出了资本主

① Steven Connor, *Postmodernist Culture: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ies of the Contemporary*, Oxford: Blackwell, 1989, p. 51.

② 胡海波、郭凤志:《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研究》,中国书籍出版社,2010,第10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178页。

义文化意识形态的本质及其固有的弊端,同时为无产阶级文化及其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奠定科学的理论基础。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具有变革现存世界的坚决性与彻底性,是真正指向未来的现实的社会力量”。^①而无产阶级文化具有科学性、民主性、人民性特点,它作为“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极大地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社会生产资料的主要生产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②马克思强调:“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③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强调人民主体地位,认为人民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力量。人民群众在生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缔造了绚丽多彩的人类精神文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同样强调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主体性理论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延续与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④文化同政治、经济一样,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智慧与力量,人民群众是文化活动的创造者,也是文化活动的实践者。

(二) 唯物主义文化立场和活态物质实践

在马克思之前,也有不少理论家对文化做过阐释,但总体上没有脱离唯心主义的范畴。无论是把文化看作人类精神文明与意识形态活动的纯粹产物,还是将文化看成宗教或某种神秘主义的现实或超现实产物,都脱离了物质生产实践而界定文化。正如马克思所批判的:“所谓的文化史全部是宗教史和政治史。”^⑤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挣脱了唯心主义的枷锁,第一次基于唯物主义立场阐明文化史观。

马克思主义强调社会存在决定意识形态,精神文化来源于人们的物质生活实践,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⑥。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以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生活为基础认识、界定文化及其运行机理;另一方面,“人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⑦也就是说,一定历史时期的精神文化建立在对此前人类物质和精神财富的积累、传承与创新基础上,文化的发展以此前的物质与精神文化为历史前提,并奠

① 胡海波:《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研究》,中国书籍出版社,2010,第112页。

② 刘哲:《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关键术语解读——以文化自信、人民立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例》,《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287页。

④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第18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709页。

⑥ 胡海波、郭凤志:《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研究》,中国书籍出版社,2010,第77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669页。

定了之后精神文化发展的基础。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的科学的文化观,历史唯物主义文化立场和文化的活态物质实践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基调。

(三) 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及其重要性

马克思主义站在唯物主义文化观立场,阐释了文化、政治、经济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马克思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①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强调,一定时期的经济决定这一时期的文化与政治;政治、文化、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上层建筑对经济具有能动的反作用,文化、政治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社会作用,它们“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并且能在某种限度内改变经济基础”。^②

马克思主义有关文化、经济与政治三者关系的论述,为历代马克思主义政党所遵循。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调文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它与经济、政治之间是相互重叠、相互促进、相互支撑的关系。一方面,文化要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与政治的基本特征;另一方面,文化建设要对政治、经济的协调发展发挥促进与支撑作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中有关文化与经济、政治的关系及其重要性的论述,继承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

总之,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理论渊源和立论基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立足于当前我国国情和文化发展实际,传承和创新了马克思唯物主义文化观。

二 文化灵魂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作为物质实践和精神生产的产物,具有实现人的本性、满足物质和精神需求的特殊性,蕴含着重要的精神价值。这种精神价值(包括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是文化的灵魂,具有引领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灵魂和价值追求,是引领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进步的精神力量。

(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构成要素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汲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近现代革命文化、中国特色社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797~79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611页。

会主义文化和国外先进文化的精髓,从国家、社会、个体三个层面高度概括了不同社会主体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根本价值遵循与目标追求,寄托着每一位中华儿女的理想信念,承载着每一个中国人民的美好愿景。中国人自古讲求“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①这是中国传统仁人志士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在某种程度上也从个体层面对应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目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个人层面的要求,齐家是社会层面的要求,治国平天下是国家层面的要求”^②。可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中华传统美德的高度概括与凝练,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品质的历史积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了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中华传统美德,吸收了富强、文明、和谐、公正等改革开放新文化理念,汲取了平等、民主、自由、法治等西方优秀文化价值观,具有鲜明的历史性、时代性、普适性和实践性。

(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

第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支撑。理想、信念、价值观是一个国家、民族和个体的精神支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括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内容简洁、全面、系统,立足当前中国国情和发展实际,为个人发展、社会进步和民族国家的繁荣富强描绘了宏伟的蓝图,指明了前进方向和奋斗目标,体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要求。

第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引领中国人民不断前行的强大精神动力。个人的发展离不开强大的精神力量支撑,民族国家的发展繁荣亦如此。古人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其中的“德”映射到当下社会,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兴;没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人们就没有精神动力和前进方向。因此,“做好各项工作,必须有强大的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精神推动力的支撑,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引导人们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③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强大的精神支撑,个人、社会和国家才能凝聚起精、气、神,为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第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核心价值追求。“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④而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壮大国家文化软实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价值引领和必由之路。

① 出自《礼记·大学》,原文为:“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第169页。

③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第126页。

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第163页。

（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项系统复杂工程，而“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意识，是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的重要途径，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蕴含的理论、现实和实践意义，决定了这项系统工程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一方面，需要在顶层设计层面将其提高到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战略高度，把它作为一项战略工程，制定具体的政策措施加强培育和引导，“我们要从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战略高度，持续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建设，要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作为一项根本任务，切实抓紧抓好。”^② 另一方面，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既要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宣传教育、推广普及，又要立足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借鉴国外优秀文明成果，常抓不懈，久久为功。

三 文化主体论：以人民为中心

人民群众是文化的核心主体，他们不断生产、发展、传承和创新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93次提到“人民”，“对于人民在中华民族发展、中华文明涵育、中华民族精神养成的过程中所做的突出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③。人民群众是文化的创造者、实践者和见证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发展观，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要义、依靠力量和服务宗旨。

（一）人民群众是文化的主体力量，是文化的创造者和实践者

马克思主义理论围绕着全人类解放这一根本目标展开，在各层面的论述或多或少都涉及“人民”主体的分析。以人民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有效指导着人类的物质和精神文化实践。马克思指出，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实践是社会生活的本质，而人民群众则是认识和实践的主体。文化是人类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它本质上是围绕“人”且指向“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一脉相承，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导向与服务宗旨。“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第163页。

②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第107页。

③ 高尚：《论习近平文化建设重要论述对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三个坚持》，《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8年第23期。

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①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命线,是治国理政的核心问题,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遵循。

“群众路线本质上体现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基本原理”,^②“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现代化建设。

(二) 以人民为中心,加快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在加快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历史进程中,要以人民为中心,充分依靠和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性。以文化产品创作为例,坚持群众路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首先要明白我们所创作的文化产品与文化服务是“为了谁”的问题。人民群众需要优秀的文艺作品滋养心灵,同时人民群众在对文艺产品的接受和实践中也滋养着文化。一方面,人民群众的物质和精神文化实践是文化产品生产、流通与服务的源头活水;另一方面,人民群众是文化产品与服务的消费者,人民群众的消费需求是文化的根本价值所在。

随着社会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对文化产品及其服务的精神需求越来越多,要求越来越高。以文艺创作与服务为例,“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进行无愧于时代的文艺创造”^④。可以说,文艺创作“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⑤“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⑥人民群众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成果的享有者,更是创造者和实践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依靠人民,目标是为了人民、服务人民,提升人民群众的文化获得感和文化幸福度。

四 文化传承创新论: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中华文明绵延 5000 千多年,是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断、文脉赓续的地域文明。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第16~17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第27页。

③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5,第13页。

④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第43页。

⑤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5,第19页。

⑥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5,第13~14页。

在当前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如何“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①在去粗存精、去伪存真、汲取精华的基础上,坚持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是中华文化永葆青春活力的关键,也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源头活水。

(一) 弘扬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和精神命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②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政策措施,并在人民群众的学习、工作和日常生活中予以具体实践,成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今天依然是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⑤在当今世界多元文化交织、异质文化矛盾和冲突不断、文化价值观多元化的态势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必须得到进一步弘扬与传承、推广与创新。

(二) 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传承,永葆中华文化活力

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入世型文化,具有深厚的社会根基和实践土壤。其道德理念与价值追求,有着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以“仁爱、道义、礼仪、智慧、诚信、宽恕、忠孝、廉耻”为核心的德性和智性,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和“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核心的价值追求,以“以德治国”“怀柔远人”为核心的治理理念为新时代全球治理、国家治理提供历史智慧;“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自然整体价值观系中华文化的“第一感觉”和“世界品牌”;“和合”“中道”“不执两端”的价值理念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文化基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日益彰显出历久弥新的全球魅力,成为全球共识和世界准则。

当然,在新的历史时代,儒家文化中一些思想观点尤其是创新、民主、法治思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第164页。

②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4,第7页。

③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4,第13页。

④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5,第25页。

⑤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第158页。

想需要发展和完善。因此，我们要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世界先进文化相融合，在融合中创新发展。当今世界各种文化相互交融，中华文化要提高国际影响力与感召力，必须立足当前中国国情，借鉴吸收国外先进文明成果。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吸收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是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结合，是坚持传承传统、立足当下与面向未来相结合，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相结合。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① 中华文化的前进方向，必须要结合新时代中国国情，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时与时代发展潮流相适应，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关键不仅在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的“两创”，还在于文化与科技融合，促进传播形态的“两创”，“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② 为此，需要系统梳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创新传统文化资源内容与形态，完善国际与区域之间的文化交流机制，综合运用传统媒体、网络媒体、社交媒体、社群传播、人际传播等传播形态展示中华文化的魅力。近些年，故宫文化产品与服务的内容与形态创新，通过文化艺术与新技术的融合，降低了艺术的审美与传播门槛，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起来”，走进人们的日常文化实践活动中。

五 文化发展动力与方法论：文化自信、学习精神 与文化交流互鉴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坚定文化自信，保持中华文化自觉，这是文化发展方法论的内在前提，有了这个前提，可以更好地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培育和养成学习精神，促进全社会形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学习风气，建设学习型大国，在学习中进一步认知、涵化和创新发展文化；同时，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吸收人类先进文明成果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创新发展的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第156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第161页。

题中之义。

（一）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坚定文化自信，保持文化自觉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重大问题。”^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丰沛，独特性和多样性优势明显，以及中华文化包容开放的文化价值观魅力，赋予了我们文化自信的底蕴。坚定中华文化自信，则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②

在坚定中华文化自信的同时，还要保持文化自觉。“文化自觉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③ 为此，我们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培育和养成文化自觉精神，善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汲取西方先进文化，融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提升中华文化创新能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二）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传承学习和创新精神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着学习、包容、开放的精神特质，学习和创新精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动力源泉。在全党、全社会倡导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就是要传承学习、开放、包容精神和“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创新精神。2009年11月，习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干部秋季进修班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深刻指出：“当前，党内的学习风气和学习情况总的好的，多数党员干部学习自觉性比较高，各级党组织在组织党员学习方面取得很大成绩。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一些党员干部和党组织的学习状况确实不容乐观。有些党员干部不思进取、碌碌无为，不愿学；有些党员干部热衷应酬、忙于事务，不勤学；有些党员干部装点门面、走走形式，不真学；有些党员干部心浮气躁、浅尝辄止，不深学；有些党员干部食而不化、学用脱节，不善学。从党组织组织学习方面看，有的学习制度不健全，或满足于把制度挂在墙上，却很少落实到行动上；有的开展学习思路不开阔，形式单一、方法简单，在引导党员加强日常学习、激发学习内在动力上缺乏有效措施；有的热衷形式，搞得声势很大，但学习的针对性不强，学习效果不佳。这些问题，是与建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第349页。

②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第41页。

③ 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

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要求相背离的，需要认真加以解决。”^①

海纳百川，方为江海；文化交流互鉴，方能促进文化创新。只有不断学习，才能赶上世界文化发展潮流。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的外国专家座谈会上强调，“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优秀文明成果。中国要永远做一个学习大国，不论发展到什么水平都虚心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加强同世界各国的互容、互鉴、互通，不断把对外开放提高到新的水平”。^②

（三）坚持文化多样性，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吸收人类先进文明成果

文化的多源发生、多向发展、多元并存和多样性统一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常态。文化在国家、民族、地区之间交往中发挥着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世界各地都有自己鲜明的文化特色，既具有共性，更具有差异性。在文化全球化历史进程中，异质文化的交流难免会出现矛盾与冲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究“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中庸”“和而不同”“知行合一”，面对异质文化矛盾和冲突时，强调“仁爱”“礼仪”“诚信”“友善”“和合”“以德服人”“怀柔远人”，同情襄助弱者，反对强权霸权。

这些核心价值理念，已经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并被广泛运用于文明的冲突、文明秩序的重建和处理新时代国际关系秩序中。中华文化开放包容、多元并存、善于学习的优秀品质为我们开展文明交流互鉴、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一带一路”倡议赋予了绵绵不绝的能量。

六 文化发展目标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当今世界，塑造和培育国家、民族或区域的文化形象、文化精神，创新文化内容和形态，制定文化发展战略目标，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已成为全球共识和世界文化潮流。对内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对外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目标。

（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升国民思想、科学和文化素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③ 人民群众的生活追求已经从“物质文化”转到“美好生活”，“美好生活”更多包含着精神文化的追求和生

① 习近平：《关于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几点学习体会和认识》，《学习时报》2009年11月17日。

②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第289页。

③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第11页。

活品质的提升。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和美好生活品质需求的时代要求。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内涵主要包括：一是具有高度的内在文化自信、文化自觉和外在的文化吸引力、文化辐射力，能够引领国内、国际文化创新和发展潮流，代表人类文化的前进方向；二是具有强大的文化生产、创新、流通、消费和传播能力，能够引领社会风气，促进社会秩序和谐有序；三是有效引导社会主流价值，规范国民道德素养，促进国民的思想、科学和文化素质整体上达到较高水平。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传承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利于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追求与党的价值理念保持一致性，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持内通性；有利于提升民族凝聚力，更好地展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有利于涵养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提升人民群众的文化素养；有利于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实现文化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有利于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国家综合竞争力。

（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不仅关系我国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定位，而且关系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①一般而言，文化软实力包含两个方面的内涵：“从对外关系而言，文化软实力包括国家的创新力、思想的影响力、文化的亲和力以及文化产品的传播力和辐射力；对内发展而言，文化软实力包括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民族精神的传播、民族文化的继承与创新等。”^②文化软实力是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强大的文化软实力能够捍卫国家主权，抵御西方文化价值观对我国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渗透。

当前，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面临着一些机遇和挑战，由于东方国家和西方国家在语言、符号、文化语境等方面存在文化距离、文化误解现象，作为高语境文化的中华文化，语言和文化符号内蕴丰富，表达形态多样，影响异质文化的受众接受度，尤其是在西方中心主义和文化霸权、文化偏见等因素作用下，西方发达国家对我们的文化认知以及我们对发达国家的文化认知存在严重的“文化逆差”。为此，需要创新中华文化内容、表达方式和传播形态，注重中华文化的亲和力和他国、他民族受众对中华文化的接受度；积极搭建和拓展中华文化传播媒介平台，以高“文化流量”占据国内外媒体传播平台，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力和影响力。

七 全人类文化发展目标论：构建人类文化共同体

在当今全球化潮流面前，由于文明的多样性和文化的异质性，文明的矛盾和冲

① 《习近平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第108页。

② 冯留建、王炳林：《实现中国梦需要提升文化软实力》，《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4年第5期。

突在所难免,加上西方个别国家的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中心主义依然盛行,文明的优越感和排他性有增无减;同时,多元价值冲击、地缘政治冲突和发展利益博弈,异质文化价值观强势渗透,导致人类文明交往的风险增加,甚至危害国家文化安全。为此,习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力图通过人类文明的平等交往,达致“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共同体”境界,这种“文化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全人类发展目标,必将为人类和平发展、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世界秩序文明和谐带来福音。

(一) 构建人类文化共同体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放眼全人类,观照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传承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和文化的全人类终极关怀意识,以全球视野、全人类文化情怀描绘了“人类文化共同体”的宏伟蓝图,构成了文化的全人类发展目标。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和平发展大势不可逆转。”^①经济、文化、信息、科技的全球化不仅给人类文明和谐共处提供了“共同体”土壤,同时也催生了大量的全球性文化问题。比如,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盛行,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渗透无处不在,地缘文化矛盾频仍,文化的贫富分化严重,地区动荡此起彼伏;全球气候问题突出,生态文化环境恶化;网络文化安全问题凸显,科技文化伦理失守,世界充满不确定性风险,全球文化安全和文化治理面临十分严重的挑战,没有任何国家可以独善其身,单独解决这些挑战,必须同心协力,平等协商,团结合作,合力构建人类文化共同体。

人类文化共同体强调每个国家、民族和地区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强调国家(民族、地区)不分大小强弱,各国、各民族文化互相尊重和平等交往,互鉴互学,互惠共赢。习总书记强调,“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多样带来交流,交流孕育融合,融合产生进步”。^②

(二) 构建人类文化共同体的理论土壤和现实路径

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党积极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和谐”“和合”等优秀思想营养,推动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中关于“共同体”论断的中国化,传承改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第58页。

^② 《习近平在联合国成立70周年系列峰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5,第18页。

改革开放以来国际文化交流思想的优秀理论和实践成果,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人类文化共同体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构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文化大国积极践行全球文明交流互鉴和全球文化治理的题中之义。构建人类文化共同体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同频共振,其现实路径在于:“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正确义利观,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① 构建人类文化共同体,重在尊重文化多样性,求同存异,促进人类文明平等交流互鉴,寻求各国、各民族、各地区文化的最大公约数,共建、共有、共治、共享全人类优秀文化内容和表达形态,以及可相互通约的全球文化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

结 语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一脉相承,凸显了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继承性和创新性的统一、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科学性与实践性的统一,现实性与战略目标、长远目标的统一。准确把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内容和逻辑内涵,对于坚定中华文化立场,增强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意识,传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借鉴汲取人类先进文明成果,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构建人类文化共同体,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Logical Connotation of Socialist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JIANG Ling

Abstract: The socialist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is based on the Marxist cultural concept, and puts forward new conclusions, new viewpoints and new thinking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socialist culture and its development goals in the new era. It contains internal logical connotations: The Marxist cultural concept is the theoretical origin and basis of the socialist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The core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第25页。

socialist values are the soul of the socialist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People-centered means the people are the main body of the socialist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re the innovative vitality and driving factors of the socialist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Chinese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Chinese cultural consciousness and spirit of learning, cultural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are development motivation and methodology of socialist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Building a strong socialist cultural country internally and enhancing national cultural soft power externally are the development goals of the socialist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Building a human cultural community is the goal of the entire human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t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The interaction of these seven aspects together constitutes the theoretical edifice, basic content and operating logic of the socialist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Socialist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Logical Connotation; Human Cultural Community

论抗疫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德育意义

迟成勇*

【摘 要】抗疫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是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要求，具有显著的德育意义。以思政课教学为主渠道，结合思政课程的相关内容，帮助大学生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厚植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怀，引导他们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培育他们的爱国与爱党、爱社会主义相统一的道德品质，帮助他们确立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品质，促使他们确立正确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培养他们的社会主义职业道德品质，滋养他们的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涵养他们的家国情怀与天下意识，激励他们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提升抗疫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德育意义，还应编写有关抗疫精神的教学资料、综合而灵活运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等。

【关键词】抗疫精神；高校思政课教学；德育意义

2020 年初春以来，全国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伟大斗争中，铸就了以“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①为主要内容的伟大抗疫精神。抗疫精神是一种伟大的民族伦理精神，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品格的时代体现，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精神的传承和发展，也是战胜新冠肺炎疫情且取得重大战略性成就的精神密码。

从精神结构看，抗疫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现实凝结，也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有机融合，还是德治精神与法治精神的时代结合；从伦理道德看，抗疫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道德、中国革命道德和社会主义道德的融合结晶；从价值观看，抗疫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集中体现；从文化

* 迟成勇，哲学博士，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① 习近平：《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 年 9 月 9 日。

视角看,抗疫精神是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弘扬和培育中国精神的一种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的继承与弘扬,也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抗疫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具有显著的德育意义。

一 抗疫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内在要求

精神是人所特有的。唯有精神才能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中华民族有着崇尚精神的优良传统,不仅倡导精神生活高于物质生活,而且表现为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和理想社会的建构,强调人之为人要有独特的精神气质和高尚的精神品质。注重精神教育是对中华民族崇尚精神优良传统的继承与弘扬。注重精神教育或中国精神教育用现代新儒家梁漱溟先生的话说就是“精神陶炼”。所谓“精神陶炼”,“就是要帮助大家早一点明白,早一点认识中国民族精神,早一点锻炼自己的精神,好为中国社会服务”。^①又说:“中国民族复兴也要靠中国教育、中国精神陶炼。”^②尽管梁漱溟先生所说的中国精神与我们现在提倡的中国精神有显著的区别,但“精神陶炼”说对我们加强中国精神教育,涵养人们的精神世界,锤炼人们的精神品质,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进而激发人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不懈奋斗,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毛泽东同志强调,“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③道出了精神生活在人生中的重要意义,同样一个国家或民族也要有强大精神。历史与现实证明,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神力量。在中国近代史上,国粹派提出的“国魂说”,梁启超提出的“新民说”,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中华说”和“建设说”等,实际上都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近代重塑,其目的在于提振国民精神,实现救亡图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不强。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④青年大学生是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未来,他们的精神状况或精神素质直接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因此,加强精神教育,帮助新时代大学生塑造优良的精神品质和提升高尚的精神境界,不仅是个人健康成长的内在需要,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客观要求。我们思政课教师要深刻领会加强精神教育的重要意义和时代价值,自觉将中国精神和抗疫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着力塑造他们优良的精神品质和提升他们高尚的精神境界。

党领导人民抗击疫情的伟大实践,为高校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新内容、新素材、新载体。抗疫精神是中国精神的生动诠释,也是中国精神的时代

① 梁漱溟:《教育与人生:梁漱溟教育文集》,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第78页。

② 梁漱溟:《教育与人生:梁漱溟教育文集》,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第64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162页。

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第47~48页。

彰显。抗疫精神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品格、道德观念和价值取向,是从中国先进文化中积蓄起来的昂扬向上的精神力量,具有显著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即“在于引导普通民众对英雄品质的肃然起敬和对伟岸人格的心驰向往,并在个人生活中保持一种积极向上的态度,去竭力实现人生所能达到的理想高度”。^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抗疫精神的重要论述为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鲜明的教育导向和良好的教育情境。“弘扬伟大抗疫精神应是教育战线的责任担当和自觉行动。”^②在疫情防控态势下,对大学生加强中国精神教育,其重点就是要加强抗疫精神教育,为新时代大学生精神成长打好底色。2020年9月24日,教育部发布《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的通知》,提出“有机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大力推进‘三进’工作”“切实加强学理阐释”^③三项具体要求。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抗疫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要求。

二 抗疫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德育意义的探析

立德树人是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也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性课程。“无论社会如何发展,‘抗疫精神’始终不会过时,其价值意蕴将随着新时代的发展而进一步呈现出来。”^④发掘抗疫精神的价值意蕴,将抗疫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具有重要而显著的德育意义。

(一) 把抗疫精神与理想信念教育结合起来,帮助大学生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坚定共产主义信念

理想信念教育是新时代大学生思想教育的核心内容,其教育价值目标在于帮助大学生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人既是现实性的存在,也是理想性的存在,现实性与理想性的有机结合,是人特有的应然状态。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陈先达教授说:“青年学子的思想要有‘岸’,不能‘走一站,报一站’,要以共产主义为方向,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向着未来航行前进。”^⑤理想指引人生方向,信念决定事业成败。对大学生而言,

① 王坤庆:《精神与教育——一种教育哲学视角的当代教育反思与建构》,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第271页。

② 本报评论员:《弘扬抗疫精神汇聚建设教育强国力量》,《中国教育报》2020年9月9日。

③ 教育部:《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2020年9月30日。

④ 徐艳玲:《“抗疫精神”的生成逻辑、丰富内涵和价值意蕴》,《人民论坛》2020年第12期。

⑤ 陈先达:《哲学与人生》,中国青年出版社,2018,第382页。

理想信念是大学生健康成长的精神动力和指路明灯。习近平总书记说:“青年一代的理想信念、精神状态、综合素质,是一个国家发展活力的重要体现,也是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①可见,帮助大学生坚定理想信念,提升精神品质,不仅有利于个人的健康成长,而且对促进国家发展和提升综合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伟大斗争中,全国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万众一心,群策群力,中国抗疫取得了重大的战略性成就,充分彰显了中国力量、中国精神和中国价值,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魅力和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同时人们深厚的家国情怀、美好的道德情感,以及忠诚、责任、奉献的崇高品质,也在这次伟大的抗疫实践中逐渐凝练和升华为一种共同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凝聚起抗疫的强大精神力量。对新时代大学生而言,加强抗疫精神教育,对于引导他们坚定理想信念具有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思政课教师将抗疫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要结合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等重大问题,深化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帮助他们坚定理想信念,筑牢精神支柱,引导他们把自己的人生理想自觉地融入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努力奋斗。

(二) 把抗疫精神与爱国主义教育结合起来,厚植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

爱国主义教育,是新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永恒主题。爱国主义既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内容,也是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要求,还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追求。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价值支撑和精神动力,也是一个人立德之源和立功之本。2019年4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说:“对新时代中国青年来说,热爱祖国是立身之本、成才之基。”^②在青年大学生中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就是要让爱国主义精神在青年大学生心中牢牢扎根,让爱国主义精神成为青年大学生人生价值的根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鲜明主题。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大学生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就是要激励他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奔赴抗疫前线的广大医务工作者、疾控工作人员、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科技工作者、社区工作者、公安民警、应急救援人员、新闻工作者等,他们奏响了爱国主义的主旋律,用他们自己“逆行”的脚步生动诠释了“在家尽孝,为国尽忠”“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爱国理念,也为爱国主义精神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我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青少年和共青团工作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第9页。

^② 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9,第7页。

们完全可以说,正是因为爱国主义精神铸就了“最美逆行者”和全国人民的使命感与责任感、凝聚力与向心力、意志力和创造力,疫情才能得以有效地遏制并取得战略性成就。爱国主义是抗疫精神最深厚的底蕴,抗疫精神是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最新素材。思政课教师将抗疫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把抗疫精神与爱国主义教育结合起来,用抗疫中鲜活的动人事迹或先进典型诠释爱国主义,同时用爱国主义来讴歌抗疫中的动人事迹或先进典型,在爱国主义理念与抗疫爱国事迹的互释中,引导大学生以抗疫英雄或抗疫先进典型为榜样,教育他们把“爱国之情”“强国之志”“报国之行”统一起来,并将此付诸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进而厚植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怀。

(三) 把抗疫精神与人生观教育结合起来,引导大学生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

人生观教育是新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其教育价值目标在于帮助大学生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由于每个人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生活经历不同和人生境遇不同,从而对人生的意义和人生的目的认识也就不同,人生观也就必然不同。但倡导在服务人民、奉献社会中创造自己有价值的人生,这是大学生人生观教育的价值导向。为人民服务,作为一种道德观,它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伦理取向;作为一种人生观,它彰显了高尚的人生境界。为人民服务既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核心。作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核心,为人民服务也是新时代大学生的一种道德诉求。习近平总书记说:“同人民一道拼搏、同祖国一道前进,服务人民、奉献祖国,是当代中国青年的正确方向。”^①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帮助大学生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这是新时代大学生人生观教育的道德取向。

在全国人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②奔赴抗疫前线的抗疫英雄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本着“人民至上”“健康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精神。“抗疫斗争秉持了为民解难、保民健康的理念,伟大抗疫精神也彰显了人民至上的政治品格。”^③“疫情防控中展现出的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中国效率,是体现人民至上价值立场的重要战略成果。”^④可见,人民至上、为人民服务是抗疫精神的深刻内涵。“‘为人民服务’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一个‘绝对命令’。没有可商量的余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青少年和共青团工作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第50页。

② 习近平:《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0,第2页。

③ 宇文利:《弘扬新时代伟大抗疫精神》,《中国青年报》2020年6月1日。

④ 尚庆飞、龚宸:《从疫情防控看新时代战略思维的哲学逻辑》,《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20年第6期。

地,没有逃避的权利。它是从根本宗旨中生发出来的要求,是基本信仰的体现。”^①可见,抗疫精神所蕴含的为人民服务精神与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相辅相成的。思政课教师将抗疫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把抗疫精神与为人民服务人生观教育结合起来,引导大学生学习和践行抗疫英雄或抗疫道德典型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精神,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让自己的人生在服务人民、奉献社会中得到升华。

(四) 把抗疫精神与坚定“四个自信”教育结合起来,培育大学生的爱国与爱党、爱社会主义相统一的道德品质

众所周知,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巨大社会系统工程,必须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即中国共产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从历史维度看,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从实现层面看,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从领导主体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先进制度。可见,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中国,这三者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因此,在当代中国,爱国与爱党、爱社会主义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习近平总书记说:“祖国的命运和党的命运、社会主义的命运是密不可分的。只有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相统一,爱国主义才是鲜活的、真实的,这是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精神最重要的体现。”^②爱国与爱党、爱社会主义相统一,这是新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鲜明的价值导向。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迸发出极大的爱国主义热情,积极响应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号召,在很短的时间内集中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做到全国动员、全员参与、全国一盘棋,打响一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和阻击战,充分表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从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相结合来讲,“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速度”“中国力量”,它们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伟大实践中从不同层面彰显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优势和道义制高点。有学者指出,抗疫精神,“更加彰显和坚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③思政课教师将抗疫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把抗疫精神与坚定“四个自信”教育结合起来,让学生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中国的可爱、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和执政为民理念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显著优势,使其更加坚定“四个自信”,进而达到深化

① 刘建军:《守望信仰》,人民出版社,2013,第150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第129页。

③ 侯勇:《伟大抗疫精神彰显了“四个自信”》,《群众》2020年第9期。

爱国与爱党、爱社会主义相统一的教育目标,着力培育他们爱国与爱党、爱社会主义相统一的道德品质。

(五) 把抗疫精神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相结合,帮助大学生确立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品质

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新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文化自觉,是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晚年提出的一个经典理念,其含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环境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文化发展历程和未来走向有充分的认识。文化自信是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文化自觉是文化自信的前提。文化自信是建立的文化自觉基础上的。当代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是近代以来中西文化的激烈冲突,或者说是“中体西用”“西体中用”“西方文化中心论”或“全盘西化论”“东方文化优越论”或“儒学复兴论”及“文化综合创新论”等各种文化观的论争中进而达到文化自觉的基础上逐步确立起来的。无疑,中华文化自信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信、革命文化自信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自信。从文化视角看,抗疫精神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的继承与弘扬,也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抗疫精神蕴含着中国人民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品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也是孕育抗疫精神的母体性文化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价值基因,深深地植根在中国人的内心世界,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情感表达方式。“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新继承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为指导的现代新文化。”^①从此角度看,全面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精神特质及时代走向,坚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信,这是增强人们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历史渊源和价值根基。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说:“抗疫斗争伟大实践再次证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强大精神动力,是凝聚人心、汇聚民力的强大力量。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②思政课教师将抗疫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把抗疫精神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结合起来,深入发掘抗疫精神中的优秀传统文化底蕴,让学生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精神特质和时代走向,让学生懂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逻辑演进及其与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渊源关系,在增强学生坚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信的基础上不断增强其对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进而帮助他们确立文化

① 程恩富、李立男:《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是软实力的灵魂和核心》,《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2019年第1期。

② 习近平:《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0,第20~21页。

自觉和文化自信品质。

（六）把抗疫精神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结合起来，促使大学生确立正确的道德观和价值观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新时代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题。大学生正处于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关键时期，面对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多元化的价值观的多重影响，对他们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他们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帮助他们“扣好人生的扣子”，这是高等教育至关重要的职责。无疑，抗疫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是中华文化优秀传统文化的凝结和体现，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核心和灵魂，两者是相通相融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是凝聚中国力量的思想道德基础。”^① 核心价值观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抗疫精神是一种伟大的民族伦理精神，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道德、中国革命道德和社会主义道德的融合结晶。讲伦理、守道德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抗疫精神的本质属性。抗疫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国精神的集中展现和生动诠释。”^② 也可以说，抗疫精神是全国人民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伟大斗争中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结晶，也是中国精神的时代体现。因此，大力弘扬抗疫精神，有助于促进人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确立正确的道德观和价值观。

在疫情防控各条战线上涌现出的先进道德典型，如“最美医生”“最美护士”“最美军医”“最美警察”“最美公务员”“最美清洁工”“最美快递小哥”等，他们的抗疫行为就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践行，其行为所彰显的伦理精神、道德境界应该成为规范人们行为的价值坐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说：“各条战线的抗疫勇士临危不惧、视死如归，困难面前豁得出、关键时刻冲得上，以生命赴使命，用大爱护众生。”^③ 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最美逆行者”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伟大斗争中得以充分的彰显。2014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曾说：“青年要从现在做起、从自己做起，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自己的基本遵循，并身体力行大力将其推广到全社会去。”^④ 也就是说，青年大学生要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积极倡导者和自觉践行者。思政课教师将抗疫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把抗疫精神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结合起来，引导大学生把“个人的德”与“社会的德”“国家的德”统一起来，把个人发展与国家富强、人民幸福、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第351页。

② 戴木才：《伟大抗疫精神的价值观意义》，《道德与文明》2020年第6期。

③ 习近平：《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0，第14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青少年和共青团工作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第117页。

民族振兴结合起来,促使他们确立正确的道德观与价值观。

(七) 把抗疫精神与社会主义职业道德教育结合起来,培养大学生的社会主义职业道德品质

社会主义职业道德教育,是新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家罗国杰指出:“加强职业道德的教育,已经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迫切要求,成为我们时代精神的需要。”^①从某种意义上讲,职业道德建设是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突破口。抓好职业道德教育,就能够推动或带动整个精神文明建设的开展。现代成功学研究表明,一个人事业的成功,既取决于专业技能或职业能力,也取决于职业道德品质或职业精神境界。人类历史表明,任何人只有通过一定的职业活动,才能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进而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职业道德则为从事职业活动进而实现人生价值提供了道德支撑。对大学生而言,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增强他们的职业道德意识,涵养他们的职业道德品质,为他们将来走上职业岗位打下坚实的道德基础。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最美逆行者”挺身而出,他们用切实的抗疫行动谱写了一首感人肺腑的社会主义职业道德赞歌,表现出顽强拼搏的优良作风、爱岗敬业的优秀品质、恪尽职守的道德情操、求真务实的实践品格及敢于牺牲的奉献精神等。从一定意义上讲,职业道德是人格的一面镜子,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从业者的整体道德素质。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伟大斗争中,“最美逆行者”表现出来的职业品格、职业态度、职业技能、职业纪律、职业作风、职业良知及职业精神等,是职业道德人格升华的生动体现。从行业职业道德视角看,医生职业道德精神、军人职业道德精神、警察职业道德精神、科技职业道德精神及新闻职业道德精神等各行各业的职业道德精神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得到充分彰显和整体升华,增添了新时代的鲜活价值。毋庸置疑,抗疫英雄或抗疫先进典型是践行社会主义职业道德的榜样,抗疫精神是社会主义职业道德精神的鲜活体现。思政课教师将抗疫精神融入思政课教学,把抗疫精神与社会主义职业道德教育结合起来,引导大学生以抗疫英雄或抗疫先进典型为榜样,以他们的职业道德境界为标杆,从现在做起、从自己做起、从小事做起,使社会主义职业道德成为他们自己日常学习和职业技能训练的基本遵循,着力培养他们的社会主义职业道德品质。

(八) 把抗疫精神与法治教育结合起来,涵养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加强法治教育,是新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固内容。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适应建设社会主

^① 《罗国杰文集》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第231页。

义法治中国、法治社会和法治政府的需要,新时代大学生不仅要有良好的道德品质,而且还要有坚实的法治素质。习近平总书记说:“要坚持法治教育从娃娃抓起,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和精神文明创建内容,由易到难、循序渐进不断增强青少年的规则意识。”^①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历史进程中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征程中,对作为以担当民族复兴为己任的时代新人大学生而言,通过加强法治教育,增强其法治观念,提升其法治素质,不仅关乎个人的全面健康成长,而且关乎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对大学生加强法治教育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针对性。

事实说明,战胜疫情需要“法律与道德同行”,既需要道德的人文关怀,也需要法律的保驾护航。在全国人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全面依法履行职责,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疫情防控工作。习近平总书记说:“实践告诉我们,疫情防控越是到最吃劲的时候,越要坚持依法防控,在法治轨道上统筹推进各项防控工作,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②从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四个层面全面推进依法抗疫,法治精神在抗疫中得以充分彰显。“疫情防控中所彰显出的践行法治的精神,正是各项工作顺利开展的有力保障和强大动能。法治精神乃是‘抗疫’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③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在抗疫中得到充分彰显。伟大抗疫斗争中的法治实践,是对大学生加强法治教育的生动素材。思政课教师将抗疫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把抗疫精神与法治教育结合起来,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帮助大学生增强法治观念,树立法治信仰,涵养他们的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九) 把抗疫精神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结合起来,滋养大学生的家国情怀与天下意识

加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是新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内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问题或人类困境而贡献出的中国智慧和方案,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工作的总目标,为中国和世界开辟一条共同发展的康庄大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我们对未来人类社会愿景的中国表达,也是对“天下一家,中国一人”“四海之内皆兄弟”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念的时代表达,彰显了“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品质,体现了爱国主义和天下主义的情怀。抗疫新冠肺炎疫情伟大实践彰显了中国人民“和而不同”“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的人文主义情怀,也展现了中华民族“讲信重情”“和衷共济”“爱好和平”的大国责任担当。当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时,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本着人道主义精神,积极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向受疫情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青少年和共青团工作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第35页。

② 习近平:《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实践》(党的教育版)2020年第3期。

③ 付子堂:《法治精神是“抗疫精神”的重要元素》,《法制日报》2020年5月20日。

影响的国家和国际社会提供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援助,为全球抗疫注入强大信心和力量。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各国相互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影响更加深刻;人类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从全球抗疫来看,病毒没有国界,疫情不分种族。新冠病毒是人类的公敌,任何国家在病毒面前都不能置身其外,独善其身。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指出:“新冠肺炎疫情以一种特殊形式告诫世人,人类是荣辱与共的命运共同体。”^①现实表明,世界各国只有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守望相助,才能凝聚起战胜疫情的强大合力;团结合作是国际社会战胜疫情的制胜法宝。全球抗疫更加凸显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国,中国也要分享抗疫斗争的中国经验,发挥全球抗疫的中国担当,贡献科技抗疫的中国智慧,讲好抗疫斗争的中国故事。”^②思政课教师将抗疫精神融入思政课教学,把抗疫精神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教育有机结合起来,一方面增强大学生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认同,另一方面滋养他们的家国情怀与天下意识,进而激励他们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奋斗。

(十) 把抗疫精神与中国梦教育结合起来,激励大学生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时代主题。加强中国梦教育,是新时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其教育价值目标在于激励他们把人生理想自觉融入实现中国梦的奋斗中。“新时代的青年学生要承担起实现强国梦的伟大历史任务,为此砥砺奋斗,终生不渝……在今天,‘爱国’精神集中体现在为实现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而奋斗。”^③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梦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也是包括广大青年在内的每个中国人的梦。”又说:“中国梦是我们的,更是你们青年一代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终将在广大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④ 新时代大学生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生力军,“这要求他们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主动担当起实现中国梦的神圣使命,并以中国梦指引自身的成长成才之路”。^⑤ 实现中国梦,为新时代大学生成长成才指明了人生奋斗的目标和方向。

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实现中国梦既需要雄厚的物质基础,也需要强

① 习近平:《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0,第21页。

② 贾经铭、张瑜:《论全球抗疫斗争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2020年第4期。

③ 马秋丽:《对五四运动的两类解读与两条中国道路——访上海财经大学资深教授鲁品越》,《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2019年第2期。

④ 《习近平关于青少年和共青团工作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第14页。

⑤ 冯秀军:《中国梦与当代大学生的成长成才》,《思想理论教育》2013年第6期。

大的精神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指出：“我们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伟大抗疫精神，使之转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力量。”^① 抗疫精神作为中国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既为实现中国梦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精神支撑，也为实现中国梦树立了一面鲜艳的精神旗帜和价值引领。如钟南山等抗疫英雄，可谓是抗疫精神的人格化载体，为新时代大学生实现人生价值，成就精彩人生，树立了榜样。思政课教师将抗疫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把抗疫精神与中国梦教育结合起来，教育大学生要以抗疫英雄或抗疫先进典型为榜样，以抗疫精神为旗帜，始终把国家和人民放在心上，以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民族复兴为己任，把自己的人生梦想自觉融入为实现中国梦的奋斗中，激励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成就自己的精彩人生。

三 提升抗疫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德育意义 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就是要理直气壮地开好思政课。抗疫精神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马克思说：“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② 因此，提升抗疫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德育意义还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编写有关宣传抗疫精神的教学资料

科学而丰富的教学资料，是开展有效教学的前提性条件。全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充分彰显了中国制度、中国精神和中国价值，是具体而生动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资源。思政课教师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抗疫讲话精神尤其是《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精神为指导，组织编写中国抗疫故事、宣传中国抗疫先进典型、讲好中国抗疫经验等相关教学资料，促进抗疫精神“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一方面要做到所选资料具有真实性、典型性和教育性，有助于加强正面引导，澄清模糊认识，批驳错误观点，目的在于激励大学生的责任担当，筑牢大学生的家国情怀，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另一方面思政课教师还要在教育部印发的《疫情防控进思政课教学建议》的指导下，立足我国疫情防控具体实践及其所取得的战略性成果，面向全体大学生深入解读党中央疫情防控的决策部署，全面而深刻地分析抗疫中彰显的党的正确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同时还要结合全球抗疫情形，从比较的视角讲清楚中国人民在党的

① 习近平：《在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9月9日。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433页。

领导下发扬人道主义精神,积极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全球抗疫所做出的重大贡献。

(二) 贯穿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要着力解决的根本问题和核心问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也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性课程。而及时更新教学内容,将鲜活生动且富有正能量的教育素材融入课堂教学中,这是高校思政课教师的应有教学态度。抗疫精神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这是与时俱进地创建思政课教学内容的生动体现。从思政课课程构成看,加强抗疫精神教育要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马克思主义原理基本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及《形势与政策》等思政课程的相关内容有机融合起来,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根本问题,着力从政治、经济、文化、哲学、道德、法律、历史、国防、外交及党建等多维度发掘抗疫精神的价值意蕴和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并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给予深入浅出的解读,最大限度地发挥抗疫精神的育人价值。

(三) 自觉综合运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

相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而言,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如何发挥主渠道的育人作用,教学方法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人们常说,方法得当,事半功倍;方法不当,事倍功半。从教育心理学看,进行有意义的教学或有意义的学习,需要合理选择适宜的教学方法。将抗疫精神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还要注重教学方法的综合而灵活运用。但运用什么样的教学方法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由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决定的,是为传授教学内容、实现教学目标服务的。“在具体的课堂教学中,应该根据不同的目标和学生要求的不同,灵活选用恰当的教学方法。”^①根据相关的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综合而灵活运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最大限度地发挥课堂教学的有效性,以促进学生的最优化发展,这是教师应有的教学能力。高校思政课教师以现代新媒体技术为载体,综合运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如理论讲授法、案例教学法、情境教学法、网络教学法、问题教学法、对话式教学法、专题教学法及实践教学法等多种教学方法,不断增强思想政治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当然,从广义上来说,教学方法既包括教师的教法,也涵盖学生的学法。就学生的学法而言,如读写结合法、学思结合法、合作探究法、发现学习法、网络阅读法及观看视频法等。需要强调的是,在疫情防控态势下,思想政治理论课要积极探索网络平台“线上教学”,将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深度融合,建构“线上

^① 张景焕:《教育心理学》,山东人民出版社,2020,第279页。

教学”与“线下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模式，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创新。

Moral Education Meaning of Integrating Anti-epidemic Spirit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CHI Chengyong

Abstract: The integration of the anti-epidemic spirit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inherently required b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has significant moral education meaning. By tak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teaching as the main channel, combined with the relevant content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we can help college students establish a common ideal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a firm belief in communism, strengthen their patriotism, guide them to establish a life outlook that serves the people, and cultivate their moral character of love for country, party and socialism. As well as help them establish cultural awareness and self-confidence, encourage them to establish correct ethics and values, cultivate their socialist professional ethics, nourish their socialist spirit of the rule of law, foster their home and country feelings and world consciousness, and inspire them to work hard to realize the Chinese dream. Teaching materials about the anti-epidemic spirit should be compiled and diversified teaching methods should be used comprehensively and flexibly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anti-epidemic spirit into the moral educ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Keywords: Anti-Epidemic Spiri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Moral Education Meaning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第三届世界文化论坛暨第二届中国文化 分论坛发言摘录

王伟光 等*

一 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与世界文明千年交流互鉴

(一) “大道不孤，天下一家”

(中华文明主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华民族历来讲求“天下一家”，2500 多年前，就提出了“大同”社会理想，主张民胞物与、协和万邦、天下大同，憧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美好世界，一路传承下来，直至今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把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风雨同舟，荣辱与共，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100 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立足自身国情和实践，从中华文明中汲取智慧，博采世界文明之长，坚守但不僵化，借鉴但不照搬，在不断探索中形成了自己的发展道路，一条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的道路，一条改革创新的道路，一条在开放中谋求共同发展的道路，在世界文明的姹紫嫣红中，刷出绚丽的中国红。

(二) “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世界文明千年交流互鉴史)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① 1000 多年的人类文化交流史，不仅推动了欧洲和西方进入崭新的近代文明，也开启了亚洲和中国近代文

* 王伟光，中国社会科学院原院长、学部委员，世界文化论坛名誉主席。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3 卷，外文出版社，2020，第 468 页。

明进程。

9~10世纪的阿拉伯“百年翻译运动”，吸收了波斯、中国、印度等国在哲学、数学、医学、文学和政治方面的成果，对欧洲摆脱中世纪的神学黑暗统治，开启文艺复兴运动，迈进近代文明，做出了影响深远的历史贡献。

唐代中叶以后，中国的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四大发明和其他科学技术文化成果，对欧洲和西方近代工商业文明和资本主义文明的产生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马克思把中国的四大发明在欧洲的传播与应用称为“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预兆”。英国学者约翰·霍布森认为，如果没有中国的这些贡献，英国很可能还是一个游离于同样落后的欧洲大陆边缘的国家。

明末清初，中欧掀起一场广泛而深入的文化大交流。在中国的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王徵等和欧洲的利玛窦、莱布尼茨、伏尔泰、霍尔巴赫、魁奈等著名学者的积极参与和推动下，形成了中学西传与西学东传的互动局面，达到了中学与西学互学互鉴、互补互进的新境界。

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从西方传播到中国，中欧思想文化交流和东西方文明互学互鉴走向新的高潮，这对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以及在其领导下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诞生产生了深远影响。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方，由西方传播到东方和世界各地，对世界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伟大的历史贡献。

（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新文化帝国主义及其特征、危害）

20世纪中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推行“文化扩张”战略，企图以一种更具隐蔽性和欺骗性的方式延续帝国主义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全球统治。美国学者赫伯特·席勒在提出“文化帝国主义”概念时指出，美国作为信息与文化产品流动的控制中心，通过资本的指挥支配着边缘地区的信息渠道，而“信息的自由流动”恰恰作为一种神秘话语掩盖了支配的实质。冷战结束后，“文化帝国主义”一度“话语的消逝”，但并不影响它以新的面貌“复活”。

进入21世纪，在知识经济、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三重效应叠加下，美国凭借其对文化和媒介、互联网和信息资源的垄断，主导国际话语权，通过大众文化的商业化和市场化运作，在全世界大行“文化殖民”与“文化霸权”，迫使文化弱势国家趋于“美国化”，给世界文化多样性生态造成极大破坏，我们将这种“复活”的文化帝国主义称为“文化新帝国主义”，它有四个方面新特征。

一是通过美元与知识产权垄断，形成不平等的国际分工和两极分化的全球经济和财富分配。乌格·帕咖洛将21世纪资本主义称作“知识垄断资本主义”，其核心特征是在全球或一定区域内通过对知识的垄断，包括专利垄断、著作权垄断、申遗垄断、商业秘密垄断、植物基因开发垄断等，从发展中国家攫取高额垄断利润，掠夺社会财富，限制甚至扼杀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创新，最终遏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甚

至生存。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发达国家国际垄断企业控制了全世界80%的专利和技术转让及绝大部分国际知名商标,并因此获得了大量收益。

二是通过全球信息资源垄断,利用国际信息秩序不平衡性的结构性矛盾,构建“媒介帝国主义”和“信息帝国主义”。新传播技术生态中呈现以下四个新问题:发达的网络社交平台加剧文化间的不信任、不理解;“数字资本主义”导致数据伦理及相关社会问题;“数字鸿沟”催生知识的“阶级性”和信息资源的“圈层”特权。这种网络文化霸权是资本主义殖民逻辑的数据化表现,其本质是利用传播技术的“黑箱”,将平台中立性与技术中立性演绎为一种可以掩盖资本逻辑入侵网络民族主权的“神话”。

三是通过对世界文化产业体系的垄断,文化资本化带来文化上血腥的“剥夺性积累”,推行文化“圈地运动”和“可口可乐殖民主义”。商业化和市场化文化产品和服务的“选择自由”带来的是个人“真正自由的遮蔽”:好莱坞电影在世界观众的大脑中植入去历史化的个人英雄主义,满足着人的视觉欲望;商业广告为全世界带来消费主义的狂欢,输出价值观以及商品的同质化需求;西方媒体设置全球新闻的议事日程,播送着所谓的“客观”报道,而非西方的、非资本主义的、来自社会底层的声音被遮蔽。人们享受在不加思考的标准化同质化的生活方式中却不得不接受“美式民主文化”。

四是通过国际话语权垄断,进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输出,威胁各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和文化主权。西方大国主要是“通过媒介霸权、话语控制、意识形态、殖民文化等传播来建立其话语霸权或文化霸权的”。通过强大的媒介力量,西方文化在国际交往中首先形成具有绝对优势的话语控制。在当今世界,如果某种话语在文化领域中成为一种主导性的话语,实际上它正限制了其他文化的传播和发展。西方的话语霸权割断的正是弱势国家的文化传统之根,使得传统与现代之间存在深度断裂,造就了一大批无家可归的“文化难民”和无根的民族。

可见,新文化帝国主义引发了多重文化危机:世界文明的多样性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各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和文化主权受到威胁,人类精神文明总体发展进程受阻。全世界文化弱势国家应该联合起来,共同抵抗文化强势国家的文化侵略。

(四)“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中国文化建设主张: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

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指出,文化间对话是促进和平的最佳保障,驳斥各种文化和文明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文化的多样性被视为人类的共同遗产,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一样必不可少。

中国不赞成“文明冲突”和“历史终结”,主张尊重和维护世界文化和文明的多样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他提出了加强文明交流互鉴

的“四个坚持”：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坚持开放包容、互学互鉴；坚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同世界各国人民和各国政党开展对话和交流合作，一如既往为世界和平安宁做贡献、一如既往为世界共同发展做贡献、一如既往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做贡献。

最后，祝第三届世界文化论坛暨第二届中国文化分论坛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二 在第三届世界文化论坛暨第二届中国文化分论坛上的致辞

高培勇^{*}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本届论坛的“中国共产党百年足迹：政党文化与世界多样化文明互鉴”的主题，十分重要。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先进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中外多元文化的融合与发展等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论坛的召开有利于总结文化建设经验、交流学术研究成果、推进社会主义强国建设、深化政党文化与世界多样化文明的交流互鉴。

希望在本届论坛中，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化基本理论及国外相关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等问题，中外学者可以展开深入的交流与讨论，形成一系列相关理论研究成果，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领域为建党百年贡献理论智慧。中国社会科学院马研学部也一贯重视与中学者展开学术交流与合作，迄今为止已经召开了三届世界文化论坛，这对广泛探讨和传播人类先进文化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 在第三届世界文化论坛暨第二届中国文化分论坛上的开幕词

程恩富^{**}

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生存发展的灵魂和血脉。任何政党和组织的建立和发展无法剥离一定的文化场域。作为马克思主义新型政党，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把马克思主义浸润到自身的政党文化之中，为党的发展壮大提供强大的思想支撑、精神滋养和文化底蕴。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仍旧面临着“四大

^{*} 高培勇，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党委书记。

^{**} 程恩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兼首席教授、世界文化论坛联袂主席。

考验”和“四种危险”，加强政党文化建设不仅是全面从严治党纵深发展的内在要求，而且关系到党的政治能力和执政本领的提升。如何在讲政治、炼党性的新时代赶考中认识把握中国共产政党文化的逻辑意蕴，以坚定不移地推进政党文化建设，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理论的创新发展，凝聚党心民心，增强党的战斗力，有着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清醒认识中国共产政党文化建设的战略地位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突出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地位。”^①从文化的范畴和角度认识新时代党的领导和政治建设，是理解党的全面领导的重要维度，也是把握中国共产党始终注重自身的政党文化建设的关键所在。政党文化是“政党”与“文化”相结合的复合性概念，既带有浓厚的政治性色彩，同时也具有文化要素特质。政党作为一种政治组织，政党文化必然也就带有政治文化和组织文化的属性特征。从思想观念层面来看，政党文化蕴含着政党为实现其目标、主张而倡导的理想信念、精神信仰。从价值规范层面来看，政党文化包含着广大成员普遍认同的价值追求和所遵循的基本规范。从行为实践来看，政党文化涵盖政党在实践探索中所形成的组织制度、行为准则等。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文化主要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理念所生发出来的，反映广大党员共同价值理念的先进科学的文化观念。这种先进科学的政党文化在长期的实践发展中，经受历史和人民的检验，已然化为稳定、可塑的政党精神和政党基因，成为中国共产党经久不衰、兴旺发达的引擎和动力，也是党能够在大浪淘沙中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始终砥柱中流，赢得人民拥护和支持的重要支撑。

政党文化建设关系到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是广大党员干部构筑精神堡垒，荡涤政治灵魂的必然要求。恩格斯曾说：“一个知道自己的目的，也知道怎样达到这个目的的政党，一个真正想达到这个目的并且具有达到这个目的所必不可缺的顽强精神的政党，——这样的政党将是不可战胜的。”^②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以推翻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解放广大劳苦大众，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为己任，并在党章中明确规定“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③。由此来看，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文化是超脱于世俗、私欲的伟大精神文化，也正是因为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党的政党文化变得厚重而深沉，能够从根本上塑造广大党员的精神信仰以及党的光辉形象。不仅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第1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第139页。

③ 《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2008，第1661页。

标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所坚守的价值立场、政治本色,而且成为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精神旗帜和文化标识。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建设改革中建构起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认同、政治认同、价值认同,从而厚植群众基础,巩固自身执政的合法性。

总的来说,有什么样的政党文化就有什么样的政治生态和组织行为。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文化建设不仅影响着党的执政理念的科学性和执政方式的合理性,而且关系到新时代推进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矢志不渝地抓好政党文化建设,才能从更深层、更长远角度提升党员干部的政治领悟力、政治判断力和政治执行力,净化党内政治生态,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以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和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激励凝聚广大党员,团结带领人民群众在实现现代化的征程中披荆斩棘、行稳致远,以坚如磐石的政治定力应对和化解各种风险和挑战。

(二) 深刻把握中国共产政党文化建设的价值取向

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核心要义,再到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人民性始终是中国共产政党文化的鲜明特征和根本价值取向。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必须牢记我们的共和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始终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始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始终为人民利益和幸福而努力工作。”^①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百年发展史,就是一部实现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为人民群众创造幸福生活的奋斗史。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最根本的政治立场,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基本要求,也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乃至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的科学把握。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强调:“党性和人民性从来都是一致的、统一的。”^②也就是说,坚持人民性是坚持党性的深刻体现。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文化建设要从党性淬炼的高度把握人民性,广大党员干部在实际工作中要想人民所想、急人民所需,践行为民情怀、筑牢政治根基。

政党文化的功能不仅是团结凝聚政党成员,规范其行为,其关键还在于通过价值示范、精神塑造,赢得广大民众的支持和拥护。正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中国共产党能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不断取得成功,与其在思想理论发展和实践变革中坚持和深化人民性是分不开的。政党文化建设不仅要符合时代的要求,更要贴近人民的诉求,符合人民的利益,这也是中国共产政党文化先进性的重要体现。只有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政党文化建设的价值取向,才能使党的政党文化确立起广泛的权威,建立让广大群众拥护、服从的政治秩序。实现政党文化由政党组织向社会层面辐射延伸,在对人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第139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第154页。

民群众的现实关怀中建构政党文化的社会根基。列宁曾指出：“劳动群众拥护我们。我们的力量就在这里。”^①“只有投入生气勃勃的人民创造力泉源中去的人，才能获得胜利并保持政权。”^②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之一，也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文化是在为人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致力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中熔铸形成的，因而有着强大的凝聚力、引领力、向心力和感召力。中国共产党正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主体的历史观，才能始终将人民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使政党文化社会整合、价值引领的作用得以实现，最终构筑起稳固的文化领导权。

（三）积极推进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建设的实践发展

政党文化建设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外部环境的变化和政党自身的发展要求政党文化建设常抓不懈、不断推进。马克思曾指出：“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③随着文化全球化、文化多元化冲突的加剧，以及社会的转型和党内环境的变化，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文化建设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同时，新时代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提高党的建设的科学化，对政党文化建设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积极推进政党文化建设还需要处理好一些关系和重要问题。

我们要坚持不懈抓好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关系到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是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目标，同时也是对党的执政规律和政党文化建设经验的深刻把握。总体来看，当前绝大多数党员干部能够发挥积极的先锋模范作用，主流是好的，但不可否认部分同志在思想、作风等方面存在一些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问题，损害党的形象，影响党的建设。因此，加强党的政党文化建设，必须通过理想信念教育、组织纪律教育，强化“四个意识”，解决好一些同志信念不坚定、意识不强等问题，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权力观。只有以人民群众满不满意、高不高兴为衡量标准，政党文化建设才能在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中迈上新台阶。

四 在第三届世界文化论坛暨第二届中国文化分论坛上的致辞

尹作升 [山东大学（威海）党工委书记]

2021年5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回信，充

^① 《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2017，第219页。

^② 《列宁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2017，第6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0~51页。

分肯定了《文史哲》在弘扬中华文明、繁荣学术研究等方面作出的贡献,提出了“深入理解中华文明,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释如何更好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这一重大课题。总书记的重要回信,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教育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山东大学的亲切关怀,是对哲学社会科学地位作用的再强化,对哲学社会科学使命任务的再赋能,对哲学社会科学责任担当的再鼓劲。我们召开这次高水平的学术论坛,就是新的时代条件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生动实践。

大家知道,山东大学创建于1901年,是继京师大学堂之后我国第二所国立大学,也是第一所按照章程办学的大学。建校120年以来,山东大学秉承“为天下储人才,为国家图富强”的办学宗旨,践行“学无止境,气有浩然”的校训,汇聚济南、威海、青岛一校三地蓬勃动力,踔厉奋发,薪火相传,为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大家可能不太知道,早在20世纪30年代,山东大学就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的追求。1930年,华岗校长译本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成为《共产党宣言》结束语的经典。1938年,成仿吾校长和徐冰首次根据德文原文译出的《共产党宣言》全译本,对提高中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起了巨大作用。此后多年,成仿吾校长曾多次对《共产党宣言》译稿进行修订、校正,以极大热忱致力于对《共产党宣言》的准确翻译,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进入新时代以来,山东大学在加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础上,发挥齐风鲁韵的学科优势、资源优势,致力于建设传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具代表性大学。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研究阐释方面,产出了“全球汉籍合璧工程”“《十三经注疏》汇校与研究”“杜甫全集校注”等一大批重大重点项目和标志性成果,组建了全球汉学联盟,依托“儒家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凝聚海内外力量,引领世界汉学研究,形成了以“古文、古史、古哲、古籍”为标志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山大特色。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与传播方面,山东大学发挥全国重点马院示范作用,建设中华美德教育学院,不断探索传统文化人才培养新模式,通过“乡村儒学”“社区儒学”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与实践活动,参与主办“第22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世界儒学大会”,不断为中华文化走出去和世界文明交流互鉴贡献山大力量。

2021年恰逢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在百年非凡奋斗历程中,我们党在中国先进文化的引领与践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中外多元文化的融合与创新等方面取得了许多骄人的成就。在这样一个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我们汇聚一堂,共同探讨“中国共产党百年文化足迹:政党文化与世界多样性文明互鉴”,使命重大、责任重大。我们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本次论坛将会在深入理解中华文明、深入阐释如何更好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方面做出有益探索,产生积极影响。

五 致第三届世界文化论坛暨第二届中国文化分论坛的贺辞

〔俄〕根纳季·安德烈耶维奇·久加诺夫，李卓儒译^{*}

尊敬的同志们和朋友们！

您所举办的世界文化论坛已经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项主要资产。它为整个国际事业的复兴、理论研究潜力的增长、先进的理论武器与实践的结合过程以及培育有为的年轻人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此我向您的伟大的创举致以崇高的敬意。

众所周知，我们具有共同的历史记忆和面向未来的共同的历史命运，我们应当对它们采取谨慎的态度。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支持兄弟党的发展，并且不允许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国际地缘政治格局上对中国犯下国际犯罪和以新冠病毒为由攻击中国。我们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人对兄弟般的同志在大疫情的条件下能够迅速取得如此众多的成果感到自豪和骄傲。我们知道，这是由中国人民在100年前的根本性的历史选择所决定的。

社会主义的自由和正义的价值观是美丽的，并且在实际中得到证明的中国人民的勤奋品质和集体主义的作用也是事实，而这些美好的品质的形成的基础是深厚的爱国主义。作为你们的兄弟和同志，我们不会原谅西方政客们对中国展开的竭力抹黑和在各个领域的“混合战争”。

当前，俄罗斯和中国的联合是正确的、可靠的和具有前途的。我们的反对者永远不会理解——这个兄弟般的联合体并非经济联系上的机械组合，而是历史传统上的结合。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我们有着共同的奋斗目标和前进方向，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对邪恶的德国法西斯和日本法西斯的巨大的共同胜利。

在历史上，我们有着共同的英雄和战士——为列宁站岗的李富春同志、苏联坦克兵中尉毛泽东主席的长子毛岸英同志、在斯大林格勒战斗过的中国同志以及伊万诺沃儿童院的少年英雄们。事实证明，当我们团结得像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就会战无不胜。请回想一下吧，中国伟大的抗美援朝中的米格走廊是我们之间团结的一个多么光辉的历史事迹！历史不容抹杀，历史不容歪曲！

总的来说，俄罗斯的共产党人与你们之间的在意识形态上的血缘关系已经成为我们之间的最深厚的关系基础的一部分。我们相信我们的意识形态、文化、歌曲和电影等的力量。因为它们总是能够让人们保持智慧和憧憬未来的幸福。

祝大会顺利和成功！祝大家健康和幸福！亲爱的兄弟姐妹们！

^{*} 根纳季·安德烈耶维奇·久加诺夫，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俄罗斯国家杜马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党团领导人；李卓儒，南开大学21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斯大林译著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学习中心助理研究员。

六 在第三届世界文化论坛暨第二届中国文化分论坛上的闭幕词

程恩富*

2021年5月29~30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马工程办公室、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威海)和东方毅集团共同主办以“中国共产党百年足迹:政党文化与世界多样化文明互鉴”为主题的“第三届世界文化论坛暨第二届中国文化分论坛”在中国山东省威海市召开。来自10多个国家的100多位专家学者提交了论文和发言稿,中国社科院、山东大学和东方毅集团的领导先后致辞,俄共中央主席久加诺夫发来录像贺词。通过大会和分论坛的演讲和研讨,与会者大体形成以下几点重要共识。

(一) 总结百年中共平等开放的政党文化

中国共产政党文化内蕴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核,汲取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养料,传承着革命文化的红色基因,秉持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价值理念,体现着中国共产党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政治要求,是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重要遵循。中国共产政党文化作为政党的灵魂所在,塑造了共产党员政治意识形态、组织行为规范和党性修养。中国共产政党文化生存和生长的过程,是以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为滋养而从中华民族自己传统文化里的共产主义思想渊源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秉持平等和尊重,摒弃傲慢和偏见,不断加深对自身文明传承与创新,不断推动不同文明的交流对话,逐步建成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世界人民谋大同的党。中国共产党广交天下朋友,已经同世界上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保持着经常性联系,“朋友圈”不断扩大。

(二) 回顾世界文化千年交流互鉴的历史贡献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人类文化的交流互鉴史长达千年之久,不仅推动了欧洲和西方进入崭新的近代文明,也开启了亚洲和中国近代文明进程。佛教东传、“伊儒会通”、“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传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全方位对外开放……在不断的交流借鉴中,中华文明形成了开放的体系,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仁爱善邻、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惠民利民、安民富民是中华文明鲜明的价值导向,革故鼎新、与时俱进是中华文明永恒的精神气质,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是中华文明内在的

* 程恩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兼首席教授、世界文化论坛联袂主席。

生存理念。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样的文明体系里弘扬与继承、创新与发展，探索出一条可以为世界各国政党学习和借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文化。

（三）保护世界文化多样性的生态平衡

文化的多样性被视为人类的共同遗产，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一样必不可少。尊重和维护世界文化和文明的多样性，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世界和平与繁荣发展的必要遵循。我们应该：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坚持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坚持开放包容、互学互鉴；坚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世界人民谋大同。因此，世界一切爱好和平和发展的进步人士和力量应团结起来，共同为世界和平发展和劳动人民福祉做贡献，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做贡献。作为一个世界性的文化论坛，我们将为此而继续努力奋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追溯文化百年足迹，共求世界文化繁荣 ——第三届世界文化论坛暨第二届中国文化分论坛综述

武晓玮*

- 【摘要】**2021年5月29~30日，“中国共产党百年文化足迹：政党文化与世界多样化文明互鉴”第三届世界文化论坛暨第二届中国文化分论坛学术研讨会在山东大学（威海）举行，来自10多个国家的100多位专家学者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研讨形式，围绕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展开热烈研讨。第一，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发展史也是文化培育、文化发展的历史，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文化问题，关注党内外文化建设，有助于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建设的新征程。第二，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蔓延背景下，推进世界多样化文明交流互鉴意义重大，各国学者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文化、各国及政党文化等相关问题进行讨论，深化国家间的文化交流。第三，挖掘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探究国外文化发展状况，有助于夯实文化发展基础，拓展文化发展思路，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当前文化建设与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探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发展路径，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为推进新时代中国的文化建设提供理论支撑。
-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政党文化；文明交流互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在百年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先进文化的引领与践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中外多元文化的融合与创新等方面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为了总结文化建设经验、交流学术研究成果，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深化政党文化与世界多样化文明交流互鉴，2021年5月29~30

* 武晓玮，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威海）讲师，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文化理论。

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马工程办公室、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威海）、东方毅集团共同主办的，“中国共产党百年文化足迹：政党文化与世界多样化文明互鉴”第三届世界文化论坛暨第二届中国文化分论坛学术研讨会在山东大学（威海）举行。来自10多个国家的100多位专家学者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以主旨演讲、学术对话会、分论坛讨论为研讨形式，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征程中的文化问题进行了探讨与交流。

会议开幕式由山东大学（威海）副校长黄凯南主持，山东大学（威海）党工委书记尹作升，中国社会科学院原院长、世界文化论坛名誉主席王伟光，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高培勇，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Геннадий Андреевич Зюганов（根纳季·安德列耶维奇·久加诺夫），中国社科院学部主席团成员、世界文化论坛联袂主席程恩富，东方毅集团总裁、世界文化论坛联袂主席东方毅作开幕式致辞。开幕式上强调，在百年发展中，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立足自身国情和实践，从中华文明中汲取智慧，博采世界文明之长，在不断探索中形成了自己的发展道路。回顾与总结中共百年的文化历史与经验，加强世界多样化文明交流互鉴，有助于进一步推进世界共同发展。

总结百年文化经验，共谋文化未来发展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发展史也是文化培育、文化发展的历史，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文化问题，关注党内外文化建设，有助于更好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建设的新征程。本次论坛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文化问题展开了热烈、广泛而深入的研讨。

（一）坚定中国道路，增强文化自信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程恩富教授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文化主要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理念所生发出来的，反映广大党员共同价值理念的先进科学的文化观念。这种先进科学的政党文化在长期的实践发展中，经受历史和人民的检验，已然化为稳定、可塑的政党精神和政党基因，成为中国共产党经久不衰、兴旺发达的引擎和动力，也是党能够在大浪淘沙中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始终砥柱中流，赢得人民拥护和支持的重要支撑。

中国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张国祚教授阐述了文化自信对一个国家、政党和领袖的重要性，他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深沉、更持久的一种力量。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坚定文化自信，才促成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道路中一个又一个成功，才实现了当今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以及国家的国际地位、影响力和话语权不断提高的社会现实。

山东师范大学商志晓教授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形态是一个需要深入研

究的问题,他指出应当从核心内容、学科呈现以及形式存在这三个层面来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形态。核心内容是党在百年发展中形成的理论思想;学科呈现包括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社会、生态、外交、国防、党建等学科领域的基本构架;形式存在包括人们的思想观念、社会舆论、民众心理、道德风尚、情感意志等方面。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蒯正明教授认为,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成功开辟的中国道路不仅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同时也开启了人类文明的新前景。中国道路所展现的文明样态不仅重塑了社会主义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同时它也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现代文明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就全球范围来看,中国提出并努力推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理念也为人类文明进步指明了新方向。

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翟玉忠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东方最古老的文明传统中国文化与西方当代最具革命性的文明成果、马列主义交流互鉴的结晶。一方面,马列主义深深改变了中国及中国文化,促进了中国及中国文化的全面复兴,改变了中国国运之千年弱势,激活了中华治道(王道),丰富了中国文化内涵。另一方面,中国文化也丰富和推进了马列主义,形成与时俱进、开创人类新局面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马列主义理论创新的中国文化资源包括:天下为公的普世和平(大同)理念之于公有制的建立;阶级和合之于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大一统的天下观之于社会主义国际运动。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威海)鲁法芹副教授认为,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创和发展起来的,但毋庸置疑,也是建立在中共百年一以贯之奋斗基础之上的。毛泽东独创的新民主主义论,不仅自洽地在理论和实践上回应了“社会主义与中国”命题,也深化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即形成了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共产主义”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的共产主义发展定向,规制着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凸显了共同富裕、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和谐的价值追求和实践,特别是进入新时代,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以中国之制努力推进中国之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建设和价值目的更加凸显,从而不断创新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王今朝教授认为,社会主义文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当代中国的文化。它有着鲜明的历史和现实对立面,也有着深刻而丰富的具体内容。它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认识论和实践论,包括基于它们而形成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理论、路线、方针、制度、政策。它蕴含于人们的情感、伦理之中,外化于人们的行动之上。中国已经在吸收古代优秀文化、借鉴西方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与中国古代文化和西方文化分庭抗礼的社会主义文化。巩固和发展这种文化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任务。

山东交通学院王传峰副教授认为，中国共产党 100 年的发展史就是文化自信的历史。坚定马克思主义理论文化是其文化自信之魂；继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文化自信之根；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中形成、发展起来的有中国特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其文化自信之用，也是中国共产党文化自信的最高体现。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威海）夏卫国副教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文化进行了概括，他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文化具有以下五个层面：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改革创新、全面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以人为本、改善民生的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

（二）加强党内外文化建设，发扬先进文化

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永贵教授认为，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发展中领导文化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从文化建设的目标引领论、文化建设的根本遵循论、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论以及文化建设的国际视野论四个方面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历程和经验。指出文化建设要真正服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维度，以及增强文化自信自觉的现实维度，要紧紧围绕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个问题。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士海教授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构建文化领导权的历史进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准确而全面地总结这些基本经验，对于当前加强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他指出基本经验有三个方面：首先，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是文化领导权建设的理论前提；其次，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文化领导权建设的实践中介；最后，教育与自觉相结合是文化领导权实现的基本路径。

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孙绍勇教授认为，文化领导权的旨趣在于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中国共产党的文化自信以科学的意识形态观为硬核，以先进的文化理念和崇高的文化使命引导垂范广大人民群众坚定文化自信，契合文化领导权内在的意识形态认同与接受的精神实质。深刻领会文化领导权与中国共产党文化自信的意识形态逻辑同构，从提升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深化意识形态整合调控，以及加强党内意识形态治理，夯实中国共产党文化自信的底蕴，对于形塑中国共产党文化自信的意识形态内核、掌控文化领导权，实现建成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有着纲举目张、固本培元的现实意蕴。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王希坤教授认为，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走出来的中国共产党，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文化观之后，摒弃了孤立、抽象地认识文化的方法，将文化放入经济社会的有机体中加以考察，准确把握先进文化的性质、地位和作用。在实践上，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先后创立了新民

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百年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自觉承担文化使命,从经济社会变革入手,构建先进文化存在的经济社会基础,组织领导文化工作者队伍,与各种落后的文化思潮作斗争,教育引导社会民众,形成文化向心力,凝聚社会力量,推动社会发展。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威海)房世刚副教授对党内政治文化进行了深入分析。他指出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立足新的历史方位积极发展先进党内政治文化,取得了显著的理论成效和实践成效。深化党内政治文化研究,需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深入研究新时代先进党内政治文化的生成逻辑,科学厘定新时代先进党内政治文化的概念及内涵。从而为推动党内政治文化话语创新提供前提基础,为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提供学理支撑,为践行党的初心使命提供文化自信。

烟台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康丹丹博士和岳素芳博士认为,意识形态是观念型的政治权力和系统化的阶级意识,受到一切阶级和政党的重视。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百年奋斗史也是一部意识形态建设的历史。遵循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党在意识形态建设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概括起来主要体现在战略定位、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功能指向、价值归属、理论创新、基础工程、阵地建设、组织机制和制度保障10个方面,逐渐形成一种动态发展的良性互动模式。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威海)吴清清博士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领导力量。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领导,就要坚持党性原则,站稳政治立场,坚守政治纪律,密切党群关系;要坚定理想信念,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坚定共筑中国梦的伟大梦想;加强党对文化建设工作的全面领导,更好地巩固党在新时代文化建设中的领导地位,推动新时代文化建设。

(三) 总结和弘扬革命文化,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建设的新征程

温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孙武安教授认为,应当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百年伟大社会革命,须积极回应历史虚无主义对中国革命的种种质疑和抹黑,澄清其在理论和思想认识上所造成的诸多混乱。从历史维度看伟大社会革命是长期奋斗与阶段推进的有机统一;从价值维度看伟大社会革命是破坏旧世界与建设新世界的有机统一;从实践维度看伟大社会革命是拼命精神与科学精神的有机统一。要理解我们党带领中国人民对中国社会进行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全方位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革命文化,这是推动中国共产党革命文化不断发展的客观要求。

贵州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春丽副教授认为,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共产党领

导中国人民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取得革命的节节胜利，主要原因在于党紧密团结人民，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敢于牺牲、勇于奉献、不畏强敌、视死如归、知难而进、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表现在与敌人搏斗时的浩然正气、大义凛然的英雄形象上，最后沉淀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即革命文化。这些精神文化遗产在新时代依然能够涵养政治文化、激发爱国情感、凝聚正义共识、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而成为开启新时代新征程的巨大动力，是积极推进 2035 愿景规划、实现 2050 强国目标不可或缺的精神资源。

青岛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郭士民博士认为，党的自我革命的百年探索深深植根于以人为本、自我革新、自省改过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土壤之中；党的自我革命孕育于近代以来民众革命意识的觉醒过程中，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加速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觉醒；党的自我革命理论形成于中国革命实践探索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人在中国革命实践中推动了自我革命理论的形成；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中推动党的自我革命理论的成熟。党的自我革命百年探索史表明，党的自我革命的根本动力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基本动力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具体动力来自当前实践中存在问题的解决。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威海）郝书翠教授与博士研究生姜逸认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进程中，红色文艺符号的建构不断回应着时代化、大众化等重大课题。中国共产党人在各个历史时期构建了不同的红色文艺符号，它们的内容随时代的发展而做出相应的调整，形成了以人民为传播对象、以文艺工作者为传播主体，二者相互转化的辩证统一关系。红色文艺符号的传播在丰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话语体系、立足时代讴歌人民、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坚定文化自信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熊辉教授探讨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如何认识和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标识性概念——“实事求是”。他指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中国复杂的国情和国内外多变的政治环境里，通过调查研究认识国情察“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识“是”、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教训得“是”、纠正“左”倾和经验主义的错误思想归“是”，从而回答了中国革命基本规律“是什么”的问题，解决了中国革命问题“怎么办”的问题，即运用马克思主义之“矢”作用于中国革命之“的”，探寻到了中国革命问题的规律性，进而提出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方案，实现了民主革命的“求是”。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张杨副教授探讨了毛泽东对农业合作化理论的构建与贡献，指出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对农业合作化的探索不仅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政治运动，更是一场经济变革，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政治、经济基础和组织保障。毛泽东对我国农业合作化的探索构成了较为完整的农业合作化理论，对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二 推进国际交流对话，共飨世界文化盛宴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院长、世界文化论坛名誉主席王伟光教授指出文化间对话是促进和平的最佳保障，驳斥各种文化和文明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文化的多样性被视为人类的共同遗产，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一样必不可少。中国不赞成“文明冲突”和“历史终结”，主张尊重和维护世界文化和文明的多样性。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同世界各国人民和各国政党开展对话和交流合作，一如既往地世界的和平安宁、共同发展、文明交流互鉴做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党委书记高培勇教授指出本届论坛适逢其时，很有意义。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创造了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中外多元文化的交流与互鉴等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本届论坛的召开有利于共享文化研究成果，总结文化建设经验，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推进政党文化与世界多样化文明融合与发展。

东方毅集团总裁、世界文化论坛联袂主席东方毅先生指出中华文化是最有包容性的文化，经过数千年的沉淀积累，至今仍是世界文化消费的时尚代表。在文明的冲突中，西方国家正在借“文明”的借口举行不文明的文化和武力侵略，我们应当进一步推动全球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化发展，促进世界文明的进步和劳动人民的福祉。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根纳季·安德列耶维奇·久加诺夫（Геннадий Андреевич Зюганов）认为本届世界文化论坛意义重大，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中国依然推进世界多样化文明交流互鉴，为世界和平发展和劳动人民福祉做贡献，已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项主要资产。同时，他对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迅速地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的卓越表现表示赞赏，对中国能在疫情条件下取得的成果表示自豪与骄傲。

各国学者也对马克思主义文化，各国与政党文化，以及国家间文化交流等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法国学者让·克洛德·德洛耐（Jean-Claude Delaunay）在马克思主义视角下分析了中国社会信用体系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信用体系。他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保障制度有两个主要特征：一是在法律的控制下制定；二是为了整个社会的利益。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能更好地保障人民民主专政，同时也使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成为可能。而在资本主义国家，这样的系统也存在，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都是私人系统，它们的目标是提高一些资本家家族的私人利润，这与中国有鲜明区别。

美国学者卡尔·瑞特纳尔（Carl Ratner）讨论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文化有三个要素，一是文化的特定形式，二是文化的具体内容，三是关

于文化的政治内涵，它们之间存在有机的逻辑关联。他指出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概念化社会问题，能够更清楚地揭示社会问题的实质。

美国学者罗伯·维尔吉（Robert Wilkie）对（后）人文学科进行了阶级反思。他认为（后）人文学科在北半球流行，是因为它对资本主义造成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做出了回应，但（后）人文学科没有对生活的条件提出质疑，而是教导人们学会与不稳定性共处。他认为应通过地缘人文学科，强调生活的辩证和唯物性，拿起批判的武器，对实际存在的剥削关系进行否定，让人们意识到超越资本主义这一破坏性力量的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

俄罗斯学者布拉夫卡·布子卡丽娜（Liudmila Bulavka Buzhgalina）讨论了市场和文化，以及极权主义市场的陷阱。她指出当前的市场是一种新形式的市场极权主义，充满了极权主义陷阱。看起来市场关系的每一个参与者是自由人，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因为实际上参与者是由市场决定的。所以说极权主义市场造成了一些特定的陷阱，这是给艺术家的陷阱，给社会活动参与者的陷阱，也是给文化生活参与者的陷阱。

加拿大学者杰夫·努南（Jeff Noonan）指出在资本主义国家，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阶级、种族和性别冲突，带来了很多问题，这就凸显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优越性，虽然疾病的存在是必然的，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它也不会完全消失，但社会主义制度会致力于更好地分配社会资源，以保障全体社会成员的健康。

土耳其学者阿德南·阿克弗拉特（Adnan Akfirat）指出新冠肺炎大流行证明了资本主义是如何扼杀人文主义的。私有财产和个人利益的制度导致了更严重的剥削和压迫，破坏自然，消灭人性。总之，它无法解决任何人类问题。今天，人类面临的问题只有通过集体财产、对社会的爱和伟大的全球工程才能解决。人文主义的旗帜会再次升起，但这一次，它会由那些追随科学社会主义的先锋党扛起。

古巴学者格雷迪斯·塞西莉亚（Gladys Cecilia）介绍了当前古巴的经济改革政策，例如统一货币体系，以积极应对当前古巴面临的经济问题。印度学者 Dev Pathak（德夫·帕塔克）讨论了印度在西方新自由主义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影响中形成的文化产业系统下，传统文化形式的努力和挣扎。

越南学者阮明环（Nguyễn Minh Hoàn）论述了胡志明关于加强党的文化建设的思想及其在越南革新中的继承与发展，指出越南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就将党的文化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它融入胡志明思想中，贯穿越南将马列主义创造性地运用到越南革命实践中并加以创新发展的整个过程。党的文化已成为越南共产党思想成熟度的衡量标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越南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能力。

越南学者阮志孝（Nguyễn Chí Hiếu）讨论了越南共产党对越南文化特别是对党的文化发展的观点，指出越南共产党认为文化既是发展的目标，也是发展的动力，也是一种内生资源。在当前背景下，经济实力不再是支配国家权利的最强因素，只有当国家—民族的发展依托于可以吸收和接受人类文化精髓的传统文化特色的基础

上才能保证可持续发展。同时,越南共产党认为建设党的文化是加强党和政治体系建设和整顿的重要因素,并注重加强与世界各政党的对外政党关系,促进人民对外关系,以巩固友谊关系和文化交流。

美国共产党经济委员会委员瓦迪·哈拉比(Wadi'h Halabi)高度赞扬了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历程中对马克思主义在经济、政治、社会甚至个人的具体情况中的灵活运用,以及取得的非凡成就,他认为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努力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做出了巨大贡献。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阿·鲍·拉赫曼诺夫(Рахманов Азат Борисович)指出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这是一个国际共运史上值得纪念的日子。时至今日,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的诸多成果有目共睹,不断证明着社会主义这一社会制度的优越性,而中国最近战胜了新冠肺炎疫情的事实,也再次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力量。

尼日利亚学者查尔斯·奥努奈伊朱(Charles Okechukwu)指出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在解决实际问题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更重要的是,通过与几个政党尤其是包括非洲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政党合作,中国共产党已将经验分享于世界。希望非洲的许多政党能够认真汲取中国共产党的经验,吸取重要教训,以提高他们寻求解决释放国家潜力和提高人民生活质量难题的能力。

来华留学的美国共产党党员伍淡然(Dylan Austin Walker)指出留学生来到中国学习之后,确实有助于改变和改善对中国的认知,获得对中国更加全面和客观的了解。通过留学生的文化交流与传播,有助于在国外公众心目中树立中国的国家形象,提高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对推动中外关系的发展和稳定做出一些贡献。

三 重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共创文化发展新局面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是博大而精深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世界的、科学的文化,我们应当继续挖掘与探索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以应对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本次论坛在挖掘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探究国外文化发展状况、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展开了激烈讨论与深入交流。

(一) 挖掘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夯实文化发展基础

北京外国语大学东西方关系中心主任田辰山教授认为,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正在进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斗争,正在努力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意识与实践建构。此时,我们应当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对走向违背人类生命命运的资本主义害生疾患的手术刀,是生命有机体系本身的应有之义,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也是基于生生不息自然宇宙观的哲学,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哲学、立场、历史渊源,造成

它与中国思想传统的相和，被中国自然而然地引进、传播和热衷、接受。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岩教授分析了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关学科现状，提出当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在与时俱进方面做得还不够，应当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他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为例，指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话语体系，一方面回应西方早已构建的完善的政治哲学体系，另一方面回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产生的新的问题，做到与时俱进，实现创新与发展。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孔明安教授认为，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解放逻辑揭示了人的解放及其自由的维度，但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拜物教逻辑，即人必然受制于商品之物的颠倒逻辑，也意味着：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在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面临着如何摆脱商品拜物教的颠倒逻辑的难题。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某种意义上也是在商品交换问题上完成了“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历程。但如何处理两种逻辑之间的张力，在新的层次上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治理体系，仍将是中国共产党未来百年所面临的艰巨任务和伟大使命。以追求马克思人的自由为基础的解放逻辑仍不断地遭到来自拜物教逻辑的挑战的难题和困惑。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威海）吴文新教授认为，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拜物教是宗教的原始秘密或历史起点，孤离个人对生存保障的渴求是现代碎片化社会宗教的逻辑起点，信教是原子化个人对回归社会联系之路的追寻，而现代私有制则是造成社会碎片化和个人孤离化的最深刻根源。为了解决宗教问题，必须逐渐彻底铲除私有制，不断壮大社会主义公有制，消除宗教存在的社会土壤；充分利用外在一神论宗教关于善、爱的德性因素使之成为一种世俗的正能量；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导向的文化生活充实人们的精神世界；以共享、自然、健康、文明的价值原则规范人们的文化生活，最终从根源和条件等方面阻断人们误入“神门”的现实通道。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威海）于少青博士认为，当代全球化发展问题频发，根源在于人类社会难以驾驭的资本逻辑占统治地位的发展方式。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向度，在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王霸之辨”中能够得到生动体现，从而使问题置于资本逻辑从霸道到王道的现实语境。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发展之所以遵循霸道的资本逻辑有其历史必然性，资本逻辑霸道的经济现实与驾驭资本逻辑的王道追求之间的矛盾斗争、交融与转化，构成了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前进的重要动力体现。以王道实现对资本逻辑的驾驭需要从生产方式、社会关系和自然力中寻求理论视角上的突破，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为超越资本逻辑提供了马克思主义方案和中国方案。

（二）借鉴国外文化发展积极成果，拓宽文化发展思路

澳门城市大学叶桂平教授与博士研究生孟静文认为，政党文化是政党身份、形

象、凝聚力的重要表达,政党组织、制度是政党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党文化研究深受学者青睐。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葡萄牙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中共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执政党,历经百年风华正茂,同岁的在野党葡共,仍在曲折前进。两党具有相似的时代背景,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同在反法西斯浪潮中磨砺成长。葡共作为百年同岁政党,其政党文化如何影响其政治身份,两党文化发展的同质性与特殊性是政治学界中值得思考的问题。他们集中探讨两党不同的建构路径,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从政党文化角度比较两党内核的微弱脉动以及发展过程中的文化差异。梳理葡共发展经验,既有利于增进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政党文化的认识,又对中共政党文化建设提供启示与思考,促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与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符豪博士对美国左翼文化批判先锋罗伯特·麦克切斯尼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进行探析,指出麦克切斯尼将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与政治批判、经济批判相结合,细致阐释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在21世纪左翼政治批判领域的独特效用,为新世纪美国左翼的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提供崭新视野和基石;运用传播学理论抨击美国深入政治“骨髓”的金钱媒体选举攻势,阐释新帝国主义权力与资本深度交融的政治弊病;精辟分析监视资本主义的理论热点,阐释监视资本主义是新帝国主义的最新发展样态,对资本主义政治控制具有新的工具特性,体现了他作为当代西方左翼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理论先锋的扎实功力。

江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许慧博士认为,罗莎·卢森堡从唯物辩证法的视角对无产阶级生活世界进行了深入分析,这不仅推进了生活世界理论的发展,还是击碎“卢森堡困境”的一记重拳。卢森堡的思想深刻揭示无产阶级的生活世界不是自然环境和社会历史给定的,而是无产阶级自行建构的;无产阶级生活世界的建构以自由为必要条件,以文艺为重要途径;无产阶级生活世界的超越性不仅表现在能够真实地认识客观世界、对世界的不合理性进行反思与批判,还表现在其具有能够成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的革命性;建构无产阶级生活世界是偶然性与必然性的辩证统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捍卫与推进。这些观点对当代中国丰富人民大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北京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吴穹博士分析了西方多元文化主义政治思潮的代表性人物威尔·金里卡的族群权利理论。他指出族群权利的合法性和道德性深植于少数民族的历史遭遇和现代多元社会的现实发展之中,有着无可辩驳的共性和理论基础。而这些族群权利的论证不是单单从一个角度就能完成的,需要我们多角度的思考。族群权利在本质上讲是一种差异性的权利,这种差异的存在是为了实现多族群政治共同体的正义观念 and 不同族群的和谐与生存,因此权利的差异之中体现的是内在道德的平等。

(三) 重视文化交流,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徐艳玲教授分析了新时代深化文明交流互鉴的三重逻辑

辑。她指出伴随着中国逐渐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世界文化该向何处走这一问题成为国际关注的重要问题。习总书记基于人类文明发展大势的考量，提出了文明交流互鉴这一新问题，有深刻的理论逻辑、现实逻辑和实践逻辑。从理论逻辑来说，文明交流互鉴的理念是马克思主义文明交往观的当代表现和概括；从现实逻辑来看，推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是对现实不合理的文明关系的批判；从实践逻辑来看，要想推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这一理念落地生根，首先就要实现中华文化的创新性发展与传播。

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对外交流与合作处隋云鹏副处长认为，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交织在一起，推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发生了有利于中国的根本变化。面对世界以及世界文化大转折的关口，应加快构建中华文化的世界体系，承担起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供文化支撑、精神指引和人文关怀的历史使命，承担起为世界提供优秀文化的文化使命。面向东亚儒家文化圈，构建中华文化新天下体系，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世界影响力；面向欧美国家和地区构建中华文化新自由体系，捍卫发展真正的全面的自由、平等、民主、人权，反对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面向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劳动人民，构建中华文化新国际主义体系。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岩博士与硕士研究生孟娴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继承马克思社会交往理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这些关乎人类命运的重大问题做出了科学的回答，充分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出以公心、行以公道的崇高品格。深入挖掘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马克思社会交往理论的内在联系，进而在马克思社会交往理论视域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于探索世界多样化文明交往的中国经验具有重要意义。

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姚宇副教授认为，2020年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我国政府通过派出专家团队和搭建专家网上交流平台等多种方式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和地区分享抗击疫情经验、讨论应对方法，极大提升了包括我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抗疫效率和抗疫成果。通过对我国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合作抗疫典型历程进行回顾和总结，分析了“丝绸之路经济带”抗疫国际合作文化交流的前提和路径，并基于实践总结和理论分析提出了几点政策建议。

山东英才学院葛聪副教授认为，社会转型背景下的乡村伦理遭遇道德制度约束力减弱、法制意识淡薄、互帮互助意识淡漠、诚信意识衰退等困境，其主要原因是市场化的负面因素、工业化的负面因素、组织化的负面因素和网络化的负面因素。社会转型背景下乡村伦理重构的必要性不言而喻，既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维护乡村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更是增强文化认同、重塑文化自信的关键环节。而要走出困境就要学习借鉴国外经验，要通过发展农村经济构建公平正义的社会经济秩序，加强农村文化建设创造良好社会环境，强化基层组织功能完善保障机制，构建网络平台畅通利益表达等路径重构乡村伦理。

四 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彰显优秀传统文化时代价值

中国共产党党文化生存和生长的过程，是以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为滋养而从中华民族自己传统文化里的共产主义思想渊源中成长起来的。在当前中国现代化建设新时代，应当继续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创新和弘扬，“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① 本次论坛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发展路径，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

（一）探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发展路径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余斌教授认为，传统文化是否优秀与其能否适应和促进历史的发展有关。每当人类社会发生大的社会变迁时都会出现相应的文化革命。优秀传统文化的存在是因为历史的辩证发展是否定的否定，经过历史变迁的现代文化包含着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那些能够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而与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融合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那些经得起今天的实践检验，进而成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一种需要或者能够成为推动实现美好生活的一种要素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拥有最多的能够长久保持的因素的文化必然是最有前途、最有自信的文化，而新时代中国的文化正是这样的文化。

上海师范大学高惠珠教授认为，要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是时代之需。破除某些不合时宜的“前见”遮蔽，是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必由之路。立足于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文化建设实践，她提出了有针对性的“三跨越”之路：跨越简单化的唯物唯心之分，吸取传统文化的精神真谛；跨越表面化的礼法对立思维，吸取传统文化的法政智慧；跨越教条化的经学注疏式的传统治学形式，面向现实、会通古今。

青岛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刘丽红、蔡斌副教授认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伟大实践中，自觉肩负起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责任，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弘扬者和建设者。中国共产党是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主体，其历史经验可以为今后中华文化的创造起到非常重要的借鉴作用；立足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基本原则、创造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现代语言形式，是中国共产党转化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经验。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第313页。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威海）孙克副教授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遗产工作，以习近平同志文化遗产重要论述为主体，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遗产思想，成为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和发展的理论指南。习近平文化遗产重要论述具有深刻的理论渊源，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是其根本指导思想 and 理论基础，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是其世界观和方法论，党的历代领导集体对于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是其形成的最直接思想来源，三者共同构成了习近平文化遗产重要论述的理论基石。

（二）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湖北文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李健博士认为，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孕育了光辉灿烂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时代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久弥新，其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核为新时代德育工作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他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新时代中华民族的精神依托，是新时代中国社会的整合力量，是新时代思想道德建设的核心要义。新时代背景下的德育实践，应当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功用。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威海）崔微博士认为，儒家的“理一分殊”思想可以为解决平等与偏爱的争论提供一种可能进路。她指出平等与偏爱的关系是近现代伦理学需要处理的重要问题。尽管中国道德文化中没有关于此问题的直接争论，但是存在类似的兼爱与仁爱争论，儒家用“理一分殊”思想解决了这个争论。中西争论具有共同的问题意识，对道德的本质认知也具有某种相通性，为中西道德文化的交流互鉴提供了前提；由于“理一分殊”思想具备的独特优势，它为解决平等与偏爱争论提供了可能进路，但也需要纳入平等理念以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

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张沁兰博士探讨了明清琉球久米人来华留学与儒学东被的过程及历史影响。她指出自明洪武至清末的近五百年间，琉球国为了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技术，派遣了大批来华留学的“官生”与“勤学生”，其中大部分的生源来自闽人移居的久米村。学成回国后，他们长期致力于中华传统儒学文化在琉球的传播、教育与普及，产生了深远影响，也成了儒学东被琉球的最主要途径。由于儒家思想已普遍影响了琉球社会的各个层面，琉球这一原本未闻诗、书、礼、乐的“蛮夷”之邦，终被誉为“守礼之邦”。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张永怀探究了孟子“与民同乐”思想及其对新时代公职人员群众路线开展的价值。他指出“与民同乐”是孟子政治伦理学的价值取向，内蕴着强调君主人格修养、尊重民众利益等有益成分。孟子的“与民同乐”思想可以为新时代公职人员开展群众路线提供启迪，比如公职人员应心存浩然正气，提升道德，抵制社会中的歪风邪气，还应遵循礼义的道德操守，将欲望控制在合理阈值。公职人员要心系群众，扩充视民如伤的情感，常思百姓疾苦，把人民安危冷暖放在心上，诉诸多种措施相互协同以聚民心。

会议闭幕式由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威海)党委书记郝书翠教授主持,程恩富学部委员致闭幕词。烟台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李国栋教授,滨州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卜建华教授,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孙绍勇教授,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肖斌副教授作为四个分论坛的总结汇报人,对本组与会学者的交流讨论情况进行了总结汇报。本次会议通过深入交流与探讨,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发展中形成的平等开放的政党文化,回顾了世界文化千年交流互鉴的历史贡献。仁爱善邻、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惠民利民、安民富民是中华文明鲜明的价值导向,革故鼎新、与时俱进是中华文明永恒的精神气质,道法自然、天人合一 是中华文明内在的生存理念。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样的文明体系里弘扬与继承、创新与发展,探索建设可以为世界各国政党学习和借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文化。通过本次论坛,我们深刻地体会到,尊重和维护世界文化和文明的多样性,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世界和平与繁荣发展的必要遵循。我们应当倡导改革不平等的国际文化旧秩序,探讨建立新的平等交流、多元多向、共建共享的国际文化秩序,共同致力于保护世界文化多样性的生态平衡,共同为世界和平发展和劳动人民福祉做贡献,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做贡献。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电影的智慧》简介

中华民族经过近代以来 180 多年前仆后继的不懈奋斗，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那样，已经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定是全面复兴，而文化复兴无疑将是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

在这样的背景下，独立学者郭松民同志的影评集《电影的智慧》，在克服重重困难后终于由济南出版社出版，这是电影界的一件好事，对我们思考文化复兴问题也有重要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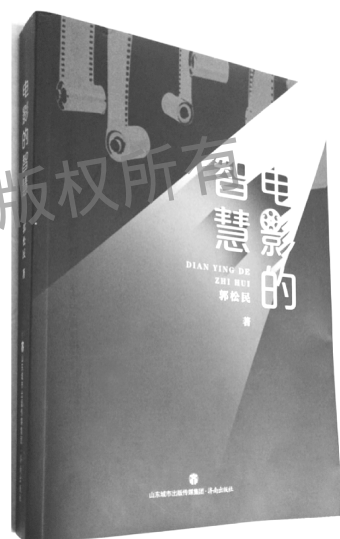
该书收录的主要是作者在 2017 ~ 2019 年撰写的影视评论，涉及这一期间上映的大部分有影响力的国产电影和好莱坞“大片”，也包括一些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老电影”以及“现象级”电视剧等。

除了对具体影视作品的评论，本书还收录了作者的一些理论思考，尤其以对主旋律电影的思考最为深刻和富有启发性。

时至今日，尽管电影已经丧失了其在 20 世纪曾经享有的中心地位，但其影响力仍是巨大的，电影塑造了很多人的世界观、历史观，也影响了很多人的政治认同。

有人说电影、电视剧是一种单纯的娱乐，这是不对的。银幕的背后有政治、有价值观。但遗憾的是，一段时间以来，出现了一种将马克思主义文艺评论等同于政治批判的错误看法，使得越来越多的文艺评论家不敢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为批判的武器，转而盲目地采用西方的文艺批评方法和技巧，失去了应该具备的批评个性和批评精神，失去了原有的人文和历史情怀，生搬硬套、顾此失彼，甚至使文艺批评不断商业化和庸俗化。

本书的最突出特点，是恢复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传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对影视作品进行解剖，所以往往能够抓住问题的本质，抓



住影视界、文化界的一些倾向性问题。

本书的另一个特点，是能够将影视作品放到特定历史和人文环境中，用相互联系的、辩证的观点去分析和思考，能够帮助读者打开新视野，产生豁然开朗的感觉。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为新时代文艺发展指明了方向。在讲话中，总书记突出强调“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作”，他指出：“文艺评论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是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① 郭松民同志的影视评论，正是学习贯彻总书记讲话精神的结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①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5，第29页。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论点摘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一 以人民为中心：新时代脱贫攻坚的价值逻辑

张富文

新时代脱贫攻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历史工程，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大攻坚战的重要内容。新时代脱贫攻坚的价值导向是以人民为中心，脱贫攻坚的历史进程就是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的实践过程。这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逻辑是指以人民为中心作为价值规范、价值导向所涵盖的诸要素及其内在关系以及其规范、引导的现实指向。从新时代脱贫攻坚的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相统一的基础出发，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新时代脱贫攻坚的价值逻辑，是以人民地位为中心的价值立场、以人民利益为中心的价值内容、以人民作用为中心的价值动力、以人民满意为中心的价值评判、以人民共享为中心的价值目标的逻辑严密的辩证统一体。以人民地位为中心是新时代脱贫攻坚的基本立场，反映了脱贫攻坚“为了谁”的价值立场；以人民利益为中心是新时代脱贫攻坚的核心内容，体现了脱贫攻坚“怎么做”的价值内容；以人民作用为中心是新时代脱贫攻坚的基本动力，明确了脱贫攻坚“依靠谁”的价值动力；以人民满意为中心是新时代脱贫攻坚的评判标准，确定了脱贫攻坚成效“如何评”的价值标准；以人民共享为中心是新时代脱贫攻坚的最终目的，明晰了脱贫攻坚成果“由谁享”的价值目标。

摘自《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二 新时代背景下的文化软实力提升

张国祚 刘存玲

习近平同志指出：“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国家基于文化而产生的凝聚力、生命力、吸引力和影响力。”^①新时代是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也是文化软实力发展的新阶段。新时代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新坐标，不论是在纵向的历史发展方向上，还是在横向的国际发展方向上，进入新时代，不论是从文化交流的环境、主观上对文化的重视，还是从客观上能否支撑文化发展、文化传播这些方面来看，新时代都为提升文化软实力奠定了更坚实的基础；新时代为提升文化软实力创造了更好的条件，让我们对提升文化软实力更有信心，新时代综合国力的增强、新时代文化自信的增

^①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第198页。

强、新时代新思想的指导是提升文化软实力信心的三个主要来源；新时代为提升文化软实力扫除了文化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的障碍。新时代对文化软实力提出了新要求，要求在国家富强的视角下，新时代的文化软实力要更具凝聚性；在政治文明的角度上，新时代的文化软实力要更具整合性；在精神文明的角度上，新时代的文化软实力要更具引导性。新时代提升文化软实力要多措并举：搞好文化建设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根基；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保障；增强话语权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关键；展示文化魅力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着力点；发展文化产业是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

摘自《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9期

三 国外批判视野下的新冠肺炎疫情与资本主义

焦 佩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暴发，将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社会和生态的诸多软肋同时呈现，引发包括左翼在内的国外人士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反思。他们认为，在经济方面，新自由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盛行，导致政府应对疫情的责任感缺失和能力不足、医疗资源的短缺和分配不公、个人承担风险的乏力、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在政治方面，自由民主的光环褪去，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价值与安全、能力、责任、团结、参与之间存在矛盾，投票选举不能保证优质领导力的出现，权力制衡也不能保证国家治理能力的提高。在社会方面，经济结构导致的社会两极分化下的不平等被疫情放大，彻底暴露资本主义人权的虚伪和社会的裂痕。在生态方面，如不改变资本主义的增长和分配方式，绿色发展就只能停留在幻想中，绿色资本主义走不通，生态社会主义才是解决之道。这些国外人士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丰富我国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具有借鉴意义，增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信心和决心。我们应以资本主义的教训为镜，自觉抵制新自由主义和消费主义等错误思潮的侵蚀，推行供给侧改革，提倡勤俭节约，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完善社会主义分配体制，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提高医疗保障的覆盖程度和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合作体系。

摘自《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10期

四 论中国共产党构筑中国精神谱系的百年历程与基本经验

邹绍清

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实践中领导人民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创造了伟大奇迹。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百年伟大历史进程中，逐步积淀和构筑起了体现中国人民的民族性和体现党的本质属性、体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先进文化的中国精神谱系，成为维系党和国家的根和魂。中国共产党构筑中国精神谱系的百年发展历程，其主要成就是：历时态地丰富和建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多层次地构筑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整体性地构筑中国精神谱系，筑牢了中国精神支柱，成为实现中国梦的精神动力。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构筑中国精神谱系的基本经验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理论为指导构筑中国精神谱系；坚持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奋斗中构筑中国精神谱系；坚持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弘扬革命文化、建设先进文化的伟大实践中赓续中国精神谱系；坚持在伟大复兴进程中以涌现的英雄模范或优秀群体的先进事迹活化中国精神谱系；坚持在强化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与人类文明发展相统一的现实中书写中国精神谱系，不断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壮阔前进。我们坚信，中国精神谱系承载的巨大精神力量，必将会激励中华儿女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更大奇迹。

摘自《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五 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文化建设的主题、本质与道路

曹润青 冯鹏志

中国共产党在诞生以来的百年历史中，始终自觉地将自身的发展与中国文化的前途命运紧紧关联在一起，坚持根据历史和实践发展的要求，不断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建构，形成了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规律性、原创性、体系性认识。其中，党对中国文化建设的理论主题、本质规定和发展道路三个问题的探索，具有事关文化发展全局的意义，是党领导中国文化发展的关键抓手。对以上三个问题的历史梳理和理论分析，将有助于我们深刻总结党进行文化理论建设的百年历史经验，进一步增强文化建设的理论自觉与行动自觉，为党在21世纪领导中国人民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文化伟大复兴提供历史启示与理论支撑。从文化建设的主题来看，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确立为文化建设的主题，为中国文化发展在根本上指明了出路。从文化建设的本质来看，党对社会主义文化本质的探求，经历了从精神文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再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样一个层层递进的历史发展过程，并且在此过程中确立价值在文化体系中的基础地位，以价值建设为抓手夯实社会主义文化本质。从文化建设的道路来看，党在不同时期对文化所内含的政治、经济、价值功能进行了深入探索，实现了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多维实践与统筹推进。

摘自《党政研究》2021年第1期

六 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探索

阎树群

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就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从萌发到明确再到丰富的历史演进,从中国共产党成立算起已近百年。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并持续推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极其艰难的伟大事业,无论是理论命题的提出和演变,成果形态的丰富和拓展,还是历史进程的飞跃与延伸,都经历了一个长期实践探索、不断深化认识和反复提炼概括的发展过程。立足于新时代新的历史方位,从理论和实践、历史和现实相统一的角度系统梳理和科学总结百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以及正确辨析这一历史进程的复杂因素及其内在逻辑,深入研究这一命题从提出到演变的话语变迁,从学理角度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大成果的表现形态,廓清学术理论界存在的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认知的简单化现象,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重大变革及其所取得的重大成果为标志对其发展过程作出科学分析,这对于科学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的基本经验,促进党领导人民继续谱写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篇章和推进马克思主义学科持续发展,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具有重要时代价值。

摘自《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七 中国共产党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心聚力的百年实践与经验

许慎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百年来,在马克思主义的引领下,党正确认识和处理继承传统与发展创新、不忘本来与吸收外来的关系,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了持续性的传承、改造、转化与发展,将自然状态的传统文化与自觉状态的传统文化意识有机结合起来,使其在凝心聚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首先,中国共产党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心聚力有助于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在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中激发人民精神力量、在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其次,中国共产党在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心聚力的百年实践中始终围绕主要矛盾、坚守文化立场,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阶级动员、稳定社会、鼓舞群众、改善面貌、保证文化安全、提升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等方面都发挥了作用。最后,中国共产党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心聚力的基本经验

就是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引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挖掘其凝心聚力的潜力；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群众，爱惜群众，保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心聚力的活力；始终围绕正在做的事情，尊重文化传承发展规律，提升党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心聚力的能力。

摘自《思想教育研究》2021年第1期

八 新中国精神与文学经典的生成

蒋述卓 李 石

新中国精神是指新中国成立以来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等不同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相伴随的具有引领性的精神品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前者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凝聚力和向心力，发挥了精神纽带的作用，后者则以不断革新的精神为中国发展持续提供奋进的动力。当下，新中国精神体现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灵魂的新时代中国精神。新中国精神与文学创作及文学经典的生成密切相关。在新中国文学的不同历史阶段，新中国精神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态。这主要包括：“爱国主义精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民族团结精神”“反思精神”“改革开放精神”“与时俱进精神”“多元共融精神”“人民创造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等。经过“文学制度—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三个环节，新中国精神与文学经典生成的互动关系得以彰显。一方面，新中国精神需要经过审美转换，以落实到具体的文学生产机制中，进而借助理论批评话语的介入和阐释，生成文学经典；另一方面，文学与政治的互动又不断丰富着新中国精神的内涵。因此，有必要立足于政治性、人民性、文学批评和文学创造四个层面，创造出不辜负时代与人民的经典文学作品。

摘自《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

九 中国共产党百年来意识形态工作的理论进路

刘 成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意识形态工作放在治国安邦的重要位置，将其作为检验党的先进性的重要指标与凝聚人心的重要基石。百年来意识形态演进受到诸多因素影响，其中，基本国情、社会主要矛盾、国际形势、意识形态规律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梳理百年来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发展历程，主要包括革命战争年代、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改革开放时期、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等四个意识形态重要发展演进阶段。基本形成了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遵循、捍卫党对意识形态绝对领导权是意识形态工作的组织保障、坚守符合中国基本国情原

则是意识形态工作的演进理路、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是意识形态工作的思想根基、坚持意识形态斗争性与主流意识形态引导性相协调是意识形态工作的方法指引、践行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意识形态建设是意识形态工作的文化源泉等党开展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经验。实现了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由革命话语向社会主义建设话语再到全面深化改革话语的时代自我更新与发展创新。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更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在斗争中丰富意识形态价值、纠正意识形态偏向、引领意识形态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意识形态最强合力,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百年来意识形态工作理论进路的逻辑旨归。

摘自《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十 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家庭观

——学习《习近平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论述摘编》

杨 莘

马克思主义家庭观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理论观点,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家庭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一系列注重家庭家教家风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家庭观,是我国社会主义家庭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新近出版的《习近平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论述摘编》一书,收录了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家庭家教家风的一系列论述。重视家庭则定当主张治国自治家起,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特别是抓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必须要重视每一个家庭的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正在有力地指导全社会树立新时代家庭观。探讨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途径,树立好新时代家庭观应当成为一个崭新的视角。总的来看,在《习近平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论述摘编》一书中,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论述主要有四大核心论点:第一,社会主义公民道德建设要靠优良家风夯实;第二,党风廉政建设要以领导干部优良家风为支撑;第三,树立文化自信离不开优良家风、家庭文明;第四,家教家风建设能够有力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

摘自《中国妇女报》2021年4月20日、27日

《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征稿启事

本集刊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开展文化研究,坚持学术第一标准,依托经典,关注现实,追踪前沿,扶持青年,推进对话,助力创新。欢迎各方有马克思主义文化志趣者投稿支持!编辑部邮箱为 mkswhyj@163.com。一旦刊用,即奉样刊和稿酬。

本集刊为半年刊,截稿时间上半年为9月底,下半年为4月底,文章字数在1万~1.5万字。投稿一旦被采用,作者须与出版社签署“一稿专投”声明协议。文稿请遵循以下格式规范。

(一) 论文要件及字体字号等

1. 大标题,三号黑体;副标题,四号楷体,居中。
2. 作者,小四楷体,居中。
3. 作者简介(30~50字),以当页脚注方式,注明姓名、单位、职称、职务及重要成果或研究方向,小五宋体。
4. 中文摘要(300~500字)和关键词(3~5个),五号楷体,关键词用分号隔开。
5. 正文,五号宋体,默认单倍行距。
6. 英文内容,包括题目、作者姓名、摘要、关键词,置于文末。

(二) 正文层次及字体字号

一级标题:一(用四号黑体);二级标题:(一)(用小四黑体);三级标题:1.(用五号黑体);四级标题:(1)(用五号宋体加粗)。

(三) 文中引文注释方式

参考文献统一采用当页脚注形式,每页单独排序,序号采用①②③,置于引文结束处的右上角。页下脚注的具体内容以及格式如下。

- ①余英时:《中国近代宗教伦理与商业精神》,联经出版社,1987,第8页。
- ②周雪光:《“关系产权”:产权制度的一个社会学解释》,《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 ③[法]布迪厄:《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论》,李猛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第8页。
- ④吴兢、黄庆畅:《市县依法行政瞄准“三突破口”,告别“拍脑袋”决策》,《人民日报》2007年8月25日。
- ⑤Stewart Banner, How the Indians Lost Their Land: Law and Power on the Frontie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89.
- ⑥Geoffrey C. Ward and Ken Burns, The War: An Intimate History, 1941–1945 (New York: Knopf, 2007), pp.52–53.
- ⑦Robert J.Beck, and Robert D.Vander Lugt(eds.), International Rules: Approaches from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6.
- ⑧Andrew G. Walder, “Markets and Inequality in Transitional Economies: Toward Testable Theor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1, No. 4 (1996): 1060–1073.

引用中国古典文献,一般在引文后用括号注明作者及文献名和章节即可;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请尽量采用最新版本,并校对准确。

(四) 图表编排

1. 由于采用黑白印刷,故电子制作图表时颜色不宜过于丰富。
2. 遵循“先文后图表”的方式,图表与文字对应,并注明资料来源。
3. 图、表编号,如图1、图2;表1、表2,并注明图、表名称;图名统一放在图下中间位置,表名统一放在表上中间位置。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 2021 年. 第 2 期: 总第 8 期 /
程恩富, 吴文新主编.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2. 2

ISBN 978 - 7 - 5201 - 9684 - 0

I. ①马… II. ①程… ②吴… III. ①马克思主义 -
文化理论 - 研究 IV. ①A811.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2) 第 021851 号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 2021 年第 2 期 总第 8 期

主 编 / 程恩富 吴文新

出 版 人 / 王利民
组稿编辑 / 曹义恒
责任编辑 / 吕霞云
责任印制 / 王京美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010) 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3.25 字 数: 273 千字

版 次 / 2022 年 2 月第 1 版 202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9684 - 0

定 价 / 79.00 元

读者服务电话: 4008918866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